日常生活译丛



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

(1900~1910)

[法] 让-保尔·克莱斯佩勒 著
刘娟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可爱的姑娘，

饥肠辘辘的诗人，

狂热的画家，

敏感的音乐家，

交织成蒙马特一部充满魅力的神话。







ISBN7-80603-976-7

定价：17.00 元



日常生活译丛

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

(1900~1910)

[法] 让-保尔·克莱斯佩勒 著
刘娟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法）让－保尔·克莱斯佩勒著，刘娟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2
（日常生活译丛）
ISBN 7-80603-976-7

Ⅰ.毕… Ⅱ.①让… ②刘… Ⅲ.①艺术史－史料－欧洲－1900～1910 ②艺术家－生平事迹－欧洲
Ⅳ.① J150.94 ② K835.0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994 号

责任编辑 许大昕　周燕华
装帧设计 王　芳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98470
市场部（0531）2098042（传真）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6.125 印张　49 幅图　1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7.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



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译丛”，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宫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闺内闱、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　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蒙马特是一部充满魅力的神话。那里有可爱的姑娘，被殷勤的小伙子追随着，鼓励她们及时享乐；那里有饥肠辘辘的诗人，在"蹦蹦兔"咖啡馆里，诵读他们的诗作，换取一薄片馅饼，或一小杯酒；那里还有狂热的画家，在冰冷的工作间里创作；还有敏感的音乐家，萨蒂，夏庞蒂埃，写出伤感的乐谱，追忆已逝的华尔兹，和街头动听的叫嚷声……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尽管那样真实，却不是上个世纪最初10年——毕加索时代蒙马特高地的氛围。10年中，主流现代艺术的创建者，和毕加索一样，在艺术团体中聚会，这种情况在艺术历史中并不多见。毕加索和德兰身旁，聚集着凡·唐吉、布拉克、胡安·格里斯、维庸、埃尔班、他们致力于发展野兽派、立体派、以及抽象派艺术；还有上个世纪初最伟大的诗人，马克斯·雅科布、阿波里奈尔、勒韦迪、安德烈·萨尔蒙……等等，在积极推动他们的艺术研究。

蒙马特的如画美景并没有激发他们的灵感，只有郁特里洛是个例外。郁特里洛在波托路出生成长，是蒙马特高地的"产物"。他毕生向人们讲述蒙马特一排排白色的房子，房子间的小胡同，棕红色门面的咖啡馆。郁特里洛全部的作品都贡献给了蒙马特。

19世纪后期，雷诺阿、凡·高、土鲁兹－劳特累克、斯坦伦却对这个巴黎浪潮冲击的小村庄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蒙马特，确切地说，生活在蒙马特高地，节日里的蒙马特，红磨房，昔日小鼠咖啡馆，克利尼大街和比加尹广场上的大咖啡馆，与蒙马特高地的乡下环境相比，农场、果园、贫寒的屋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在蒙马特高地，艺术家们不仅受到热情的款

待，在那里，他们还有安逸的住处，无拘无束的环境，热情好客的咖啡馆和性格各异的人们。

并不是说，蒙马特无可比拟的气氛影响到了他们的作品。之后的10年，在蒙巴那斯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艺术家们和东方移民，聚在瓦万十字路口咖啡馆。蒙巴那斯，作为一个崭新的街区，与蒙马特的乡村气息完全不同。而且，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它能向艺术家们提供新建的房屋和独立、无任何限制、无任何繁缛的工作环境。

蒙马特见证了野兽派和立体派的诞生。接着，蒙巴那斯把它的工作继承下来，成为巴黎大学的摇篮，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公开辩论场。上世纪前半叶，这两个街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当时的艺术发展史。

即使是现在，在蒙巴那斯，塔楼的绿阴下，各种艺术活动仍在继续。独特的咖啡馆、艺术城、学术协会和艺术长廊，使蒙马特成为“咖啡迪斯尼乐园”。人们慕名前来，好奇的旅游者，手里拿着摄像机，游遍整个地区，在泰尔特广场的多幅绘画前驻足不前，叹为观止。感慨着，在上世纪的前10年，就在那里，有一束耀眼的火把，照亮了整个艺术界和整个诗坛，并且继续照亮后人。

这里，曾是蒙马特。此书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它的回忆。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巴黎中心的一座村庄 1
蒙马特的村庄 4
蒙马特的小世界 7
醉鬼和坏男孩 9
村庄的节日 11
酒吧里的大学 13

第二章 天才和疯子 19
画家们发现了蒙马特 19
雷诺阿，蒙马特公民 21
萨蒂痛苦的爱恋 23
反抗和节日 25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艺术先驱 27
幽默——蒙马特的产物 29
布尔波和他的孩子 33
厄泽，从竞技场到学院 36

第三章 艺术家同好会 39
居住区和画室 39
“该死的三一体” 41
莫迪里亚尼醉酒 42
“蓝色”的磨难 44
“洗衣船”初期 46
维热尔自杀事件 49

天才的贫民窟　51
科尔托路12号的“过客”　54

第四章　毕加索集团　59
沉浸在爱河里的菲南蒂　60
朋友的“旺季”　62
马诺罗的闹剧　64
赴诗人的约会　68
阿波里奈尔的激情　72
诗人与数学家　76
法国朋友　79

第五章　文艺界的“丛林地带”　83
“丛林地带”的历史　83
蒙马特的海洋　88
鸦片的夜晚　89
可爱的年轻人　90
“丛林地带”的终结　91
雅克·维庸的宿舍　92
其他的怪人　96

第六章　“蹦蹦兔”咖啡馆的晚会　99
诗人的小咖啡馆　99
“弗雷德老爹”的职业生涯　101
文人俱乐部　106
难忘的夜晚　108
未来派艺术家君临蒙马特高地　109
“‘蹦蹦兔’咖啡馆”的孩子　112

第七章　蒙马特的舞会　115
毕加索在煎饼磨房　117
现代四对舞　120
红磨房出现　121
拉·古吕厄的辉煌和衰落　122
翩翩起舞中　126



马戏场的魔力 127

第八章 穷人的食物 131
黑猫小酒馆的睿智 131
阿里斯蒂德·布律昂和骑兵军帽咖啡馆 133
穷人美食 135
小酒馆里的毕加索 139
郁特里洛忧伤的爱情 140
穷人的旅馆 144

第九章 商人和奸商 147
贝尔特·韦尹，才华横溢的女伯乐 147
安布鲁瓦兹·沃拉尔、昏昏沉沉的克里奥尔人 149
艺术旧货商 155
画商中的“夏洛克” 157
最初的绘画爱好者 158
财富从冷漠中来 160
志同道合的姐弟俩 161
毕生献身艺术的商人 164

第十章 作为结束的宴会 167
杜阿尼埃的荣耀时刻 170
“洗衣船”的晚会 172
学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175
玫瑰色爱情的结束 176
毕加索的离开 179

译后记 183

第一章　巴黎中心的一座村庄

"我们将回到'洗衣船'，只有在那里，我们才感到轻松愉悦。"国土解放后，毕加索曾这样对安德烈·萨尔蒙说。

事实上，一直到去世，毕加索从没停止怀念和谈论在蒙马特度过的艰难日子。在那久远的时代，他的生活被欢笑围绕着。一到巴黎，毕加索就遇到了爱丽丝·德兰，当时他19岁，她只有16岁，他们一起哼唱年轻时代的流行歌曲。约瑟特，胡安·格里斯夫人；托托特，马诺罗夫人一直是"复活圣母堂"悉心关照的常客：他和她们在"洗衣船"相识。回忆起那段往事，毕加索写道："住在'洗衣船'，我不名一文。可是在那里，我是名人，是画家，不是怪异的白痴。"

迟来的怀念又是那样特别：毕加索一有钱，就跟着凡·唐吉、布拉克、德兰、阿波里奈尔搬到比"洗衣船"舒适的地方，先是克利尼大街，然后是蒙巴那斯，最让朋友惊奇的是，在蒙巴那斯，毕加索住在一幢电梯房里，最后，又搬到拉博埃蒂。

一战结束后，毕加索开始深深怀念蒙马特，开始在蒙马特高地做心灵的朝圣。当时，他经常去雕塑家拉库里埃的工作室里画画，工作室在蒙马特高地的索道站附近，在那里，毕加索创作出《阿维农少女》，并创立了立体派。另外，毕加索年轻时代的开始，最早一次坠入爱河的经历，也使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蒙马特。每次找到新的情人，毕加索都要带她去"洗衣船"。"一打开门"，有一次，很自然地，毕加索劝弗朗索瓦丝·吉洛跟他去蒙马特朝圣，"我们好像进入了'蓝色时期'……"哎呀，那天，门锁着，工作室的主人，动物雕刻家居约，碰巧出了门。

对男人来说，从保守到过分注意细节的变化，如此怀旧，情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表达对已逝青春的追忆，对自由时光的留恋，对人生希望的感慨；当时，毕加索每天最大的优虑就是三餐问题，生活并不总是那么轻松；然而，他和其他年轻而平凡的艺术家们一样，能够耐心等待将来的辉煌。狂热而真挚的友情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另外，朋友和情人也不苛求，他不用对着“艺术盲”们解释，用不着对他们说：“我是画家，不是怪异的白痴。”

成名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毕加索的私生活不断受到骚扰。一直到晚年，雅克琳·洛克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在戛纳的“加利福尼亚”、在穆乡的“复活圣母堂”安顿下来之后，毕加索才算真正过上平静的生活。为此，代价惨重，有时，不得不离开孩子，还有最好的朋友。晚年的毕加索没有朋友，陪伴他的只有痛苦和遗憾。

非常奇怪，毕加索与萨尔蒙、多热莱斯、卡尔科的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对蒙马特的感觉却惊人地相似，他们用幸福的笔调，描述上个世纪初，他们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不可否认，他们是在几十年后写下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当时，他们已经功成名就，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且岁月已经让他们淡忘了挨饿受冻的岁月。只有皮埃尔－马克·奥兰独树一帜，在蒙马特，他差点饿死。皮埃尔－马克·奥兰宣称，在蒙马特高地，人们碌碌无为，生活一点都不诗情画意。在一间没有火炉，只有一张原木桌，一把椅子和一床草褥的房间里生活，哪有什么浪漫可言？

不过，必须承认，上个世纪初，蒙马特高地的作家和画家，他们怀念那里，不是毫无理由的：“法国之岛”的村庄魅力无可抵挡。最为神奇的是，历经50年的变迁，蒙马特高地仍然幸存下来：田野、果园、私人花园消失了；街道变了；房屋和小田舍被改造过了，小房屋变成了高尚住宅区，和在巴黎市中心没什么两样；古老的商店成了画廊或餐馆；在索尔路和圣－樊尚大街拐角的地方种上了葡萄；还有，潮水般的观光者和蹩脚画家开着汽车来到这里，这可是真正的“工业拙劣画”，但蒙马特高地的魅力依旧。走在科兰古路和朱诺大街，或者登上富瓦亚蒂埃路的台阶，就会觉得到了别处。空气清新，风从北面吹来，吹过圣－德尼平原的工厂，然后吹在人的心上。夏尔·卡穆

安的母亲不能忍受科尔托路的空气，搬到了建在半山坡上的勒皮克路。

在蒙马特，没有郊区工业的灰尘和浓烟，天空清澈。老房子罩着珍珠象牙般的光泽。外墙用石膏粉刷过，反射着雷诺阿画笔下女孩皮肤的光泽。

上个世纪初，在蒙马特，还有很多乡下房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空地上疯长着果树和蔬菜。北面斜坡上，有一片“丛林地带”，一直延伸到科兰古路，老人们经常去割草喂兔子。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丛林地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朱诺大街的房屋和旅馆。半个多世纪前的氛围立刻展现在眼前。逛逛小胡同，最好是没人的时候，一大早，或冬天，北风吹到脸上，仿佛又回到昨天。简单的街道、房屋、商店，处处流露着最真实的人间气息。

毕加索经常回蒙马特，在那里，他能够找回原来的自己。

1900年11月底，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毕加索和两个巴塞罗那画家——帕拉雷斯和卡撒杰马斯一起，在奥尔塞站下车。对那段时光，毕加索永远不能忘怀。

这件事做成连环画，让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看。当时，毕加索穿着一件奇怪的运动衣，脚上是笨重的皮鞋，头戴一顶翻边毡帽，手里拿着画架、调色板和一盒颜料。远处是红磨房风车的“翅膀”。另一个版本：毕加索身穿马车夫的长大衣，手里握着拐杖，注视着塞纳河，对身旁站立的女人无动于衷。竖起的领子说明，毕加索在三等车厢的硬板凳上坐了一整夜，感觉有点冷。

对于毕加索的巴黎之行，人们众说纷纭。不满19岁的毕加索一直很迷恋拉蒙·卡萨斯，桑蒂亚哥·吕西诺尔和米克尔·于特里利奥·伊－莫兰的风景画。三位画家在巴黎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比利牛斯山以外，根本没艺术可言。而且，毕加索急于了解斯坦伦和土鲁兹－劳特累克曾工作过的城市，那座人们通过讽刺报纸发现而后欣赏的迷人城市。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毕加索的性格。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的颓废风格以及德国植物状装饰风格深深打动了他。出于自我表现和叛逆的性情，毕加索对朋友说，他要去伦敦和慕尼黑。随后，他突然决定，去巴黎。一方面，万国博览会的广告宣传。他想去看看他在西班牙展厅的一幅作品。这件事在他的传记里很少提到：毕加索曾是人选向巴黎介绍西班牙艺术的画家之一。博览会的目录注明，79号作品——巴布洛·毕加索。这幅题为《最后的时光》的作品，即后



科学与仁慈 毕加索（1897年）

来的《科学与仁慈》，作于16岁，由毕加索父亲唐·约瑟命题。在这幅画中，毕加索纯粹古板的风格完全体现出来。《最后的时光》在马德里获了奖。画的是一位长着胡子的医生正在为一个躺着的病人诊脉，一个修女抱着孩子在旁边看着。幼稚的主题，糟糕的绘画……唐·约瑟当医生，他妹妹劳拉则当修女。

所以，巴布洛·毕加索决定去巴黎，去看看他在西班牙展厅的作品产生的影响。这次旅行，对他来说，还带有探险的味道。这是一次观光和艺术之旅。毕加索压根没想在巴黎定居，因为他只会讲一点法语，他担心会不知所措，所以，毕加索说服巴塞罗那艺术学院的两个伙伴，帕拉雷斯和卡撒杰马斯陪他一起去。这个决定并不完全出于友谊的考虑，他们比毕加索富裕得多，可以趁这个机会给毕加索经济上的帮助。唐·约瑟给毕加索买了火车票，陪他到火车站。他告诉毕加索，他只剩几个比塞塔来维持生活。

蒙马特的村庄

乡村气息的蒙马特，就是蒙马特高地。在毕加索和同伴眼中，那是片稀奇古怪的土地，嵌在大城市中间，面积只有几公顷，就像口袋里的手帕。南到阿贝斯路，北至科兰古路，东到克利尼昂古尔路，西至朱诺大街，和辽阔的蒙巴那斯相比，蒙马特高地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就是在那里，十几年间，聚集着多位风格各异的艺术家，创立了野兽派（凡·唐吉、德兰、杜飞、布



拉克、弗里兹、卡穆安)，还有立体派(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马尔库西)。

让－雅克·卢梭曾在蒙马特高地山坡上，还有磨房底下采集过植物标本；伏尔泰嘲笑过的勒弗朗－德·蓬皮尼昂侯爵曾把“雾堡”改建得既高贵又“疯狂”。1900年，“雾堡”有着白色外壁和石板瓦屋顶，体现着新古典主义风格。直到现在，还能看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后来的主人又进行了精心修复和维护。因此，“雾堡”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采。

对面，沿着“雾堡”的林阴小道（吉拉尔东路13号），有一排排的两层的小楼，非常现代，被一排排的栅栏隔开，仍有艺术家住在那里。雷诺阿离开了6号楼，他的儿子，未来的电影艺术家，让·雷诺阿，就在那里出生。雷诺阿搬到拉罗什富科路，比原来要舒适得多。雷诺阿对蒙马特高地的乡村气息情有独钟，他的艺术观就是要接近大自然。在创作《乡村之舞》时，雷诺阿已经租下科尔托路的罗西蒙－勃艮第公馆剧院（今旧蒙马特博物馆）一位演员的房子顶楼。房子主要用来存放绘画用具。

关于这个演员，滑稽的是，他从没听说过莫里哀，却表演莫里哀的剧本，而且特别倒霉，和莫里哀一样，他在演《没病找病》时死在舞台上。

住在“雾堡”林阴小道的还有：忧郁的莱昂·布卢瓦，他是个“上帝迷”；还有斯坦伦，“黑猫老前辈”，他和情妇，还有他的“模特”——一大群猫住在一起。

虽然靠近圣心教堂这块大“奶油蛋糕”，（圣心教堂于1911年竣工），蒙马特高地是一座真正的村庄：小路、小溪、小屋、教堂、墓地、髑髅地，树木环绕的广场。有些房子年代久远，如朱诺大街2号，曾是陶艺家帕高·迪西奥和印象派画家让－保罗的工作室。蒙马特高地最古老的农场，可以追溯到17世纪。大部分房屋——有一些甚至是茅草屋——都有小花园改建的菜园或果园，科尔托路12号就是如此。还有些房子建在种满树木的大花园里，椴树、洋槐、臭椿……

到了冬天，斜坡上的小路成了事故易发地。路面结了冰，谁能从索尔路下来，去“蹦蹦兔”咖啡馆，起初叫“杀手咖啡馆”，后来叫“我的田野”，那可是够英雄的。

在蒙马特高地，商业几乎没有：只有一家面包店，一家食品蔬菜杂货店，

一家肉店，供应必需的生活用品。一家香烟店，一家修鞋铺，几家饮料店卖酒和咖啡，几家洗衣店，跟德加画得一模一样……德加以前住在维克多－马斯路，位于蒙马特高地下部。有时，他像瞎子一样蹒跚着，费力地爬上斜坡，去科尔托路拜访苏珊·瓦拉东。德加酷爱观察洗衣女工，她们的动作和姿势吸引了他的目光，但洗衣女工都很讨厌他，把他当成流氓。让－加百列·多梅尔格听到她们骂他："老不要脸，这么大年纪了，不知羞耻。"

家庭主妇们要去勒皮克路或阿贝斯路才能买到精细的食品。果蔬商的小车排在斜坡上，车上摆满了水果和蔬菜，还有鲜肉商、糕点商、猪肉商、菜饭商。蒙马特高地的小商人都是蒙马特人，他们很勇敢，跟顾客处得不错，愿意分担他们的难处。有的商人同意客人赊账，但不能超过20法郎。其中，贝尔农，诺尔万路的一个水果商，因帮助过两代画家而载入波西米亚史册。贝尔农总在商店后间的炉灶上，煨着浓浓的蔬菜汤，汤里还有一大块肉。说唱艺人加斯东·库泰，小说家皮埃尔－马克·奥兰是最大的受益人。马克斯·雅科布经常去安索夫人家，安索夫人在加布里埃尔路开了家食品店，她在餐厅里留出几张桌子给"老主顾"。安索夫人非常喜欢马克斯·雅科布：他能预卜未来。

相对于商业的惨淡，在蒙马特高地，咖啡馆出奇得多，小饭馆也是数不胜数。特别是到了礼拜天，一群群的巴黎人来到蒙马特，来"呼吸新鲜空气"。破烂的咖啡馆里，弥漫着茴香、锯末、猫尿的味道。所有的咖啡馆都跟"饮水槽"（酒馆名）里的摆设一样，柜台、镶着瓷花的大咖啡壶、大理石桌子、弯靠背椅子。柜台后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酒瓶：樱桃酒、拉斯帕伊酒、柠檬汁、薄荷汁、石榴汁，处处脏兮兮的，气氛却热闹非凡。到了冬天，点上煤气灯，屋里很热，坐在酒馆里喝杯烈苦艾酒、黑茶镖子酒、薄荷果汁汽水或4个苏的小黑酒，甚是舒服。星期六，有的咖啡馆配有台球台，大门的窗玻璃上便用白垩粉写着"台球比赛"。

到了节假日，咖啡馆花园里的葡萄架成了情人们约会的好地方。巴黎的风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屋顶像鳞片在海岸线蓝色的轻雾下闪啊闪的。蒙马特高地是多么地美妙啊。花园里，树木和花朵累累的灌木散发出扑鼻的香气：丁香、山梅、紫藤、忍冬的香味，混杂着堆在圣心教堂斜坡上和圣－皮埃尔

广场小花园上的稻草的气息，令人陶醉，蒙马特高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田野归农场主所有。在蒙马特高地，还有真正意义的农场，堆着肥料和粪坑。晚上，人们来买热牛奶，牛奶新鲜，营养丰富。

蒙马特的小世界

1900年，蒙马特居民大多是法国人，乡下人很多——农业耕作者、农业工人、菜农、果农——他们根本不知道巴黎。还有很多在北郊上班的工人，市镇职员，公司雇员。每天早晨，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去巴黎：礼服和圆顶礼帽，大衣和高筒大礼帽。克利尼昂古尔路的迪费埃勒商店雇了很多人：每月150法郎！妇女们大多在家里工作：加工羽毛，穿花圈用的珠子，在布上刺绣，加工服装。大家都讲市郊语言。

白天，路上空荡荡的。5年来，萨瓦教堂的钟声总在寂静中响起。流动商人悦耳的叫喊声偶尔打破寂静。居斯塔夫·夏庞蒂埃从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路易丝》。

浪漫的氛围，如画的风景，并不能掩盖有很多穷苦人家的事实。19世纪末的一次统计数字表明，在8区，穷人的比例高达8%。莱昂·弗拉皮耶在他的《幼儿园》中，撇开画家和作家不谈，以梅尼蒙当区的一名女工为例，指出当时的贫富差异。该女工缝制垫肩，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缝100个垫肩赚6个苏。每天，她至少需要30个苏来维持她和三个孩子的生活。很惨吧！是的，尤其在生病或失业时，根本没有任何指望，那才叫惨！朋友之间的帮助可以暂时减轻困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邻居之间经常互相帮着干点重活，家庭主妇们也互相帮着照顾孩子，帮着买买东西。需要指出的是，无产者的蒙马特尤其集中在蒙马特高地的北部和东部斜坡，靠近居斯蒂那路，拉巴路和拉梅路。

除了穷苦人，还有"边缘人"。他们最大的烦恼，就是不能"出人头地"，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无政府主义》编辑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办公室位于奥塞尔路，离拉维尼昂广场不远。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在鲜鱼商弗雷德开的"倒霉蛋"饭馆的后间聚会。每天晚上，他们围坐在佐·达格扎身边。佐·

达格扎是作家，专门写抨击性短文，还是名说唱艺人。

拉乌尔·杜飞和无政府主义者来往密切，被列入警察局的"黑名单"。拉乌尔·杜飞为人热情，无忧无虑，曾把科尔托路12号的画室让给一个叫德尔古的人住。德尔古是个相当有才华的画家，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德尔古在"倒霉蛋"饭馆里，很狂热，大叫大嚷，言语偏激，抨击当局，丝毫不管他人的感受；还拉直嗓门喊反对军队、警察和资产阶级的口号。科尔托路12号的门房很讨厌他，而且，这个门房是警察局的眼线，他赶紧向警察局告发杜飞家发生的事情。杜飞被传唤到凯德索尔费佛，虽然杜飞向警察总署做了解释，但还是被列入无政府主义者名单。

没等杜飞赶，德尔古自己就搬走了。一个名叫让－德·博纳丰的记者，大腹便便，经常被通向房间的狭长通道卡住。一天，他到杜飞的店买画布，这个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决定逃走。离开时，他对杜飞解释道："在生活中，我这样的胖子还是不可少的！"



朴素简约的圣－皮埃尔教堂。

除了这些忧心忡忡的人，宗教团体使蒙马特沐浴在宁静祥和之中。蒙马特参与了1871年的起义。蒙马特(Montmartre)，安放殉教者遗骸的高地(Monsmartytyrum)。很长时间以来，蒙马特地区的宗教信仰，围绕着德尼圣人及跟他一起殉教的两个同伴埃勒泰尔和吕斯蒂克展开，蒙马特高地是修道院的封地。但在上个世纪初，它光辉的过去仅残存于坐落在桑德兰别墅里边的一所女校。19世纪中叶，这座别墅曾是白衣主教的私立诊疗所，热拉尔·奈瓦尔就在那里治疗过。现在，又拾掇一新，桑德兰别墅成了高档住宅。

蒙马特高地下部，圣德尼殉教遗



址上，耸立着一座小教堂。福利院的修女们就在小教堂附近建造了安托瓦内特街（伊冯娜－勒达克街）9号。1534年，伊尼亚斯－德·洛约拉在小教堂里起誓。现在，当初的教堂已经灰飞烟灭了。



华丽庄严的圣心教堂

1900年，毕加索来到蒙马特高地。当时，圣心教堂还没有改变蒙马特的生活节奏。村民们还不知道建筑家阿巴迪设计的这个庞然大物，还继续光顾他们的堂区——圣－皮埃尔教堂。在他们看来，来自法国四面八方的朝圣者们，由神父陪着，避开村庄的道路，来到圣心教堂。沿路上开了很多家酒馆，村庄显得鬼鬼祟祟。道路阴森森的，骑士曾因神父在他面前路过时没摘帽而被烧死。一些小旅馆和摊位在那里卖宗教纪念品。

醉鬼和坏男孩

前面已经谈到蒙马特的流氓。可以说，他们是蒙马特高地传奇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到星期六，他们就从红城堡或金水滴去小酒馆怪声高唱猥亵的歌曲。事实上，到1900年，这种现象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多热莱斯和卡尔科对蒙马特高地的描述带有夸张的成分。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有拿着刀子的小流氓给他们结账，他们还看到被男人虐待的妓女。在低级的小酒馆里，像在美洲西部，经常有枪杀事件；行人在黑暗的小道上被害；要当心那些在蒙马特高地的市侩！实际上，这仅仅是奇闻轶事爱好者对现实的歪曲。就算是真的，多热莱斯和卡尔科还是不了解真正的蒙马特。1900年时，多热

莱斯和卡尔科才14岁，他们不住在巴黎。过了很多年，他们才收集到蒙马特居民对当时的叙述。他们描写可怜的穷画家或穷诗人时，他们自己也不确定叙述是否属实。多热莱斯和卡尔科极尽夸张之能事，向我们讲述了贫穷绅士和缝衣女工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都是无稽之谈！

当然，在蒙马特，不可能没有发生过意外事件，但要把它和其他街区平等对待。事件大多是酗酒造成的。"要痛打酒鬼"！有时，事情处理得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要知道，在蒙马特高地，只有两名警察在泰尔特广场巡逻。等他们赶到出事地点时，一切都结束了。最能惹事的是苏珊·瓦拉东的小儿子，他当时只有20岁，却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不过，他从不害人，所以，一旦出事，人们只是把他带到朗贝尔路的派出所。在那里，警察把他打一顿。但警察们经常要求他画水粉画或水彩画，作为交换自由的条件。警察们事先准备好纸、画笔，还有颜料。有个幸运的警察竟收集到一套水彩画。

现代艺术的发展史上，图拉克路的派出所还扮演了配角：1911年的一天，有人把可怜的凡·唐吉当成博诺集团可怕的达尔尼埃带到派出所。他能很快被放出来多亏了德兰。德兰住在派出所隔壁，他给凡·唐吉做了保释。

到了晚上，工人和雇员们下班回家，这时，蒙马特高地显得忙碌起来。辛苦了一整天，小伙子们在泰尔特广场一伙一伙地散步，他们穿着草鞋，脸上露出轻松的神情。

关于广场的名字，皮埃尔·伯努瓦有独到的解释，还说得过去，但仍有争论。他认为，这是为了纪念迪泰特将军，他是非洲殖民运动的英雄。不过，矛盾的是，广场在中世纪就叫这个名字。

还是言归正传吧，谈谈蒙马特的生活。生活方式由季节决定，季节不同，生活也不同。冬天，人们待在屋子里，围坐在火炉旁。要知道，当时，瓦斯灯还没有完全代替油灯。直到1914年东方路还用油灯照明。到了晚上8点，整个村子一片寂静，只听到午夜12点的钟声。午夜，"蹦蹦兔"咖啡馆和其他酒馆都打烊了。偶尔，听到醉鬼扯着嗓子大叫哼唱着走过去。然后，又是寂静一片，直到第二天清晨，街道和房屋的昏暗和寂静再一次被爱动好闹的人打破。到了深夜，从平原上吹来的狂风把村庄惟一的路灯吹得摇曳不定，辽阔的大地淹没在无比可怕的黑夜中。

到了春天和夏天，情况就全变了。长长的黄昏撩起人们出门溜达的欲望。有些房客在马路上开沙龙。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经过——走下高地才能找到代租的马车，或者一辆三匹马拉的马车。人们把椅子和马扎拿出来，坐在那儿，一边聊天，一边喝着从附近的小酒馆里买来的啤酒或柠檬水。男人靠在墙上抽烟斗；年轻人坐在斜坡的台阶上，露骨地谈论着苗条的年轻姑娘。她们从他们身边走过，斜着眼看他们，却装作视而不见。毛孩子们，未来的流浪儿①，他们在玩修房子游戏，玩捉人的游戏，发出一声声惊叫，在夜晚的蒙马特高地回旋。在那样的夜晚，小酒馆忙碌着，台球的木制球发出啪啪的声音。

有时，年轻伙伴悦耳的噪音打断人们的谈话。他们悠扬地哼唱着郊区的流行歌：《小石块》、《你是如此美丽》、《遥寄鲜花》、《曼侬，我的美人》，毕加索曾经把这首歌的歌名用于他的一幅立体主义作品……还有，《郊区的燕子》也是。多美妙的时光啊，人们把日常生活的烦恼和第二天的活计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村庄的节日

蒙马特是一块封闭的土地，除了周末，几乎没有节日。煎饼磨房的舞会，和20多年前雷诺阿画笔下的舞会，一点都不一样。参加舞会的主要是年轻的工人、手工业者、年轻的雇员，他们来找寻艳遇；还有几个艺术家也来凑热闹。布拉克是个华尔兹高手，经常跳得舞伴们神魂颠倒。毕加索、弗拉曼克、德兰不怎么去舞会，偶尔去一次，也是去找绘画灵感。

真正的节日不在蒙马特高地，而在高地下部，在罗什舒阿尔路，克利尼大街，比加尹广场。沿路几百米，有很多酒吧、啤酒店、小酒馆、舞厅、剧院，特别是梅德拉诺杂技场，它可是蒙马特艺术家常去的地方。在蒙马特高地，娱乐场所已经使用灯箱，招牌上的字闪啊闪的：塔巴兰、莫尼克、昔日小鼠、卢瓦亚尔－苏佩、骑兵军帽咖啡馆、红磨房。这些地方因劳特累克而名噪一时。

①法国著名浪漫派画家布尔波塑造的典型流浪儿形象。

拉·古吕厄的模仿者卷入浸礼会信徒和花边的潮流中。每天晚上，总有一大群巴黎人到蒙马特高地，来寻欢作乐；蒙马特是首都的乡村节日中心。早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巴黎人就在农场篱笆外面的小酒馆里吃喝玩乐。所有的人都在觥筹交错。当时，喝酒可以免除所有的税金。在塞纳河对岸也一样，很快，加特路变成夜晚狂欢的中心。

蒙马特的顶部和下部，也有几条热闹的街道，客人分成两部分，不全是男性……库斯图路和斯坦科尔克路有很多供妓女使用的旅馆，每次3法郎。妓女们浓妆艳抹，穿着暴露的衣服，聚在旅馆入口处，向过路的人发出“邀请”，而且为了节省时间，她们自己已经标明了价格。斯坦科尔克路2号旅馆，在毕加索到蒙马特之前刚刚停业。毕加索也是这种地方的常客。“灰鹦鹉”旅馆在整个巴黎都相当有名，拉乌尔·布松还专门写了一首描绘诗，纪念过去的生活：

> “‘灰鹦鹉’、你是紫红色的、金色的
> 是我们交流最后的避风港，
> 在门口，老板娘殷勤地对你说：
> ‘小姐们都在等你了，
> 她们会好好服侍你、
> 她们一头金色的头发，真是漂亮迷人。’”

不言而喻，艺术家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跟其他人太不一样了。到了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创作，印象派画家们或者在盖尔布瓦咖啡馆和新雅典酒馆聚会，或者和“年轻的姑娘”躲在小酒馆房间的红格子窗帘后尽情享乐。印象派画家们最常去的地方还是泰尔特广场的“蹦蹦兔”咖啡馆，还有布斯卡拉咖啡馆的露天平台。晚饭前，画家们走下斜坡，去拉菲特路的画廊里看看他们的作品卖没卖出去。读读萨尔蒙、多热莱斯、卡尔科和西的大作，就会相信，蒙马特高地确实是画家们的避风港。算上古板画家、漫画家和独立派艺术家，在蒙马特高地，差不多有50多个。

在蒙马特高地，艺术家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收入



微薄。当然也有例外，如吉里欧，他还能养活食客。有时，吉里欧带着他的食客在阿贝斯路乘马车去比加尹广场。

吉里欧是个特例。大部分艺术家的生活非常艰难。有的甚至没有90生丁，喝一碗里面有一片咸牛肉的汤。“大家的生活都很穷困，”安德列·萨尔蒙在《无止境的回忆》中写道，“最绝妙的就是能够生活下来。”

只有梅德拉诺附近的旧货商卖出一幅画，或幽默报纸接受了画家的稿件，寄来5法郎稿费时，画家们才大摆筵席以示庆祝。对穷困潦倒的画家来说，一个金路易就是一大笔财富。当贝尔特·韦尹第一次买走毕加索的画，把钱交到毕加索手上时，毕加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把路易抛到路面上，听听发出的响声。

“今朝有酒今朝醉”。年轻画家的生活像狐狸，先死吃烂撑一只鸡，然后，如果没有猎物，就忍饥挨饿。煮菜豆、炸土豆和熟香肠的时刻是短暂的，更多的日子是缺衣少食。菲南蒂·奥丽维，“洗衣船美丽的菲南蒂”讲道，一天，实在是没有什么吃的，她的猫跳过窗子，去邻居家偷了一块猪血香肠，她和年轻的毕加索当午饭吃了。还有一次，菲南蒂向阿贝斯路的小饭馆订了饭菜。酒馆伙计来送菜时，菲南蒂隔着门对伙计说，她正在梳洗打扮……伙计只好把饭筐放在门垫上，菲南蒂就用不着付钱了。在毕加索美妙的记忆中，这些，曾是他们当时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凡·唐吉还回忆道，毕加索曾经跟他一起去偷别人房门前的牛奶和羊角面包。当然，他们最常用的手段还是在饭馆里赊账。

埃米尔朋友饭馆、电报饭馆、卡特琳大妈饭馆、蒙马特饭馆的老板都允许艺术家赊账。

长此以往，很多饭馆都破产关门。而且，赊账到了一定数目，艺术家们无力偿还，饭馆老板们也就不允许再赊了。

酒吧里的大学

只身来到巴黎的毕加索，最先打算去的地方不是蒙马特，而是蒙巴那斯。在巴塞罗那，朋友就对他说，乡村一路可以租到画室。在巴黎，毕加索遇到

了诺耐尔，他把毕加索带到蒙马特，并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直到10多年后，毕加索才搬到蒙巴那斯。诺耐尔属四卡塔卢尼亚集团。成员们有时在巴黎，有时在巴塞罗那。

关于米克尔·于特里利奥·伊－莫兰，他同意当苏珊·瓦拉东儿子的父亲——也许他本来就是郁特里洛的亲生父亲……如果拿苏珊·瓦拉东为他和莫里斯·郁特里洛画的肖像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这不是信口胡说。诺耐尔和米克尔·于特里利奥·伊－莫兰，还有拉蒙·卡萨斯，桑蒂亚哥·吕西诺尔经常待在巴黎，经常去拜访印象派画家。诺耐尔在巴黎时，深受杜米埃和斯坦伦的影响，对社会的不平等极度敏感。诺耐尔的绘画主题主要是穷苦人，还有古巴战争失败后，一无所有被遣返回巴塞罗那的人。在四卡塔卢尼亚艺术界，诺耐尔的名声很暧昧：古板的艺术家把他当作革命者；而独立派艺术家又把他当作落后者。不过，毕加索很欣赏他：诺耐尔作品中的伤感与毕加索的精神状况很像。追根溯源，毕加索的"蓝色时期"深受诺耐尔蓝色调系的悲惨主义绘画作品影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1900年时，毕加索开始着手蓝色作品。不过，相对于诺耐尔，毕加索的作品更加接近蒙克、斯坦伦以及莫里斯·德尼的风格。

毕加索在巴黎一家小酒馆里碰到了诺耐尔，西班牙艺术家经常光顾那家小酒馆。诺耐尔跟毕加索说起，他在蒙马特高地半坡上的加布里埃尔路49号有一间画室，他想卖给毕加索，他自己想回巴塞罗那，而且，短时间内，他不想再回巴黎。生意谈成后的第一天，毕加索搬到了蒙马特。此后的10年间，蒙马特一直是毕加索战斗和成功的舞台。

第二天，毕加索出发去巴黎。他参观了万国博览会，但相对于启蒙时代的作品，毕加索对卢浮宫的古希腊罗马和古埃及文化部分更感兴趣；然后，就是展出塞尚和高更作品的卢森堡博物馆，还有塞纳河右岸的画廊，深深吸引了年轻的毕加索。而且，在塞纳河右岸，还能够欣赏到如画的美景。

毕加索的朋友把他带到贝尔特·韦尹画廊，在那里，毕加索和一个卡塔卢尼亚的富家子弟相识，他父亲马尼亚克先生来到巴黎安度晚年。后来，马尼亚克先生成了绘画经纪人，专门游说贝尔特·韦尹心甘情愿买下表现西班牙秀丽风光的绘画。很快，马尼亚克先生开始资助画家。毕加索带给他一大



捆作品。马尼亚克先生一下子卖了三幅给贝尔特·韦尹，同一天，贝尔特·韦尹把画卖给了阿道夫·布里松，《时代》杂志的文学评论家。

初次的成功带给贝尔特·韦尹极大的鼓舞。她决定收购更多的作品。随后，她和马尼亚克先生约好，一起去加布里埃尔路毕加索的家里选画。这一次拜访毕加索，给贝尔特·韦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在回忆录《眼睛的一角》中，贝尔特·韦尹尖刻地描绘出毕加索在蒙马特的生活情况。贝尔特·韦尹费力地爬到七楼，敲了敲画室的门，没有人答应。她对这个胆大妄为的画家很生气，抱怨着下了楼，在楼底下，她碰到了马尼亚克先生，他也来找毕加索。马尼亚克先挨了一阵骂，最后说服贝尔特·韦尹再和他去一次毕加索家。他确信，像毕加索、卡撒杰马斯，还有帕拉雷斯那样的年轻人，忙了一整夜后，已经筋疲力尽，这个时候肯定睡得正沉呢。毕加索确实被马尼亚克的敲门声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天哪，他还穿着睡衣！这仅仅是第一次，还有很多类似的小事件。贝尔特·韦尹讲道，有一天，毕加索来到她的画廊，漫不经心地把一把手枪放到桌子上，然后让贝尔特·韦尹付给他钱。她吓死了，躲到画廊的一角，撩起裙子，从裤袜里掏出100法郎，向毕加索保证他们之间互不相欠……这个故事肯定有杜撰的成分，但确实是真的。这一幕应该不是发生在毕加索到巴黎的第一天，而是到巴黎很多年后，阿尔弗雷德·雅里给了他一把枪，毕加索才去找贝尔特·韦尹的。

在巴黎，毕加索有很多朋友陪着，跟在巴塞罗那的生活一样，轻松愉快：从歌厅戏院出来，就去妓院过夜。毕加索相当勤奋，当时，他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创作，到了晚年，他的才华变成一场计时比赛："我绘画，所以我存在。"……在红磨房和昔日小鼠咖啡馆，毕加索重新找到了劳特累克原来生活的氛围。深受劳特累克的影响，或者说，从劳特累克的画风中获得灵感，毕加索创作出了很多幅作品。不过，毕加索早期绘画浓彩重抹，画的表面粗糙；而劳特累克运用流动的色彩，画面不厚重。毕加索的绘画主题与劳特累克差不多，但在绘画的色彩和图画至上的原则方面，毕加索又与勃那尔很接近。图画至上的原则是毕加索作品的独特之处。

毕加索与劳特累克的不同也表现在对待同一构图的方式上。毕加索所要描绘的不是歌厅戏院的美景，而是污秽龌龊的场面。在这些作品中，已经孕

育着“蓝色时期”的萌芽。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主要表现失望和堕落，这也是四卡塔卢尼亚集团的艺术创作主张。从青年时代，毕加索就一直很忧郁，他的心总被孤独占据着。这种孤独并不是生活困难造成的，他的家庭能够为他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毕加索的忧郁与孤独是因为在四卡塔卢尼亚集团内部存在神经质的气氛。像曼克笔下不知所措的人物一样，画家们大多看破红尘，而且，略带伤感。团体里的三个成员，艺术评论家卡泽拉斯，作家索勒·米盖尔和卡撒杰马斯每隔几个月就要自杀一次。

不过，有时，毕加索在巴黎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美满的家庭生活，还有四卡塔卢尼亚集团的伙伴，无一不让他怀念。另外，当老马尼亚克心醉神迷于卖毕加索的画作而获得的成功中，并且向毕加索建议，每月付150法郎买走他所有的作品时，毕加索决定离开巴黎，回到巴塞罗那；他在小酒馆和歌厅剧院画了很多速写，在家乡，他也能像在巴黎一样创作。毕加索在“劳特累克时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巴塞罗那完成的：《节目最后》、《女舞者》、《胸甲》、《磨房舞会》、《在房间里》……

卡撒杰马斯的葬礼 毕加索（1901年）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促使毕加索离开巴黎回到巴塞罗那，他希望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度过年终的节日，另外，卡撒杰马斯的状态让他忧虑万分。卡撒杰马斯长相很滑稽，鸡胸驼背，圆下巴，酷像瓦朗坦·勒·德佐塞。卡撒杰马斯过分敏感，而且能直接从心灰意冷到兴奋狂热，不经任何过渡。一到巴黎，卡撒杰马斯就爱上了一个叫洛尔·卡尔加洛德的年轻女子，洛尔·卡尔加洛德活跃于蒙马特的娱乐场所，艺名热拉曼那。洛尔·卡尔加洛德越拒绝他，越嘲笑他，卡撒杰马斯就越爱她。最后，卡撒杰马斯绝望了，他谈到自杀。为了劝阻他不要做傻事，毕加索不



得不随时看管他，为此，毕加索放弃了自由和创作。毕加索很珍惜和卡撒杰马斯的友谊，不惜任何代价改变环境，让卡撒杰马斯忘记那令人沮丧的爱情。


生命　毕加索（1903年）

10月中旬，毕加索和卡撒杰马斯踏上了回西班牙的路程。毕加索的如意打算还是没能够使卡撒杰马斯从绝望中解脱出来。在马拉加和巴塞罗那的妓院和夜总会里过了几天，卡撒杰马斯又回到巴黎，回到洛尔·卡尔加洛德身边做最后一次尝试。又一次被拒绝后，卡撒杰马斯在克利尼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毕加索，他的“蓝色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卡撒杰马斯的葬礼》，现存于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这幅画带有神秘色彩，寓意深刻。后来的作品，如：《生命》也是以卡撒杰马斯为主题。卡撒杰马斯的死亡一直烦扰了毕加索很多年。另外，马克斯·雅科布在极为悲痛时，也想到过自杀。

毕加索还曾经对巴黎考察两次，直到1904年4月，才决定离开巴塞罗那，在蒙马特的“洗衣船”定居下来，“为了最好，也为了最坏”。



第二章　天才和疯子

画家们发现了蒙马特

蒙马特“艺术摇篮”的美称并不是因毕加索的到来而突然出现的。啊，富有灵感的蒙马特高地，有一段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此书不是要讲述历史，而只想列举出自圣·德尼以来，为蒙马特高地美丽传说做过贡献的人。不过，还是把蒙马特的介绍限定在毕加索时代，以重现1900年到1910年在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的生活。同时，为了确定当时的气氛，解释为什么众多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选择了蒙马特，这个位于法国首都中心的小村庄，最好还是把一些不很相关的人介绍一下，不管他们生活时间长或短，毕竟在上个世纪初，他们的声望和他们的生活吸引艺术家们不远千里来到蒙马特高地。蒙马特是现代艺术的大熔炉。

一开始，在19世纪初，当然是因为蒙马特的如画美景。

蒙马特，距巴黎市中心只有一小时的路程，向风景画画家提供了田园风格主题。艺术家们接踵而至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喜欢和质朴的居民生活在一起，过无拘无束的生活。房间没有舒适的设备，因而，房租低廉得微不足道。在上世纪中叶，类似的原因，也使得巴比松，以及后来的阿望桥村极受艺术家欢迎。

无法证实乔治·米歇尔是否曾在蒙马特高地居住过，但上述原因吸引他数次来到蒙马特。乔治·米歇尔的教名为“米歇尔·德·蒙马特”，1843年，乔治·米歇尔去世后，在离蒙马特高地较远的地方（塞居尔大街2号）留下一幅蒙马特高地风景画，充分表现了枫丹白露画家的自然主义风格。半个多世纪以

来，乔治·米歇尔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蒙马特和蒙马特高地的磨房，——这样的画家至少有二十几个——磨房矗立在田野的中央，顶着朵朵的白云，广阔的蓝天。跟许多创新者一样，乔治·米歇尔的新古典主义作品，在他去世之后，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不过，乔治·米歇尔仍是第一位毕生描绘蒙马特风光的画家。后来，莫里斯·郁特里洛又重拾他的辉煌。

米歇尔作品的主题为高耸入云的磨房，其他的画家则爬上蒙马特高地的粘土质斜坡，画整个地区的风景。德拉克洛瓦在洛雷特圣母路生活了13年，当时，他正和他的表妹福尔热女男爵谈恋爱。因而，面对美景，德拉克洛瓦熟视无睹。他在参议院的图书馆工作，还没热里科到过的地方多。

在蒙马特，热里科有一个采石场，生产细粒石灰石。他经常和画家朋友德德雷－多尔西一起，骑马从马蒂尔路出发，去采石场视察。一回到画室，热里科就开始画画，他的作品《石灰炉》非常有名。

有一次，从采石场回来，途中，热里科从马上摔了下来，真倒霉，正好摔到胯部的脓肿处。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大名鼎鼎的迪皮特伦也无能为力。11个月后，可怜的热里科去世了，只有33岁。他的去世震惊了德拉克洛瓦。热里科比德拉克洛瓦仅仅大六岁。在日记中，德拉克洛瓦写道："虽然我跟他（热里科）算不上是朋友，但他的不幸还是让我心碎……可怜的热里科，我会想你的。我想你的灵魂有时会来到我身边……可怜的年轻人，永别了！"

事实上，德拉克洛瓦一直没能忘记热里科。在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他对热里科的同情和思念。

1840年，柯罗创作出《磨房舞会》，同一年，他还创作出几幅蒙马特风景画。但他从没在蒙马特高地生活过。柯罗在普瓦松尼埃区有一间画室，经常从那里出发，背着绘画工具步行到蒙马特高地。塞尚紧跟其后，他可是蒙马特的城市人。创作蒙马特高地为主题的作品时，塞尚就住在埃热西佩－莫罗路的艺术家别墅，那里是他在巴黎最后的画室。再后来，塞尚和左拉一起去克利尼大街9号的盖尔布瓦咖啡馆找他的朋友——未来的印象派画家。未来的印象派画家们并不外出写生，在蒙马特高地底部比加尹广场烟雾腾腾的咖啡馆里，盖尔布瓦咖啡馆和新阿泰纳咖啡馆，他们创建了追求光线效果的理论。坎格坎德、西斯莱、雷诺阿、马奈、德加、凡·高、土鲁兹－劳特累克……

大部分曾在蒙马特生活过，有的还在那儿生活了一辈子。

离开维克多－马塞路时，德加死在克利尼大街6号的房子里。苏珊·瓦拉东发现了他的尸体。德加一直住在蒙马特，经常去音乐咖啡馆听流行女歌手唱歌，却始终没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德加尖酸刻薄，思维敏捷，但充满仇恨，鄙视女人，品位高雅不庸俗，偶尔与坏人为伍。低级咖啡馆里，光线赋予色彩丝绸和珐琅般的色泽，德加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上个世纪初，德加的视力出了问题，他慢慢放弃了绘画。为了打发时间，德加每天都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像老年的荷马，穿着灰色的海军服，所有人都对他的穿着习以为常。毕加索一眼就能认出他。毕加索一直对德加赞赏有加，并收集了一套《泰利埃老屋》石印图画，简直如获至宝，还满怀崇敬地做了艺术评论。

在蒙马特，对德加的尖酸刻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洗衣船”时代，诗人和画家经常去毕加索画室，经常玩的游戏，其中就有“模仿德加”，用最谦恭最优雅的语气说出最恶毒的话。要是德加泉下有知，他会大发雷霆，痛骂这些艺术流浪汉。

雷诺阿，蒙马特公民

所有的印象派画家中，只有雷诺阿真正成为蒙马特公民。他喜欢简单的接近生命本质的生活，打心底里喜爱蒙马特和那里的居民。在蒙马特，雷诺阿的妻子阿琳，还有阿琳的侄女加布丽埃勒重新找到她们家乡的环境和习俗。让·雷诺阿，电影艺术家，在为父亲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家住在吉拉尔东胡同13号布鲁埃尔小路6号的一幢房子里。1892年，父母亲搬到那里和他们同住。

雷诺阿对他在科尔托路12号的画室一直念念不忘，在那里，他创作了《舞会》和《秋千》两幅作品。1876年，雷诺阿希望能旧地重游。让·雷诺阿忆起，蒙马特高地仍保留有迷人的田园风光，满园的野玫瑰，还有邻居的果园。果园归一个大农场主所有，他经常到农场主家里去吃又小又硬又涩的梨子。晚上，人们开始挤牛奶，加布丽埃勒就带他去附近的农场买牛奶。在布鲁埃

尔小路6号的生活很艰苦：去井里打水，在锌做的浴盆里洗澡。到了冬天，要在壁炉里用木头烧火取暖。雷诺阿，既怕冷，又怕潮，在画室里装了两个取暖炉。不要谈生活的享受了，连肚子都填不饱！

蒙马特高地距离市区很远，去一次巴黎好像一次远征。没有交通工具，马车车夫不愿意到比方丹－迪－比特广场或阿贝斯路更远的地方。因此，人们之间的交往仅限于邻居，像在乡下，总在一起吃饭。奇怪的是，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住着很多可爱有趣的人：一名埃及学者、一位中学老师、一名法国歌剧院的笛子演奏员……"雾堡"的门房是一位侯爵夫人，身无分文，却乐于助人。雷诺阿和两个邻居成了密友：保罗·亚历克西，他是左拉的传记作者，保罗·亚历克西的女儿多次做过雷诺阿的模特，克洛维斯·于格，蒙马特的众议员。他们来往很密切，一个碰到另一个，总问："我那儿有块白汁牛肉，想吃吗？"

是的，在蒙马特高地，生活舒适自由，这是雷诺阿一直深深怀念的。但那里太潮湿了，他不得不离开，搬到蒙马特下部的拉罗什富科路。雷诺阿很不情愿地离开图拉克路的另一间画室，又在新家附近租了一间。当时，雷诺阿患上严重的关节炎，他的腿弯得像葡萄藤。

几年前，加瓦尔尼在蒙马特的生活和雷诺阿截然相反。第二帝国刚刚建立时，"杜米埃第二"定居在蒙马特高地的罗西埃路（即谢瓦利埃－德－拉－巴雷路），很方便他去找女孩寻欢作乐。住在郊区的唐·胡安的生活很有规律：白天，为几家报纸设计插图；晚上，干完活，就换上别致的晚礼服，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走下斜坡，去高尚住宅里吃饭。唐·胡安总是很晚回来，而且总有女子陪着。唐·胡安，与其说因其设计插图，还不如说因数不清的艳福而名声大震。唐·胡安死后，留下一本日记，更像是一本账本。昆虫学家收集蝴蝶，唐·胡安收集曾跟他度过良宵的女人：他因好奇才跟她们在一起。

当然，在此，有关蒙马特艺术家们的叙述还是不全面的，最好列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在那里生活过的学院派画家：埃内尔，阿尔弗雷德·斯特文思，皮维·德·沙瓦纳——他们曾是庙会和节日花车行列的组织者——古斯塔夫·莫罗，卡里埃，莱昂·莱尔米特，在勒皮克路画威尼斯风景画的齐耶姆。艺术家们大多住在比加尹广场附近，那里开了很多家艺术家咖啡馆，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加尹广场有一个模特市场："圣女"、"商业和工业仙女"、"铁路女神"，模特们光着身子，身上的毛都剃光了。模特大多是意大利人，来自布伊村，村民世世代代做模特。

19世纪，在蒙马特下部，曾住过很多作家和音乐家。维克多·雨果在蒙马特逗留两次：1849和1851年间；1871年，从国外流放回来。米尔热，蒙马特的重要人物，住在克利尼大街，当时，把《放浪形骸》改编成剧本。埃米尔·左拉曾在那里路过；阿尔封斯·卡尔刚刚当抨击短文记者时，住在一座18世纪的小房子里，有些像《与众不同的梨树》里描述的小酒馆。1860年，"洗衣船"建好后，阿尔封斯·卡尔住的房子最初是钢琴厂，"洗衣船"的门房就住在里面。《狡猾的女人》的作者（阿尔封斯·卡尔）和加瓦尔尼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加瓦尔尼非常喜欢这个长满"大树、灌木、草地"，还有"一个清泉汩汩的大岩洞"的地方，但周围的噪音太大，最后，他决定离开。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加瓦尔尼决定搬到蓝色海岸。在那里，他萌生了组织植物种植的想法。到了冬天，加瓦尔尼就把大量的水仙、紫罗兰、还有金合欢运到巴黎。

同时，柏辽兹正无比痛苦地和阿利埃特·斯米特松一起，住在圣－樊尚路和蒙－热尼路拐角处的一座小房子里。后来，郁特里洛"白色时期"的一幅名画画的就是这座房子，再后来，渐渐被人们遗忘。

萨蒂痛苦的爱恋

另一位音乐家，另一位不幸的情人，埃里克·萨蒂19世纪90年代住在蒙马特，经常在黑猫咖啡馆和克卢旅馆弹琴。这个"美好时代"放荡不羁的家伙爱上了水性杨花的苏珊·瓦拉东。1893年，她给他画像时，就在中间休息的当头，她成了他的情妇。和许多画家一样，对瓦拉东来说，和模特上床已成为一种习惯。埃里克·萨蒂没有意识到他只是苏珊·瓦拉东的临时情人，虽然他喜欢对人冷嘲热讽，但还是对曾做过皮维·德·沙瓦纳、雷诺阿和土鲁兹－劳特累克模特的女人满怀深情。瓦拉东阴晴不定，一会儿激起他的热情，一会儿给他泼冷水，搞得萨蒂神经紧张。万分痛苦的萨蒂给瓦拉东写了

封情书：

"亲爱的小宝贝，

不可能

不想念你的一切

你的生命，我的心里全是你，到处

你那迷人的眼睛，柔软的小手

小巧的孩童般的小脚。

我开始懂你不能一直

做你想做的事。

你看，小可爱，一切都开始了

用我整个的心拥抱你。"

六个月后，苏珊正式向萨蒂提出分手：爱情的季节只持续了6个月。苏珊·瓦拉东爱上了萨蒂的朋友穆西。对萨蒂来说，真是痛不欲生；带着深深的怨恨，他离开了苏珊·瓦拉东，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深爱着她。萨蒂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讽刺挖苦咒骂苏珊·瓦拉东，这也是表达爱意的另一种方式！

居斯塔夫·夏庞蒂埃的名字和蒙马特密不可分。他的代表作《路易丝》有些奇怪，但动人心弦，主要歌颂蒙马特默默无闻的人们。莫里斯·郁特里洛为《路易丝》设计了绝妙的布景。居斯塔夫·夏庞蒂埃在罗什舒阿尔大街生活了60年，他的工作室，还有钢琴，现藏于老蒙马特博物馆。

毕加索时代的"洗衣船"，还住着埃米尔·贝尔纳，他自吹曾经拉拢高更参加轮廓分明画派。反正，这种事也少不了他。10年前，从埃及刚刚定居到"洗衣船"时，埃米尔·贝尔纳只是一名平平常常的画家，在绘画界，没有什么地位。苏珊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建议他"用圆柱体、球体、锥体表现大自然。用透视法，使物体或平面的每个边都朝向中心点"。这个现代艺术的定义统治画界近50年。后来，贝尔纳成了学院派画家，根本不把苏珊的话当回事。埃米尔·贝尔纳住在科尔托路12号，是从莱昂·布卢瓦手里租来的房子。再

后来，苏珊·瓦拉东给他安排了个住处。埃米尔·贝尔纳在房门上写着：“不信上帝、不信拉斐尔、不信提香的人不得入内……”

当时，贝尔纳绘画的主题是蒙马特高地，还有克利尼广场，在蒙马特，他还在杜埃路65号住过，于1911年离开。同一年，毕加索搬到蒙巴那斯。从杜埃路搬走后，贝尔纳住在蒂尔拉克路的菲赞别墅。他在杜埃路65号的画室很大，主要是用来存放画作，有时去巴黎，那也是个不错的歇脚处。再后来，贝尔纳搬到日维尔尼，他想跟他的偶像克劳德·莫奈离得近些。虽然贝尔纳没能成为蒙马特居民，谈到蒙马特时，却不能不提到他。上个世纪初，埃米尔·贝尔纳曾经勾勒出蒙马特最为本质的特征。

反抗和节日

最后，被朱尔·勒那尔称作“不朽眼睛”的斯坦伦，才是典型的蒙马特式艺术家。青年时代，斯坦伦就从故乡瑞士途经米卢斯，来到蒙马特。在米卢斯，斯坦伦初涉绘画领域。为了在蒙马特定居，他不惜和他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刀两断；15岁时，斯坦伦读了《小酒店》，从那时起，他就很叛逆。不过，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成为无产阶级反抗和阶级斗争的代言人。之前，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给黑猫咖啡馆的老板——鲁道夫·萨利斯打工。斯坦伦的绘画生涯就是从用猫形图案装饰这间文艺酒馆的檐壁开始的。随后，他还为萨利斯创办的杂志撰稿，受蒙马特高地手工业者和工人生活的影响，斯坦伦画了很多猫形图案，还有很多素描。再后来，他离开萨利斯，放弃了颓废风格，与布吕昂达成共识。当时，布吕昂发行了《芦笛》，一份以他的酒馆命名的幽默报纸。终于，斯坦伦能够展示自己辛辣的才华，着手进行工人阶级至上主义作品的创作。

直接受到斯坦伦的影响，毕加索创作出《束缚》和《海边的穷人》两幅作品。当时，斯坦伦住在“雾堡”小径的一间小屋里。1900年，万国博览馆拆除时，很快，斯坦伦就和他的情妇，还有他的猫们，搬到位于科兰古路的巴伐利亚馆，在“丛林地带”边上。那里成了有名的“猫咪别墅”。刚刚到巴黎的毕加索，还曾去“雾堡”拜访过斯坦伦。毕加索对斯坦伦不胜仰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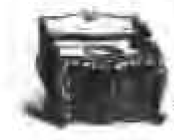

海边的穷人 毕加索（1903年）

过，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关于这个问题，安冬尼娜·瓦朗坦曾问过毕加索，他的回答是："我非常喜欢带插图的《吉尔·布拉斯》报，斯坦伦的绘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此而已。或许，毕加索极不愿意回忆年轻时曾受的影响。

对斯坦伦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不可胜数的猫主题作品，而是为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克兰克比尔》、特别是为让·里克蒂斯的《穷人的独白》所作的插图。这位插图画家，同里克蒂斯——他住在勒皮克路，穷困潦倒——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

年龄相差约两岁，斯坦伦和维莱特可谓是同辈人。在蒙马特高地，他们是邻居，住处相隔几十米，他们的幽默感截然相反：一个辛辣，一个愉悦。虽然生活在蒙马特，斯坦伦的艺术之笔并没有描绘蒙马特的传说，而维莱特却热衷于此。斯坦伦，通过毕加索，深受先锋派艺术的影响。而维莱特，完全相反，与现代艺术格格不入。尽管他的艺术风格轻松自由，但他简直是年轻创新者的"天敌"，尤其是立体派，他在《笑》中，画了很多嘲讽立体派的漫画。彩衣小丑、傻瓜、身体疯狂的少女，使蒙马特永远地蒙上浪漫的、人为的色情色彩；但是，直到现在，这仍旧吸引众多游览者来到泰尔特广场。还有，蒙马特舒适的生活氛围，也是情侣及寻求艳遇者的乐土。阿波利耐对此极为赞赏，在《强硬派》中，还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

"维莱特的艺术，完全是精神与诗歌、绘画与音乐、绝妙的讽喻与生活本身的结合。他画笔下的人物总是神采飞扬，无忧无虑，但还是遮掩不住那淡淡



的忧伤。

小丑、疯子、白日梦者、乳房娇美的姑娘，蒙马特的夏娃，她抓住了蛇，想从绳子上跳过去。还有你，维莱特，你们温柔地笑着，亲切迷人。

而又，像爱情那样，带有一丝丝忧郁……"

在维莱特放荡不羁的世界里，尽管不存在粗俗低级的东西，也没有轻浮的女子，但他仍是黑猫咖啡馆和"蹦蹦兔"咖啡馆，还有红磨房的礼赞者。

热情的维莱特，为蒙马特地区增添了不少生气，他还是"牛游行"的革新者，活动于每年四旬斋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举行，一头饥肠辘辘的"疯"牛，高高站在画家拉的车子上面，在蒙马特高地游行。不过，曾为第二家黑猫咖啡馆构思装潢的维莱特；受弗拉戈纳尔煽动，曾与迷恋跳舞的丰满女人打成一片的维莱特，在不可逆转的衰老面前逐渐丧失了昔日的魅力。维莱特顽固的排犹情绪使他虔诚的"圣水"浑浊不堪。晚年时，维莱特否认他年轻时的荒唐生活。维莱特于1926年去世，享年69岁。虽然生前，维莱特春风得意，但只留给夫人和三个孩子几千法郎的遗产。死前，维莱特还因自己穷困潦倒而懊悔不已。

维莱特曾规定，艺术家们在每个开始封斋的星期三做弥撒，来休整一年来疲于工作的灵魂。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艺术先驱

1900年9月，毕加索到巴黎时，穿戴颇像个艺术家。在蒙马特高地，经常会有米尔热描绘的画家。一些人的衣着随便：火枪手披肩和毡帽，布列塔尼刺绣坎肩，木屐……有人则开嬉皮士之先河，光着脚走来走去，用"红皮肤"头带扎着头发……当时，凡·唐吉就打扮成这样。后来，凡·唐吉又恢复他原来的泽兰地区渔民穿戴。不过，在上个世纪初，艺术家们的穿戴仍然是军服唱主角。德塔耶自成一派：直领上装，大纽扣，天鹅绒的绑腿紧紧绑在踝骨上。

头发胡子的式样更是花哨新奇，发刷的尺寸不同，式样也不同。刘海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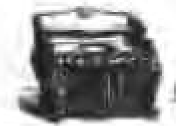
洗衣船时期，身穿法国军服的毕加索。

的叫“波拿巴在阿尔科勒桥”式，留有短髯的叫“缪塞”式。所有的发型都有小胡子、山羊胡子、甚至大胡子作为“点缀”。起初，毕加索还留了几个星期的胡子，别人总把他和其他艺术家搞混，毕加索烦透了，索性把胡子刮了。不过，毕加索逐渐改变了穿着风格，和朋友、还有蒙马特高地的蹩脚画家区分开来。1904年，刚刚在“洗衣船”定居时，毕加索极为推崇修配工的穿着：蓝色工作服；红底白点棉布衬衫，在圣-皮埃尔市场花1.55法郎买的；挖土工式的红色法兰绒腰带；从西班牙带来的绳底帆布鞋。

布拉克也穿蓝色工作服，还留着整套“美丽的女园艺师”式的蓝色哔叽布，穿着去“磨房舞会”和“半处女们”跳华尔兹。沃拉尔派德兰去伦敦画泰晤士河的风景。从伦敦回来，德兰的穿戴让人大跌眼镜。布拉克讲道：

“从伦敦回来，我穿的是典型的英国式衣服，只不过，加了点野兽派艺术：绿色的西装，红色的坎肩，鲜黄色的皮鞋，一件夏天的大衣，白底、巧克力色和浅咖啡色相间的格子。大衣很容易脏。毕加索说：‘你看起来好像刚刚从蒙特卡洛回来。’”

布拉克的同伴，弗拉曼克，曾跟他一起去伦敦，对绅士－农场主服做了最形象的阐释：粗呢西装、苏格兰格子衬衫、打着阿波利耐描写过的木制领带。有时，领带就用做棒子或小提琴，猫肠弦挂在领带的里面。画家威廉·克



洛沙尔跟弗拉曼克上了几次小提琴课——弗拉曼克的绘画生涯从30岁开始，以前，弗拉曼克是个小提琴老师。克洛沙尔描绘出弗拉曼克的坎肩：鲜奶油色麂皮的、苏格兰羊毛的、紫色天鹅绒的、床垫布的……还戴着一顶圆顶礼帽，上面还插着一根松鸦的羽毛。弗拉曼克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装束，有时，把木制领带换成红围巾，把圆顶礼帽换成伊顿帽。

马克·奥兰，原名迪马谢，当时是位素描画家，他把自己打扮成运动员，蒙马特的小社会真是吃惊不小：运动衫，短裤，运动鞋，运动袜。后来，他去比利时，给一位女作家当秘书，才算结束了他的“运动员生涯”。秘书的工作很清闲，马克·奥兰为他的小说收集了很多素材，同时，他也开始穿英国服装，花哨俏丽，还戴一顶苏格兰贝雷帽。

马克斯·雅科布的父亲是坎佩尔的裁缝。在蒙马特高地，雅科布很穷，但穿得最时髦。白天，穿戴有红色肋形胸饰的布列塔尼衣服；晚上，去城里吃饭，就穿上加有樱桃色丝绸衬里的披风，还戴上折叠式高顶大礼帽和单片眼镜。

最后，还是莫迪里亚尼向人们展示了艺术家的真正品位。莫迪里亚尼于1906年来到蒙马特，他非常帅气，身穿天然羊毛色天鹅绒衣服，洗得次数过多，衣服微微泛着珍珠色；蓝格子衬衫，每天换洗——和其他艺术家不同，莫迪里亚尼很爱干净；漫不经心地扎着围巾。莫迪里亚尼的这种装扮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光。晚年时，莫迪里亚尼有些堕落，酗酒、吸毒，但仍一如既往地高贵。50年后，罗歇·维尔德、利奥波德·叙瓦兹和扎德基恩谈起来，莫迪里亚尼的高贵气质还令他们赞叹不已。

幽默——蒙马特的产物

在蒙马特，艺术家的类别不同，衣着也随之不同。根据穿衣服的方式，就能判断出他跟谁打交道，判断出他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彼此相识；但即便是在小饭馆或“蹦蹦兔”咖啡馆碰到，都装作互不相识。甚至，谋生的方式都一样，都给幽默报纸画漫画。凡·唐吉、雅克·维庸、马尔库西和胡安·格里斯曾合作为《黄油盘子》、《法

国信件》、《笑》撰稿；维莱特，德帕基、普拉博、乔治·德洛也都曾是上述报纸杂志的投稿人。有些艺术家充分体现了蒙马特最传统的精神，他们才是蒙马特高地的“产物”。而毕加索、布拉克、德兰、凡·唐吉、胡安·格里斯，他们虽然住在蒙马特，但他们的创作主题和这座村庄无关。在蒙马特，马尔库西他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的生活很有代表性。假如他们生活在别处，也就是说，他们创作出其他主题的作品，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可以说，蒙马特成就了他们，他们也继承和丰富了蒙马特的传奇历史。

蒙马特真是冒失鬼、怪人、笨蛋和醉鬼的天堂！除了郁特里洛，还有蒂雷－博涅、于勒·德帕基、乔治·德洛……最好，在这里提一下做事有分寸的维莱特、普拉博、马克莱和厄泽，在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他们可不是普通人。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才华横溢，怎样都不会丧失绘画技巧。郁特里洛对蒂雷－博涅无比崇拜。虽然总是烂醉如泥，虽然没有继承母亲苏珊·瓦拉东的风范，郁特里洛仍能恰当地评价作品，郁特里洛断言：“蒂雷－博涅是当今最伟大的画家。”

蒂雷－博涅很像霍尔拜因画笔下的诸侯，留着胡子和长头发，能一下子喝光满满一杯博若莱葡萄酒。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曾是军事游行的专家。蒂雷－博涅还把士兵护腿套的纽扣、勃艮第皇家军团步兵的玫瑰形十字勋章画出来。蒂雷－博涅学识渊博，从没让给他的漫画挑错误的人得逞。

蒂雷－博涅有点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经常把路人当作普鲁士人，用玩具气枪，向房间窗户外边伏击。一战期间，蒂雷－博涅发展了图片报道。后来，丰特诺瓦士兵和雷斯舒方骑士，连同其作者，逐渐被人遗忘。蒂雷－博涅在一战中死去。

蒂雷－博涅的酒友，乔治·德洛，自称是“塞纳河的想象者”，宣称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他本人没有蒂雷－博涅有名气。乔治·德洛只给图书画插图，生活得比蒂雷－博涅舒适得多。在普及版图书带有插图的时代，像乔治·德洛这样的人才供不应求。乔治·德洛从拉维尼昂广场的普瓦利埃旅馆搬到蒙－热尼路的一座乡村小房子里，房间的家具从家乡阿登省运来，异常漂亮，飘散着蜂蜡、苹果、薰衣草的香气。乔治·德洛不写诗时，就舒服地坐在壁炉旁，创作书页装饰和尾花。在蒙马特高地，乔治·德洛的生活方式



屡见不鲜，很多人过着巴尔扎克时代的生活。

于勒·德帕基，更是疯疯癫癫，是个大胖子。不过，和朋友比起来，于勒·德帕基个性不是很突出，他在装疯卖傻吗？不知道！他懂得，作为组织者，应该如何把装疯卖傻运用得恰到好处。

于勒·德帕基的故事更值得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创设了自由公社，为他在蒙马特的日子写下了决定性的一笔。于勒·德帕基也为幽默报纸画漫画，日子过得如沐春风。现在，在老蒙马特博物馆，还藏有他的几幅漫画。于勒·德帕基的作品很难欣赏。福兰、阿贝尔·费弗尔、埃尔曼·保罗的时代，于勒·德帕基的漫画轮廓线条拙劣，没有思想。漫画的说明文字更是平淡无奇，后来，《韦尔莫年鉴》达到轻浮和庸俗幽默的顶峰。现在，最上的省报也不会刊登类似的漫画。

于勒·德帕基"黄金时期"的漫画很潦草，只有他本人知道他画的究竟是什么。于勒·德帕基把每个月分成四个阶段，其中，一个礼拜来创作。"创作周"内，不出门，饮酒适量。其他三个星期，则无所事事，在泰尔特广场慢悠悠闲逛，酗酒，在小酒馆里讲故事。于勒·德帕基神情专注，捏着鼻子，趿拉着旧鞋，在广场上一逛就是几个小时。早上和晚上，于勒·德帕基在小酒馆里和酒鬼斗酒，他是个"常胜将军"。每天，他先确定路线，摇摇晃晃地一家酒馆一家酒馆地蹿，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像个魔鬼；头发很长，有几绺露在皮里鸭舌帽外面，"神情恐怖，眼神像灰林枭"。

于勒·德帕基19世纪80年代从色当来到蒙马特，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乡，乔治·德洛。一开始，于勒·德帕基在黑猫咖啡馆画画，不过，在那里，他没有市场，他的风格跟文学咖啡馆的气氛格格不入。后来，于勒·德帕基转到"蹦蹦兔"咖啡馆，在那里，他遇见了毕加索。也是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每星期六晚上，咖啡馆里人最多，于勒·德帕基朗读他的诗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有一首，用亚历山大体写成，最受欢迎，讲述了一名骑士，十字军东征回来，发现他的妻子正在教育他的年轻侍从。诗的最后一句非常精彩，影响深远：

"呦！呦！呦！呦！呦！呦！

呦！呦！呦！呦！呦！呦！”

但观众最喜欢的还是《阿塔丽的梦想》，按《米歇尔妈妈》的诗调写成。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在蒙马特，于勒·德帕基自吹是韦里饭店谋杀案的凶手，还被警察局带去问话。后来，警察在拉瓦肖勒抓到了真凶。不过，还是对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惩罚，在拘留所里关了几天。

总而言之，于勒·德帕基很狡猾，擅长利用呆头呆脑骗酒喝。一上酒瘾，他就变得很聪明，走进一家熟悉的咖啡馆，手里拿着箱子。“于勒先生，您要走吗？”大家问他。

“是的，我回色当。在蒙马特的生活结束了，我要离开……”他回答道。

大家实在太喜欢他了，根本舍不得他离开。大家请他喝酒，为他送行。送行宴一直持续到火车开车，狡猾的家伙却借故第二天离开。

1918年，达达主义者把他当作达达运动的先驱。10年间，于勒·德帕基曾在小酒馆里展出他的作品——《盒子里的杰克》。埃里克很喜欢《盒子里的杰克》，还曾改编成音乐剧。剧情异常简单：五幕剧中，舞台上，只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摆轮钟走来走去。人们不禁纳闷他究竟想干什么。最后一幕解开谜底：他是一名钟表匠！

工作室里，类似的玩笑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稽之谈被人们津津乐道着。弗朗西斯·卡尔科发现于勒·德帕基观看窗户外面的送葬队伍，他很纳闷，于勒·德帕基回答说：“噢，你要晓得，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哦！”

1924年，于勒·德帕基在色当度假时，死于淋巴结炎。蒙马特的人们听到他的死讯后都痛哭不已：他曾带给他们无尽的快乐。四年前，于勒·德帕基创立了蒙马特自由公社。真是一个天才的主意。于勒·德帕基整年周游法国，大摆宴席，和军人子弟、无套裤汉和随军食品小卖部女管理员一起庆祝民间节日。于勒·德帕基还召集了一队群众角色，给他们穿上1889年革命者的衣服，看起来滑稽可笑。于勒·德帕基自己，则身穿黑色礼服，腰上扎着金色流苏的三色腰带。通常，酒会快要结束时，于勒·德帕基会来一场近乎完美的演说，宣布蒙马特和国家分离。



布尔波和他的孩子

尽管布尔波很喜欢捣乱，跟于勒·德帕基这个冒失鬼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布尔波，出生于圣－德尼，父母是老师。从孩幼时期，他就开始认识蒙马特高地，每周四，布尔波都去蒙马特高地玩耍。也就从那时起，他开始爱上蒙马特高地的风景，开始了解那里的居民。布尔波毕生在讲述蒙马特最普通的人，特别是那里的孩子。布尔波创作出的典型人物——“布尔波”，是蒙马特的流浪儿，流着鼻涕，衣衫褴褛，滑稽淘气，易激动。当然，布尔波的画风，虽然不像斯坦伦那样令人不快，也不具备强大的震撼力，但布尔波的作品很感人，把“布尔波”们的生活故事描绘得带点伤感的幽默。

起初，布尔波住在“丛林地带”的一间木板屋里，后来，他在朱诺大街13号建了一家漂亮的旅馆。在蒙马特，布尔波很快成了重要人物，生活舒适，和蔼可亲，仁慈慷慨；布尔波不仅仅给蒙马特高地的小孩子画素描，以博《画报》的读者一笑；他真正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的读者。每天，蒙马特高地的孩子们放了学，就来和他打招呼，和他一起玩。再后来，布尔波在花园里设了一个漂亮的小“园中园”来招待小朋友们。

布尔波是个天生的喜剧游行组织者，是蒙马特高地的戏班班主。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没和他的红颜知己莱奥娜结婚，但又不愿意让她因不能举行婚礼而失落。作为补偿，每年，他们相识的纪念日，布尔波都要办一次“假婚礼”。那天，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激动的气氛中。布尔波烫好头发，穿上礼服，莱奥娜穿上婚纱，戴着头纱和橘花冠。客人们扮成神父、牧师、男傧相、证人、市长、还有……奶妈，胸前是纸做的大乳房。怪里怪气的，在乡村小提琴师的乐曲声中，整个婚礼穿过蒙马特高地的大街小巷，后面跟着一群极度兴奋的孩子。

如此几次后，布尔波和莱奥娜最终在市长面前注册结婚……他们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的狂欢婚礼，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

1913年5月，布尔波组织了一次狂欢，仿佛冥冥之中有预兆。布尔波想重建《最后的论据》——阿尔封斯·德·纳维尔的一幅名画，再现1870年巴黎保卫战时的事件。布尔波把工作间改造成小酒馆，叫一帮朱阿夫兵、阿尔

及利亚步兵、海军陆战队士兵、加里波第士兵、随军食品小卖部女管理员和妓女穿上第二帝国时期的服装，在工作间里跑来跑去。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夜，最后在"丛林地带"的小路上分手。一大早，号手吹响了冲锋号，所有的画家经过一个晚上的纵酒作乐之后，心中充满英雄主义，军刀闪闪，冲向磨房。这一声军号声，就像德国入侵的消息传来，让他们激动不安。布尔波提前一年就预感到德国入侵。后来，他和伙伴们一起并肩战斗，很多人没能从战壕里出来。布尔波自己严重残疾，他的脊柱中了一块弹片，腿瘫痪了，人生的最后30年就困在轮椅上。

在毕加索时代，蒙马特高地最后一位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埃利泽·马克莱！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主儿。大家从来搞不清他是不是真幼稚；或者跟农民一样，故作天真。埃利泽·马克莱是农民，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从故乡庇卡底来到蒙马特，在泰尔特广场下车，他的父亲是个农业工人。当时，埃利泽·马克莱26岁，在巴黎待过一段时间。来到蒙马特之后，埃利泽·马克莱先是做厨师助手。后来，他在鲁瓦勒路的韦伯家见到了土鲁兹－劳特累克。埃利泽·马克莱也算作是蒙马特高地的"产物"，很受人们尊敬。当时，埃利泽·马克莱得了痨病，医生建议他到蒙马特定居。生活在继续，为了谋生，埃利泽·马克莱在一家折叠式铁床厂做油漆工。像个磨房园林工人，他也在室外工作，这样，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磨房建在一个漂亮的小花园里，白天，人们摆上桌子，边玩耍边聊天。长满青草的小山冈上耸立着"细筛子"磨房，这是蒙马特幸存的磨房之一。

马克莱的绰号叫"蒙马特农民"。说真的，马克莱真像个农民，皮肤黝黑，像被风吹日晒过，佛克司特狗似的小眼睛，浓密而乱蓬蓬的眉毛，鼻子很长；说话带有浓重的乡土音，身穿两边是天鹅绒的衣服，脚蹬木屐，和喜剧里的乡巴佬相差无几。夏天，马克莱换上白斜纹的衣服，扎着绿色园林工人的长围裙，戴着宽大的草帽，手里拿把刷子，在乡村小路上漆铁床。有时，马克莱也在磨房的林阴小道上，用耙子把地耙拢。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画画，孩提时，村里的神父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教他画画。

马克莱是个滑头，知道如何合理安排画中人物。有人问他做什么，他用舌尖颤动发"r"音："我在画花……"事实上，马克莱正沉醉在磨房盛开的

蝴蝶花和紫罗兰花的香气中。他还说自己是皮维·德·沙畹的学生。一天，一位穿着考究的先生：礼服，佩戴八枚闪闪发光的玫瑰形十字荣誉勋位勋章，在他身后停下来，看他画画，恩赐般地向马克莱提出建议。对狡猾的马克莱来说，这足以让他瞎编乱造：皮维·德·沙畹给他上过一课。不过，皮维·德·沙畹早在1898年就与世长辞了，而马克莱把他们的相逢定位在皮维·德·沙畹去世的8年后。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马克莱喜爱有加，所有的好事都落到他头上。和杜阿尼埃·卢梭一样，马克莱爱在街上东游西逛，擅长从门房那里偷卡片。马克莱穷困潦倒，普瓦里耶旅馆老板因他住宿不付钱，把他赶了出去。马克斯·雅科布在加布里埃尔路有一套单身公寓，本来是一个堆杂物的地方。好心的雅科布收留了马克莱。马克莱最爱坐在一个红色的大扶手椅里。毕加索在"洗衣船"设宴招待朋友时，杜阿尼埃·卢梭就端坐在那把扶手椅里。到了晚上11点，马克斯·雅科布动身去圣心教堂参加宗教庆典，马克莱则钻进被单一觉睡到天明。为了不打扰他休息，马克斯经常在朝圣者的寝室里过夜。

直到去世，马克莱仍对马克斯·雅科布心存感激：

马克莱对安德烈·瓦尔诺说："你就不知道他（马克斯·雅科布）心肠有多好。房子里有一个小女人，人们都叫她'布娃娃'，特别坏，经常冲着马克斯大叫，骂他，嘲笑他的仁慈。有一天，我真火了，和'布娃娃'对骂。'布娃娃'不吵不闹了，马克斯却狠狠批评了我一顿。"

一开始，马克莱的绘画淳朴，但很快落入俗套，粗俗不堪，缺少内涵。他爱模仿明信片的主题，活脱脱郁特里洛的漫画。有时，还能侥幸成功。马克斯·雅科布还鼓励马克莱如此的作画风格，是马克莱抄袭平庸之作的罪魁祸首。

其他人可不像马克斯那么单纯，他们想利用马克莱的作品，投机取巧获得成功，甚至断言，"门外汉"根本无法区分马克莱和郁特里洛的作品。后来，"蒙马特农民"得到名作家的重用，好运纷至沓来：弗朗西斯·卡尔科和马克莱签了一年的合同；后来，马克莱和柯莱特、多热莱斯、弗洛朗·费尔斯、让·

佩尔兰、勒内·福舒瓦、还有一位奥地利男爵合作。只不过，每次，刚刚被捧上天，好日子过了没几个月，马克莱的经理人就开始讨厌他，可怜的“蒙马特农民”重又回到穷困潦倒之中。最后的运气造成了马克莱最后的破产：一天，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走进马克莱家，幸运之神降临。亨利·福特一下子订了5幅画，付钱时，一场误会赐予穷画家一笔意外之财。亨利·福特问画的价钱，马克莱以为是总价，说：“5000法郎。”但是，福特以为每幅画5000法郎，就递给马克莱一张2.5万法郎的支票。

马克莱欣喜若狂，陶然欲醉；也就从那时起，他开始一事无成。不久，马克莱得了精神病，住进精神病院。康复之后，马克莱又回到他朝思暮想的蒙马特高地，但已是江郎才尽。1962年，马克莱在拉里布瓦西埃去世，“穷人的郁特里洛”再一次被所有人遗忘。马克莱的死，对冷酷的画家来说，又是一次尝试新绘画手法的机会。

厄泽，从竞技场到学院

埃德蒙·厄泽，蒙马特高地最后一名艺术家，他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向人们展示了在上个世纪初，年轻的画家们为了生存所进行的斗争。埃德蒙·厄泽的人生经历：在村子的小路上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师从苏珊·瓦拉东所受的基础教育；迂回曲折的艺术生涯；最后，也是最意想不到的：学院选举。

埃德蒙·厄泽出生于格雷耐尔，他比郁特里洛大三个月，很小就来到蒙马特。他和郁特里洛是一生的伙伴。在克利尼昂古尔路的市镇小学上学时——小学校长是于勒·罗曼的父亲，法里古勒先生，埃德蒙·厄泽和安德烈·于泰尔成了好朋友。安德烈·于泰尔，苏珊·瓦拉东的丈夫，郁特里洛的继父。苏珊·瓦拉东比安德烈·于泰尔大20岁。

埃德蒙·厄泽和郁特里洛一起，在“丛林地带”度过了自由的中学时代。在他们眼里，“丛林地带”就像遥远的西部，充满着诱惑。在蒙马特高地，厄泽曾亲眼看见雷诺阿对着模特儿作画；在蒙－热尼路看见苏珊画画。埃德蒙·厄泽还记起土鲁兹－劳特累克去红磨房的情景：“一个坏人教唆一帮女子打

架，她们打得不可开交时，他（土鲁兹－劳特累克）用拐杖把她们分开……”

13岁时，厄泽对当裁缝的父亲说他的理想是当画家。他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可不希望我们家出个流氓！”束手无策的厄泽带着18法郎的“小金库”离家出走，躲到一个伙伴家里，他的伙伴叫拉斯基那，17岁，在科尔托路12号的一间阁楼里画画。此后的30年间，拉斯基那什么差事都做过：送货员，纤夫，地板清洁工，勤杂工，毛刷推销员……常常，他不得不吃门房的狗食。“干60小时活，不吃饭，谁受得了？”回顾昔日的悲惨时光，拉斯基那感叹道。

长此以往的疲惫不堪，最终，拉斯基那精神崩溃了：在塞纳河的九桥投河自尽。厄泽一个人，孤零零的，重新做起折磨人的苦力：萨马里亚的裁剪工；自行车运动员；继瓦朗坦·勒·德佐塞之后，在红磨房里做拉·古吕的舞伴跳踢踏舞；在圣－贝泰尔伯格做大公爵尼古拉·米盖洛维奇保管员、染布工、路边举重员、油画经纪人，最后，在梅德拉诺画廊当小丑。厄泽的绘画生涯开始于40岁，当时，他利用曾在萨戈画廊工作的便利，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

埃德蒙·厄泽是一部真正的蒙马特高地的百科全书！有时，作家们为了收集蒙马特的资料，总是向厄泽请教。厄泽讲道：“我请卡尔科到家里来了十几次，我们在蒙马特闲逛，他总让我讲述过去的故事，成为他描绘蒙马特的素材，对于蒙马特，卡尔科几乎一无所知：他到得太晚了。”

尽管起步很晚，厄泽很快成为大名鼎鼎的肖像画家。他身后留下的150幅人物画像，成为上个世纪上半叶社会名流的珍贵画廊。克列孟梭不喜欢厄泽为他画的画像，对厄泽说：“别人都喊我‘老虎’，你却把我画成了海豹。这是不是现代派绘画？！”

二战后，厄泽当选为艺术学院院士，紧束裤腰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和毕加索相反的是曾在蒙马特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埃德蒙·厄泽，不愿意旧地重游，找寻年轻时的岁月。埃德蒙·厄泽说：“要是人们认出我——其实，我长着奥古斯特式的鼻子，很容易被别人认出来，他们就会过来打我。”

最后，再讲述一个故事，结束这篇对“毕加索时代”曾在蒙马特生活过的艺术家的评论。艺术家中，有的完全被蒙马特高地的风俗同化；有的在那

里等待成功，然后搬到更有“文化气息”的地区。

罗兰·多热莱斯直接受昔日黑猫咖啡馆观念的影响，经常散布博洛纳利的流言蜚语。多热莱斯还嘲弄住在“艺术家别墅”的野兽派画家和“洗衣船”的木炭派和立体派画家。他在一名负责笔录的执达员的监督下，在涂有颜色和带有腓特列驴装饰的画布上乱画一气。安德烈·瓦尔诺和吉里约非常喜欢闹剧，他们狡诈地牵了洛洛的尾巴。蒙马特高地的小伙子们——乔治·奥里克和加布丽埃勒·奥迪贝蒂——带着极大热情完成了画作，后来，油画被送到独立派艺术家那里，名曰《拉德里亚蒂克日落图》，本来是意大利画家若阿基姆-拉斐尔·博洛纳利的作品。几天之后，多热莱斯在《马丁》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执达员的笔录，题目为《学院派驴领导》。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好奇者急忙去看“驴子的画作”。

闹剧在蒙马特的小酒馆里持续了很长时间，给蒙马特高地受挫的艺术家以慰藉。从此，“洗衣船”的革新家们迎来了声誉和好运。



第三章　艺术家同好会

居住区和画室

在蒙巴那斯，19世纪，数百间画室和艺术家的住处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蒙巴那斯住宅区和"不动产交易"。几乎同时，在蒙马特，富裕的移民蜂拥而至，他们把乡下的房子拾掇一新，改建得更加雅致和舒适。毕加索熟悉的很多画室和画家组织都在蒙马特扎营筑寨。更妙的是，许多艺术家公寓平地而起，如"可怕的蒙马特艺术家集中营"，位于奥德内尔路，简直是物尽其用；诺尔樊大街24号公寓，魅力十足，像"不发愿修女修道院"，与巴黎同属一片天空。

蒙巴那斯和蒙马特地位的差别，在于蒙巴那斯是首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路四通八达，发展渠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蒙马特，最令人不解的是，直到1900年，交通还很闭塞；如果没有车的话，即使从泰尔特广场出发，去趟巴黎，也不是很方便；崎岖的小道，陡峭的楼梯，让人眩晕，到了冬天，更是变成可怕的"劣质烈性烧酒"。

毕加索经常光顾的艺术家别墅，位于埃热西佩－莫罗路，在蒙马特的公墓边上，他的朋友费尔南多·佩泰住在那里，后来，费尔南多·佩泰当选为巴塞罗那美术学院院长。毕加索还经常出现在图雷拉克路的木炭画家别墅。塞尚在蒙马特有一间画室，是他在巴黎的落脚处。

从西涅克到电影艺术家尼古拉·舍弗，还有卡里埃，卢梭，马尔库西及夫人艾丽斯·阿利卡，艺术家们住在这座根本不像别墅的别墅里。这里是蒙马特最古老的艺术家聚居地。早在1860年，在很多地图上已经出现了它的名

字。

位于图雷拉克路22号的木炭画家别墅，是所有别墅中最“年轻”的。建在古老楼阁里的工作室，见证了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别墅分布在一座杂乱的花园里，摆满了废弃的雕刻，道路以曾经创造过蒙马特神话的艺术家命名：维莱特、福兰、布尔波……

雷诺阿在“雾堡”有一间画室，位于图雷拉克路和科兰古路的交叉口。雷诺阿经常遇到瘸腿的土鲁兹－劳特累克，拄着拐棍。劳特累克的邻居韦尼蒂安·让多梅内吉，个子矮小，意大利人，是个有些天分的画家，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我们应该拥有阿德里亚蒂克的情妇那样的女人。”他对《新阿泰纳》的作者嚷道，用一种挑衅的语调，胡子竖起，眼珠滴溜儿转。

“我把她给你。”雷诺阿心平气和地回答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

国土解放以后，雕刻家科拉马里尼占用了勃那尔的大画室，后来，科拉马里尼为让－路易·巴罗做了室内装修。

德兰，在野兽主义年代，就住在木炭画家别墅。德兰常在房间里接待弗拉曼克和“毕加索集团”的艺术家。德兰房间里堆满了“破烂货”，毕加索见后甚是惊愕，他们简直是志同道合。毕加索喜欢在“破烂货”中四处翻找，发现了德兰从弗拉曼克手中买的著名的“方”白色面具，德兰当时正迷恋黑非洲艺术。在他家，类似的东西数不胜数：古希腊小雕像、古坎佩尔陶器、中国瓷器、贝宁黑人木版画和青铜雕刻品、法约姆肖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青铜像、流行艺术品、天文学和数学仪器……后来，他的门路越来越广，竟然搞到柯罗的佳作、皮伊帕尔利埃小姐画像、热罗姆·博斯的《极乐园》的复制品、还有塞尚、修拉、雷诺阿、马蒂斯、布拉克、毕加索的作品。德兰一直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55年，德兰的收藏被拍卖，其中一件卖到了7500万的好价钱。

德兰学过工程学，他梦想发明新型飞机飞上天。德兰用一些靠橡皮筋驱动的模型做试验，最后的结果：要么把挂在墙上的画搞坏了，要么飞机模型被家具上的古陶器压烂了。德兰还迷恋音乐，曾经把一架从跳蚤市场买来的旧管风琴重新装上，为弗拉曼克演奏巴赫和库伯兰的音乐，和生活在蒙马特

高地的其他穷艺术家相比，德兰无比优越。深厚的文化底蕴，滔滔不绝的口才，使他成为同代人的思想大师。

拉维尼昂广场的“洗衣船”、科尔托路12号公寓，很快变成蒙马特最古老的艺术家聚居地。杜飞、奥东·弗雷兹、莫迪里亚尼他们则住在这两点辐射出的“次艺术家别墅”。

“该死的三一体”

上个世纪初，在蒙马特高地底部，盖尔马胡同周围，新建了很多画室。布拉克、瑟弗里尼、郁特里洛、杜飞住在5号公寓。吉诺·瑟弗里尼——未来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潘潘在莫尼卡的舞蹈》的作者——一直深深怀念他在盖尔马胡同度过的日子。

吉诺·瑟弗里尼讲道：“当时，我住在崭新的小楼里，庭院很大。里面的房子都是要租的。我租了一楼角落的一间，杜飞则租了旁边的一间，布拉克在二楼租了两间。几天后，苏珊·瓦拉东和于泰尔租了底层房间，苏珊的母亲和郁特里洛跟他们住在一起。”

“该死的三一体”开始了，盖尔马胡同成了蒙马特高地传奇历史的一分子。“俄罗斯神话”的最初阶段：1906年，苏珊·瓦拉东爱上了安德烈·于泰尔，当时是特律达马变电站的电工，很帅气的小伙子，金发碧眼，比郁特里洛还年轻，在学画画。苏珊和丈夫穆西斯分开后，10年间，穆西斯一直负担着苏珊的生活，她生活安逸，毫无后顾之忧。后来，苏珊·瓦拉东和这位18岁的小电工生活在一起，感情不冷不热。她的老母亲和儿子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苏珊·瓦拉东的宝贝儿子，莫里斯·郁特里洛，才23岁，却是蒙马特高地大名鼎鼎的酒鬼，绰号“酒罐”。

晚年，吉诺·瑟弗里尼总在回忆过去，回忆他特殊的邻居。

“从磨房舞会出来，经常碰到郁特里洛，被人们围着，有人抓着他的胳膊，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我就走上前说，我认识他，是我的邻居。之后就把他领回家。

“但是，苏珊的画室经常乱七八糟。一天下午，郁特里洛来到我家，满身

是血，脸上和手上伤痕累累，呜咽着，他对我说：‘你看，他们把我整成啥样啦……’我不信，下楼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苏珊把朝向庭院的玻璃门指给我看，门下边的玻璃打碎了。郁特里洛指手画脚地从门前经过，划破了脸和手。还好，不是太严重。”

苏珊·瓦拉东完全沉浸在爱情中，从没把郁特里洛当回事。在苏珊眼中，郁特里洛不光一事无成，还是个扫把星。苏珊、郁特里洛和安德烈·于泰尔之间经常因绘画方法发生争执。郁特里洛讨厌室外写生，在蒙马特高地，总有些家伙像牛虻，打扰他作画，偷颜料，打翻画架。还是比着明信片画画来得顺手。郁特里洛的理论着实惹怒了他母亲，苏珊狂爱写实的画法。

三人共居一室——加上年迈的外祖母，她是郁特里洛成酒鬼的罪魁祸首，总在郁特里洛的汤里对上满满一大杯酒。当时，郁特里洛还只是个8岁的孩子！——盖尔马胡同的日子很短暂。几个月后，科尔托路12号公寓的主人埃米尔·贝尔纳动身去圣·路易岛，苏珊一家也就搬了过去。她和穆西斯结婚时，就在科尔托路有一个落脚地。

从此，郁特里洛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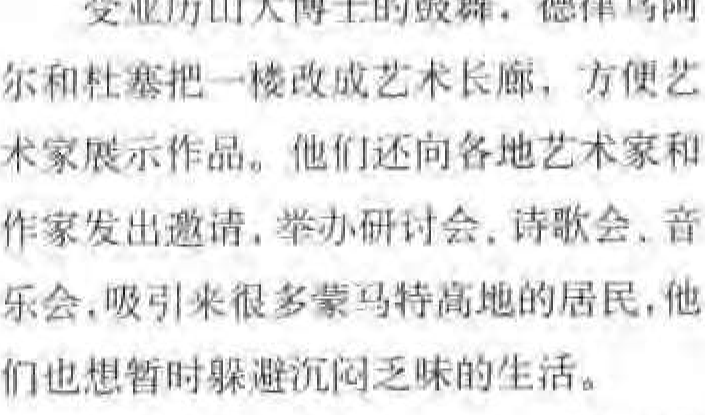
莫迪里亚尼醉酒

德尔塔路的集体公寓，是莫迪里亚尼的“根据地”，也是蒙马特一道独特的风景，比其他房子的历史早了近50年。1906年，莫迪里亚尼来到蒙马特，1909年离开，搬到蒙巴那斯。他就像一颗流星，游走在众多住所之间：“丛林地带”，普瓦利埃旅馆，布斯卡拉咖啡馆，细木工场，让－巴蒂斯特·克莱芒广场……经常囊中羞涩，不名一文。莫迪里亚尼母亲每月给他200法郎，都被他用来喝酒和吸大麻了。没有钱，他就睡在圣－拉撒火车站候车厅的板凳上。

得到生命的“伯乐”——亚历山大博士的资助后，莫迪里亚尼流浪的生活才算告一段落。亚历山大博士想在德尔塔路的一座楼房里建艺术家之村。不过，那幢楼已被巴黎市政府买去，马上拆毁。亚历山大博士和政府达成协议，在楼房拆除之前，先安顿几个艺术家暂时住一下。亚历山大博士帮雕刻



家德律乌阿尔和画家杜塞搬了几件家具，简单却不失品位；红棉布，从跳蚤市场买来的旧扶手椅，屋子顿时温馨舒适起来。



受亚历山大博士的鼓舞，德律乌阿尔和杜塞把一楼改成艺术长廊，方便艺术家展示作品。他们还向各地艺术家和作家发出邀请，举办研讨会、诗歌会、音乐会，吸引来很多蒙马特高地的居民，他们也想暂时躲避沉闷乏味的生活。



年轻时的莫迪里亚尼。

应亚历山大博士的邀请，莫迪里亚尼也来到艺术家之村。他是否在德尔塔路居住过，至今仍是个谜。莫迪里亚尼大概在那里工作过七八个月，主要从事雕刻，仍在雕刻和绘画两种艺术间举棋不定。亚历山大博士建议他放弃雕刻，石屑会刺激他的肺部。莫迪里亚尼索性就在木头上雕刻，他还偷过巴尔贝斯-罗什舒阿尔地铁站（正在建）的轨枕。

莫迪里亚尼嗜酒如命，吸食乙醚、大麻、还有可卡因，德尔塔路的人可不怎么喜欢他。人们或许能容忍他酗酒成性和古怪荒唐，但是，有一次，艺术家们正在如火如荼地讨论美学问题，莫迪里亚尼打碎摆在长廊里的雕塑，撕毁挂在墙上的油画。大家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把他赶走了。

1908 年圣诞节，莫迪里亚尼放了一把火，把挂在大厅里的燕尾旗烧了。那次，艺术家们就很恼火，把他关在门外。第二天，莫迪里亚尼醒了酒，低头跟大家道歉。人们原谅了他，但让他明白，忍耐是有限度的。

莫迪里亚尼离开德尔塔路后，再也没回来过。不久，房子也拆除了：曾经惹人注目取得非凡成绩的艺术家之村，退出了历史舞台。艺术家们各奔东西：哎呀，不幸的德律乌阿尔一战期间被害，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在蒙巴那斯待了几天，莫迪里亚尼又出现在蒙马特。他身无分文，重又当起了流浪汉。杜埃路有一幢旧楼，原来是座修道院，政治和宗教分离后，修女从中搬出来。屋子破旧不堪，四面透风，成了流浪汉的“安居之所”，莫迪

里亚尼和一帮黑人舞蹈演员也住在那里。对莫迪里亚尼来说，德尔塔路悲惨的一幕重演，好在他在那破房子里没待太长时间，他爱上了一个比他还潦倒的女演员，跟她一起离开杜埃路。在安德烈－安冬路停了停，莫迪里亚尼又回到蒙巴那斯，在那里，他获得了生命中的荣耀；还是在那里，死神也降临到他身边。

“蓝色”的磨难

1904年2月底，第四次来巴黎后，毕加索决定在“洗衣船”定居。前几次的旅行，他就拜访过住在“洗衣船”的陶瓷工帕高·迪西奥。所以，毕加索对“洗衣船”奇怪的木板屋已经见怪不怪了。

帕高·迪西奥，在蒙马特待过几年，曾是高更的密友。帕高·迪西奥给毕加索看过高更的作品，自己还收藏着几幅，其中有一幅是高更母亲的画像。帕高·迪西奥跟毕加索谈了很多有关高更的事情，直接影响到毕加索的创作，《抱鸽子的小孩》，运用的就是高更的嵌金属丝花纹技法。



抱鸽子的小孩　毕加索（1901年）

1901年，帕高定居在“洗衣船”。见到毕加索时，帕高已经在“丛林地带”的吉拉尔东胡同找到房子，专门制作陶瓷。帕高·迪西奥建议毕加索租他原来的房间。

在巴黎，帕高·迪西奥给予了毕加索最热心的帮助。万事开头难，刚刚在巴黎安顿下来的毕加索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被称作“被诅咒的画家”。直到


牵马的男孩　毕加索（1906年）

毕加索放弃土鲁兹－劳特累克技法，放弃自己的蓝色风格后，他的作品才算有人问津。沃拉尔、贝尔特·韦尹和塞律里埃给他办画展时，除了费利西安·法居和居斯塔夫·科基奥的评论比较中肯以外，其他的都相当恶毒。几个回合下来，毕加索逐渐消沉，不名分文，忍饥受冻，特别是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侵蚀着他。走投无路，毕加索回到巴塞罗那，回到父母身边。第三次来巴黎则悲惨到家：马尼亚克中止和毕加索的合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许，如果没有马克斯·雅科布诚心热情的鼓励，给毕加索以信心，再想起好朋友卡撒杰马斯，毕加索肯定熬不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我们是迷路的孩子"，马克斯·雅科布回忆道。雅科布忘不了跟毕加索一起走过的岁月，但他从不提，当年，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幽默感把毕加索从死神手里夺了过来。

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巴塞罗那，毕加索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创作激情，在"蓝色时期"，他每天都要画三幅画。毕加索的画标价很高，但总没买主。画商，绘画爱好者，对毕加索画作的主题很失望。太消沉：疲惫不堪的母亲、重病在床的孩子，食不果腹的彩衣小丑，令人悲悯的讨饭者……在他画笔下，所有人都陷入精神物质上的绝望、懒散和颓废之中。第三次去巴黎时，毕加索曾拜访过沃拉尔，向他推荐《牵马的男孩》。沃拉尔盯着那幅画，冷冰冰地说：

"多少钱？"

"我想，20法郎。"

"疯了！！"

"15法郎好了。"

"一文不值！快滚！！"

后来，阿波里奈尔建议毕加索跟画商谈生意。画商瞥了一眼：

“多少钱？”

“150法郎。”毕加索满怀信心地答道。

“好啊，让傻子给你150法郎吧！”

1904年2月，挫败重重的毕加索决定重回巴黎。这次，他下定决心，即使失败也不再回巴塞罗那。毕加索坚信，如果逃避下去，他的生命注定平庸；宁可在巴黎狂热激昂的气氛中饿死，也不陷入平静的家庭生活。“我别无选择”，后来，毕加索无意提起。

“洗衣船”初期

毕加索让“洗衣船”声名大噪，毕加索在那里完成了“蓝色时期”最后的作品，粉红色时期一系列柔情娇饰的画作，来表达对菲南蒂·奥丽维的深深爱恋；最后，曾愚弄过他整个命运的画作：《阿维农少女》，标志着立体派艺术的开端。



阿维农少女　毕加索（1907年）

并不是说毕加索创造了“洗衣船”的神话。木板屋早在毕加索搬进来之前就有了悠久的过去。“洗衣船”原来是1860年左右的一家钢琴厂。雅尼纳·瓦尔诺在他的作品[①]中指出，1867年，锁商弗朗索瓦－塞巴斯蒂安·马亚



①雅尼纳·瓦尔诺：《“洗衣船”》，巴黎，知识出版社，1975。



尔住在“洗衣船”，他姓名的起首字母写在大门的上方。保罗·朗之万的父亲在马亚尔的店里当雇员。保罗·朗之万本人就出生在“洗衣船”。

1889年，“洗衣船”主人委托建筑师保罗·瓦瑟把木板楼分成10间画室，然后租给艺术家。当时，在蒙马特，艺术家和作家诗人蜂拥而至。保罗·瓦瑟并没费多少脑筋，仅把每一层用木板隔开，分出很多小过道和荒唐无比的台阶。

“洗衣船”的设计很奇特，令人困惑不解。靠庭院只有一层，写着13号。拿破仑三世的神父拉维尼昂给庭院命名为埃米尔·古德。顶层有些倾斜，对着加罗路，地下室有三层，反正是乱七八糟。

室内设备更是滑稽可笑，通风管穿过整座楼。一年冬天，一位德国房客爬上屋顶，打扫堆



洗衣船外景，摄于1904年。



洗衣船外景，摄于1904年。



洗衣船外景，摄于1904年。

在工作间窗玻璃上的雪，结果掉了下去，摔断腰，死了。

“洗衣船”的门房，库德莱夫人，住在13号阿尔封斯·卡尔原来的房间里。顺便提一下，上个世纪初，门房为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库德莱夫人曾无私地资助过艺术家。谈到她时，马克斯·雅科布不无深情地说：“库德莱夫人有点驼背，上了年纪，但精神矍铄，皮肤粗糙，心情愉悦，很聪明，对我们很友善。”库德莱夫人总是准备着肉汤，里面有很多蔬菜，给饥肠辘辘的穷人吃。当时，毕加索就在她的“保护”下。清晨，库德莱夫人会急急忙忙跑到毕加索屋外，猛敲门：“毕加索先生，快起来。快！”她“强迫”他赶紧起床，穿上衣服，迎接早上来买画的人。

还有萨尔蒙夫人，她的“英雄”事迹，可以载人蒙巴那斯史册。萨尔蒙夫人在约瑟夫·巴拉路3号公寓当门房，帕珊、凯斯林、齐博罗弗斯基、莫迪里亚尼都住在那里。萨尔蒙夫人衣着随便，典型的布列塔尼人，特别敏感，她曾为画家们当过水泉女神的模特。不过，有时，萨尔蒙夫人像女巫一样挥舞着扫把维持秩序。凯斯林大声喧哗，猛批；莫迪里亚尼酩酊大醉，倒空他的酒瓶；借钱给齐博罗弗斯基，让他去吃晚餐。

有些门房简直是艺术家的“保护神”：在吕夏·德·沃古拉尔做门房的塞贡岱夫人，就曾给苏丁、克雷姆涅、从犹太区逃出来的俄罗斯犹太人食物，不让他们饿肚子。

“洗衣船”名字的故事。毕加索和朋友们还称“洗衣船”为“猎人房”，很形象很贴切，房间的木隔板特别像阿拉斯加猎人的小木屋。只有马克斯·雅科布和安德烈·萨尔蒙才叫它“洗衣船”，因为房子好像嵌在蒙马特高地的顶上。马克斯·雅科布觉得木板屋远远看去，像块布晾在玻璃窗户上，索性就叫“洗衣船”吧。

早在上个世纪初，“洗衣船”就开始了它的传奇历史。1892年，新印象派画家马克西姆·莫弗拉在“洗衣船”画了不少布列塔尼风景画。研究蒙马特高地的历史学家指出，马克西姆·莫弗拉曾在画室里接待过高更。第一次从塔希提岛回来，马克西姆·莫弗拉和高更在阿望桥村相识，高更还曾在马克西姆·莫弗拉的房间里住过一夜。

莫弗拉颇受人爱戴。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在他家里聚集一堂。阿里斯



蒂德·白里安曾是莫弗拉家的常客；还有阿尔莫雷达集团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毕加索时代，无政府主义者让“洗衣船”蒙受了不白之冤。1908年，安德烈·萨尔蒙搬到圣－樊尚大街，帮他搬家的人警告他说：“不要和楼上那些鬼人打交道，不然，邻居会瞧不起你。我跟你说这个，是看在毕加索的面子上。”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捕风捉影：“洗衣船”的艺术家们日子过得相当平静。肖朗－诺拉克决心为野兽派艺术默默工作一生，画家法韦雷奥和阿尔姆比斯特与他志同道合；凡·唐吉生活窘迫，胡安·格里斯和他共用一间画室；学院派画家雅克·瓦扬，和加瓦尔尼一样，风流倜傥，喜欢捉弄人，但他整日忙于追女孩，根本没工夫做坏事。

毕加索，正和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菲南蒂·奥丽维情意绵绵，如胶似漆。创作和恋爱把他的生活填得满满的，他工作勤奋，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多热莱斯记起，在“洗衣船”，一个人在他的门上挂了块木板，写着：农业开垦者索里奥勒，退休后，从农村来到巴黎，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擅长玩恶作剧。多热莱斯给他穿上蓝色工作服，戴上布列塔尼式帽子，再配上一根短粗木棍，让他站在蒙马特高地上的菜园里。多热莱斯给他拍了很多照片，附有说明文字：最后的蒙马特典型农民。在蒙马特有很多农民，只不过不穿蓝色工作服，也不戴布列塔尼式帽子。

维热尔自杀事件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惨事，让“洗衣船”臭名远扬。1908年年底，德国房客，画家维热尔自杀了：在画室里悬梁自尽，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根本无法解释他的死因。

维热尔极度敏感，来到蒙马特后，深受慕尼黑植物状装饰颓废派学说的影响，野兽派和先立体派艺术让他困惑茫然，不知所措。野兽派和先立体派艺术彻底摧毁他信仰的艺术理论。也许，绝望无助的维热尔只能选择死亡来逃避这一切。

巧合的是，25年后，维热尔画室的新主人雅克·瓦扬也自杀了，死因大

致相同。据说，这位爱大叫大嚷的三流画家曾梦见巴黎残老军人院屋顶下的众神和英雄。一战中，雅克·瓦扬功绩累累，从战场上回到蒙马特，他总是莫名孤独，他看不到学院派艺术的出路。雅克·瓦扬觉得“洗衣船”的艺术变革者的作品滑稽可笑，却成为现代艺术大师。雅克·瓦扬迷茫，觉得自己太失败了，竟然成为蒙马特艺术舞台上的配角。1934年1月，一天清晨，他用从战场上拿回来的手枪向自己的头开了一枪。和维热尔一样，雅克·瓦扬也没有任何遗言。

维热尔性格怪异，他的葬礼很隆重，跟他的画家身份相符。维热尔还被载入蒙马特高地的史册。维热尔的死让“洗衣船”的艺术家们震惊不已，他们决定为他办一次奢华的葬礼，11年前，莫迪里亚尼葬礼的一幕重演。维热尔酷爱色彩、画家和乡村，艺术家们穿上他们最鲜艳的衣服，跟随柩车一直到圣－鲁昂公墓，有人甚至从旧衣商那里租来嘉年华会的化装服。只有帕珊和弗雷德驾着灵车，穿着最合乎常情的黑衣服。

浩浩荡荡的柩车后面，马车车门前有一个姑娘，她向过路人频频送吻。她喝醉了，看到人们脱帽，警察向灵车致敬，自以为是西班牙女王。

葬礼结束后，艺术家们一起去了“蹦蹦兔”咖啡馆，早已把维热尔抛到九霄云外。菲南蒂·奥丽维负责写悼词：“他（维热尔）性格怪异，无法琢磨。”

“美丽的菲南蒂”没有说出，维热尔的死，让毕加索感到恐惧，他决定离开“洗衣船”。毕加索很迷信，他越来越觉得“洗衣船”是个可恶的地方。不久，毕加索和菲南蒂就搬到克利尼大街。毕加索离开后，在“洗衣船”还留有一间画室，放绘画用具。

“洗衣船”依旧是艺术家云集：雕塑家阿热罗，同时，还是名优秀的吉他演奏家；35年后死于集中营的奥托·弗罗于德利克；鲁昂印象派画家皮埃尔·迪蒙；诗人兼《东南》杂志的创建者皮埃尔·勒韦迪；迪兰的高徒让－路易·巴劳尔；胡安·格里斯和奥古斯特·埃尔潘分别在“洗衣船”待了16年和21年。

艺术家们简陋的取暖设备和简单的电器设备一直是火灾隐患。终于，1970年5月20日，一场大火，几分钟内把“洗衣船”烧成灰烬。直到那时，在“洗衣船”，还有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当然，有的只在蒙马特有名气。如：



让娜－德－拉·伯姆，她几次跑进火中，想救出她的30条狗和猫，险些丧命。“洗衣船”那么吸引艺术家的原因，租金低廉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对过去的追忆。身处艺术大师曾待过的地方，仿佛能够亲临他们当时的荣耀，成为荣耀的一分子。一直和“洗衣船”共荣辱的艺术家有：动物雕刻家居约、画家达尼埃尔·米奥和阿尔芒·洛朗索。

火灾前的几个月，安德烈·马尔罗还想把“洗衣船”列为文物。听说这个消息，毕加索不禁感慨：“早该那么做了！”

天才的贫民窟

毕加索时代的“洗衣船”，只是艺术家暂时的容身之所：凡·高、萨尔蒙、马克·奥兰只待了几个月，“洗衣船”只是艺术家们成功道路上的“初级阶段”。想搬家，太容易了，只须一辆车把床和仅有的几件家具搬走。对可怜的库德莱夫人来说，最合她心意的是偷偷搬走。不过，“洗衣船”的租金一点都不贵：毕加索每个月只付15法郎。1918年，一战结束时，胡安·格里斯也只付35法郎。

需要指出的是，拉维尼昂广场的简陋程度难以想象：没自来水，惟一的取水点在一楼，早上，打水要排队，没煤气，没电。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那里才通了电。毕加索总点着一只很大的油灯，到了晚上，画画时，还得再点上一根蜡烛。

木板屋的壁很薄，隔音一点都不好。到了冬天，室内还结冰，如果煤炭商不及时供暖的话，毕加索和菲南蒂只能待在床上。到了夏天，虽然有穿堂风，但屋里依然闷得不行，毕加索画画时，几乎一丝不挂，只在腰上围块绸巾。画室的门大开着，可以看到他的肌肉。毕加索并不讨厌“展览”，相反，还为他赢得很多异性的称赞。

毕加索的画室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热特吕德·斯坦、安德烈·萨尔蒙、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罗兰·多热莱斯、菲南蒂·奥丽维都画过毕加索的画室，出奇地类似，简陋得让人大跌眼镜。画室在朝向庭院的二层，相对于拉维尼昂广场，就是地下室。毕加索的住处有一个小过道，一间卧室，



毕加索在洗衣船画室，摄于1908年。

摆着一只长沙发，把房间占得满满的，好朋友们亲切地称它“迷你房”，浅灰色的墙霉迹斑斑。

1906年，毕加索把“迷你房”改建成一座“爱的殿堂”。他在箱子外面罩了层红布，把和菲南蒂的纪念品放在上面：第一次见面时，菲南蒂系的腰带；毕加索为她画的画像；一朵深红色的纸玫瑰；在克利尼大街的集市上赢得的两只花瓶。

画室的装饰取冷色调，蓝色的窗玻璃，因此，白天显得很长。画室的墙上只有一幅帕高·迪西奥留下的钱币画。最巧的是，毕加索的财运也随之滚滚而来。

屋内乱七八糟，无法用言语形容：画布和画框一直堆到床边，画夹坏了，树脂水彩和墨水画的草图凌乱地散在地上；地板上满是烟头和颜料管；浴缸里堆着画和杂志。屋里，只有一把乡村风格的椅子，椅子腿还长短不一，他和菲南蒂的狗弗里卡拴在上面；一张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黑木小圆桌，洗漱和吃饭用。毕加索还在桌子抽屉里养了只小白鼠。小屋里弥漫着小白鼠、狗、松节油的味道。毕加索很喜欢小动物，在蒙马特，他养过三只暹罗猫，一只乌龟，还有一只长尾猴。

毕加索的起居室里，有一只长沙发，上面盖着块绛紫色棱纹平布，还有一只小箱子，西班牙风格，用做椅子，一个生满锈的取暖炉，都是加尔加罗送的。后来，毕加索又买了几个画架，旁边放着些罐头盒，来冲画笔。“太恐怖了。”50年后，卡恩维勒见到这一切时感慨道。

但其他人的画室也好不了多少。马克·奥兰在“洗衣船”过了一个冬天，



一件家具一件用具都没有：一无所有！他从报社拿了几捆报纸，一捆当床，剩下的当桌子和椅子。睡觉时，身上盖着旧报纸。当然，这是个例外。不过，胡安·格里斯的画室里也几乎什么都没有。毕加索曾酸酸地说，在胡安·格里斯家里，吃铁的臭虫能填饱肚子。格里斯对自己的生活从不在意，画室简陋得无法形容。人们不禁纳闷，他和夫人，还有孩子怎样熬了16个月。穷得买不起童车，只好把襁褓拴在窗户上，让孩子呼吸新鲜空气。


自画像 格里斯（约1912年）

1920年底，格里斯得了严重的胸膜炎，他在床上方支起一块床单，不然，碰到下雨，雨水就顺着玻璃窗滴到身上。

之前，凡·唐吉住在大门左边，人们戏谑地称他为"'洗衣船'的门房"。和格里斯一样，唐吉和夫人还有一个孩子住在一起。他把画架卡在窗户、摇篮和桌子中间。桌子摆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凡·唐吉倒是有一件奢侈品——缝纫机，还有一张沙发床，有时，一丝不挂的模特躺在沙发床上等他画像。凡·唐吉在绘画上获得极大成功，但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每个月，他都给《黄油碟子》撰稿，换回100法郎养家。手头实在拮据，凡·唐吉就跑到大街上卖报纸，去饭馆为客人开车门。对年轻的凡·唐吉夫妇来说，孩子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安德列·萨尔蒙曾和毕加索、马克斯·雅科布一起给凡·唐吉夫人钱，让她买爽身粉，给孩子搽屁股。

1906年到1907年间，凡·唐吉在"洗衣船"只待了几个月。后来，沃拉尔和他签了合同。口袋一有钱，凡·唐吉就在勒马尔克街为夫人和女儿租了一套房子，比在"洗衣船"舒服多了。他还在"疯狂的牧羊人"酒馆后面租了一间画室，待在里面安静地搞创作。和毕加索相反的是，凡·唐吉一点都不怀念"洗衣船"，太艰难了。

尽管"洗衣船"简陋破烂无比，它仍然是艺术的熔炉。上个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潮流都源于"洗衣船"。直到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洗衣船"的

艺术潮流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时代。这一切应该归功于“洗衣船”时代年轻人的天分和活力，是他们高举艺术的火把，向后世传递着。

当年，生活在“洗衣船”的艺术家们都相当年轻：毕加索，24岁；凡·唐吉，29岁；1906年到巴黎时，胡安·格里斯只有19岁。所有的人都对未来满怀美好的憧憬。

1904年，毕加索——“被诅咒的画家”——只身来到“洗衣船”，1909年，他离开“洗衣船”时，简直春风得意。在先锋派艺术领域，毕加索大名鼎鼎；经济上也比较宽裕，还有一位“美丽的菲南蒂”伴他左右。毕加索和凡·唐吉为菲南蒂·奥丽维画了很多幅画像，尤其是凡·唐吉，根据菲南蒂·奥丽维的模样，创造出一种妇女形象：炭黑的眼睛，肉感的嘴唇，成为凡·唐吉绘画艺术的“标签”。

一到巴黎，胡安·格里斯就找到凡·唐吉，称他“大师”；后来，埃热尼奥·多尔专程从马德里赶来，向他表示西班牙年轻画家的崇敬之情，并预言，凡·唐吉的作品有一天会进人“普拉多展厅”，成为“大腕”。1909年，年仅29岁的凡·唐吉，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科尔托路12号的“过客”

在蒙马特，除了“洗衣船”，还有一个艺术圣地——科尔托路12号。雷诺阿离开25年后，那里住着很多艺术家：埃米尔·勃那尔，奥东·弗雷兹，胡奥·杜飞，夏尔·卡米翁。不过，他们都是匆匆的过客。

科尔托路以雕刻家科尔托的名字命名，他是波旁宫三角楣的设计者。需要指出的是，科尔托路12号曾是演员罗西蒙庄园的附属建筑。房子朝向圣－樊尚路，是座两层的小楼，建在一个长满大树的花园中央，遮掩着老蒙马特博物馆。老蒙马特博物馆是巴黎最独特的博物馆，巴黎地区一共有35座博物馆，只有老蒙马特博物馆受外省管辖。从科尔托路12号经过一座棚架，就能到老蒙马特博物馆。

科尔托路12号专为作家和诗人设计，其建筑构造根本不适合绘画创作。上个世纪初，自由戏剧的创始人安德烈·安托万就住在那里，还表演了《胡

萝卜须》；另外，“小红帽”运动的领导者及无政府主义者阿尔姆雷达也曾在此逗留。不过，画家和作家对地点的要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写《穷苦女人》时，莱昂·布鲁瓦住在埃米尔·勃那尔隔壁。莱昂·布鲁瓦是个天主教徒，很有活力。开始，他还和埃米尔·勃那尔相处得很融洽，后来闹翻了，起因于埃米尔·勃那尔家的狗踩在莱昂·布鲁瓦的门垫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易怒的莱昂·布鲁瓦来说，简直忍无可忍。莱昂·布鲁瓦夫人和女儿面色苍白，总穿黑色衣服，低着头，从小酒馆的露天座走过，去圣－皮埃尔教堂作祈祷，莱昂·布鲁瓦经常对着妻女发火。在蒙马特，所有人对莱昂·布鲁瓦的臭脾气都毫无办法。泰坦尼克号失事后，他时不时地跑到小酒馆里，高声宣布：“冰山，就是我。”一想到新教徒一下子淹死那么多，莱昂·布鲁瓦就欣喜不已。

同时，德尔姆特尔于斯·加朗蒂从雅典来到蒙马特，为慕尼黑报纸提供巴黎有表现力的幽默画。他租了莱昂·布鲁瓦的房子，而苏珊·瓦拉东一家老小搬进莱昂·布鲁瓦原来的房子，他们在令人惶恐的环境里生活了20年。

加朗蒂是苏珊·瓦拉东一家“三重奏”的见证人，有时，还参与其中，闹得不亦乐乎：

“我经常给瓦拉东和于泰尔劝架……啊，他们闹得可真够呛！见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我就去把他们拉开。有一次，差点被郁特里洛扔过来的熨斗砸死。铁块穿过我房间的玻璃窗，落在写字台上。

郁特里洛不是冲着我来的，他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夫人还替他找到一些蒙马特的风景明信片……他只是气疯了，其他什么都没想。后来，皮埃尔·勒韦迪就不那么善解人意，他正好住在瓦拉东一家的楼下。一天，他实在忍无可忍，冲着窗子外大叫：‘瓦拉东，快叫郁特里洛停下。不然，我要对着房顶开枪了。’没等听到回答，皮埃尔·勒韦迪就朝房顶开了一枪。苏珊·瓦拉东也火了，打开窗子，冲着他扔下来一只熨斗——又是一只——差点砸着他。郁特里洛继续叫嚷吵闹。”

苏珊·瓦拉东和安德烈·于泰尔与“洗衣船”的其他艺术家几乎没有来往。苏珊·瓦拉东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画家，德加对她赞赏有加，还买了瓦



郁特里洛肖像　瓦拉东（郁特里洛的母亲）（1910年）

拉东的作品。但瓦拉东的美学观和毕加索大相径庭。在苏珊·瓦拉东眼里，只有雷诺阿、土鲁兹-劳特累克和德加。另外，她和毕加索年龄的悬殊，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郁特里洛嗜酒如命，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从一家酒馆到另一家酒馆，没有节制，喝得酩酊大醉，而且惹是生非。安德烈·萨尔蒙在《无止境的回忆》中写道："他（郁特里洛）是个年纪轻轻的醉鬼、不可救药的结巴，避之不及的讨厌鬼。"安德烈·萨尔蒙把住在"洗衣船"的文人墨客的心声表达得淋漓尽致。据我本人收集的资料看，布拉克和卡恩维勒认为阿波里奈尔和萨尔蒙完全缺乏艺术判断力。阿波里奈尔和萨尔蒙喜欢特别的、反学院派、使资产阶级深受打击的作品。而郁特里洛，不是那种画不惊人死不休的类型。郁特里洛作品所蕴涵的全新的强烈的纯洁感和简单性，是阿波里奈尔远远不能发现的，他也从不提及对独立派艺术家和转瞬即逝的秋季沙龙派画家的看法。

在"洗衣船"，勃勃雄心的先锋派艺术家们，很少持相同的艺术观。郁特里洛——地道的蒙马特高地"产物"，波托路的"孩子"——属于工人、雇员、小酒馆老板构成的简单世界，他的作品正是他们精神境界的写照。所以，蒙马特高地居民最先喜欢郁特里洛的画作，他们从中发现了朝夕相处的故乡：厚石板铺成的小路，郁郁葱葱的广场，朴实无华的教堂……郁特里洛是蒙马特高地的颂扬人。

所有的文人中，只有马克斯·雅科布对郁特里洛没有任何成见，反而对他颇为欣赏。郁特里洛还是个毛孩子时，就跟马克斯·雅科布相识。马克斯·雅科布还曾试图说服郁特里洛改变宗教信仰，他经常带郁特里洛去加布里埃尔路的一家乳品店吃东西，借机跟他大谈耶和华。最终，郁特里洛皈依了基督教。苏珊·瓦拉东从来没想过对她儿子进行宗教教育！



不过，郁特里洛不太喜欢马克斯·雅科布。他说，有一天，马克斯用乙醚把他灌醉，还欺骗他，他记不起来到底是怎样逃脱的。



科丹的小巷　郁特里洛（约1910年）

艺术家对郁特里洛的看法和作家们截然不同。弗拉曼克和德兰认为他是一名真正的画家，具有某种野性的天分，让他们自叹不如。郁特里洛是个艺术的“天真汉”，他与墨守成规的学院派艺术格格不入，反倒和弗拉曼克与德兰的自由创作观不谋而合。莫迪里亚尼对郁特里洛尤其感兴趣：他们是“铁哥们”，经常在小酒馆里一起喝酒，或是像流浪汉一样，坐在圣－皮埃尔公园的长椅上大饮特饮。毕加索不无讽刺地说，只有和郁特里洛在一起，莫迪里亚尼才会喝得酩酊大醉。莫迪里亚尼和郁特里洛艺术风格完全不同，他们的友谊不仅仅建立在对酒的共同爱好上，莫迪里亚尼对郁特里洛的艺术才华极为欣赏，为他被家人否定和被警察痛打深感不平。在蒙马特，莫迪里亚尼总是尽最大可能保护郁特里洛，郁特里洛也把他视为惟一的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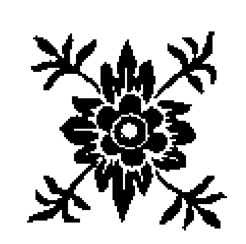
尽管科尔托路的条件也很简陋，但和“洗衣船”相比，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科尔托路的房子虽不奢华，但还体面。苏珊·瓦拉东从各处找来美观的家具摆在屋里。一战后，她搬到朱诺大街，简直成了“家具狂”。

希腊插图画家德尔姆特尔于斯·加朗蒂在朱诺大街一直生活到1966年，屋里的摆设还保留着上个世纪初艺术家的风格：从跳蚤市场淘来的家具；家具旁边摆着轮船模型；长沙发上面盖着东方色彩的毯子；墙上钉着几张泛黄的照片；还有自己组装的管风琴，从鲁奥手里得到的关于德加的评论文章。这

位老艺术家，曾为众多的文学作品制作精美的插图，后来，他离群索居。但加朗蒂平静的生活最终还是被加里马尔打破。加里马尔说他的插图早已过时，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有时，德尔姆特尔于斯·加朗蒂在没人的地方，几小时不歇地演奏巴赫的管风琴曲，回忆他辉煌的过去。他的生命中，只剩下一个忠诚的朋友：安德烈·马尔罗。1976年春季，老蒙马特博物馆组织加朗蒂作品回顾展，他本人为回顾展写的前言成为生命中最后的作品。

加朗蒂预感到死神很快就会降临。他第一次离开了依依惜别的法国和蒙马特，坐上飞机，回到希腊。加朗蒂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回到雅典后不久，加朗蒂就与世长辞，他把生命中最后的光芒又带回他出生的那一片紫罗兰色的天空下。



第四章　毕加索集团

毕加索在蒙马特生活了五年。安德烈·萨尔蒙认为，毕加索时代的“洗衣船”就是“现代艺术调节站”，蒙马特地区的艺术活动达到顶峰。之后，在蒙马特高地的工作间里，仍有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孜孜不倦，献身艺术，但都没有形成气候。毕加索时代狂热的艺术氛围消失不见。遥想当年，在“洗衣船”那可怜的小格笼里，艺术家的天资和想像力投入到创作中。毕加索，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惟一激发先锋派艺术发展的艺术家。在“洗衣船”定居不久，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立刻为他迎来阵阵掌声，毕加索成为蒙马特的中心人物。他独具魅力的画作还吸引了放荡不羁的文化人、陈腐的画家。维莱特、布尔波和德帕基在娱乐报刊上公开嘲讽立体派，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洗衣船”的艺术冲击力。画家、作家、评论家、戏剧家及从学院派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文人墨客，都来到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他们为它迸发出的光芒深深吸引，更为它还不能被常人所认知的影响而欢欣鼓舞。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洗衣船”。

“洗衣船”是一小撮年轻革新者思想和行动的中心，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将丰富时代的艺术情感。

从1906年到1907年，毕加索的朋友，还有他朋友的朋友，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画室。他们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思想开阔了毕加索的精神世界，同时，毕加索的作品和聪明才智也充实了他们的生活。有时，毕加索一边画画，一边听葛楚·史坦和他谈论“洗衣船”来来往往的人们。

沉浸在爱河里的菲南蒂

毕加索的画室之所以独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1904年春天，他刚刚到"洗衣船"时，孤单，忧郁，疑虑重重。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他第一次坠入爱河，人生也随之彻底改变。

毕加索和菲南蒂·奥丽维的相遇相识相知，是很好的电影素材。在蒙马特，是一段经常被人提及的佳话，是毕加索时代蒙马特的重要事件之一。

菲南蒂·奥丽维丰满迷人，是男人们的"梦中情人"。认识毕加索之前，她在"洗衣船"历尽艰难，一无所获。奥丽维一头金色的长发，身材标准，有些轻浮，本名菲南蒂·贝尔－瓦莱，奥丽维是她的"艺名"。当时，很多"社会边缘妇女"——模特，女演员，习惯于吃喝玩赌的"漂亮女人"——都给自己起个"斗争名字"。

菲南蒂·奥丽维出身于一个生产花卉和羽毛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孩提时代，她就懂得要靠自己应付周围的一切。菲南蒂·奥丽维生长的环境与艺术格格不入，不过，幸运的是，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一个下雨天，她的一个舅舅把她带到卢浮宫；她舅舅觉得带她去那儿是个绝妙的主意，既能消遣，还分文不花。她当时特腼腆，在安格尔的裸女画前还低下了头。就这样，菲南蒂·奥丽维对艺术的热爱给激发出来。17岁时，和其他市郊姑娘一样，奥丽维调皮叛逆，离开家，和一个比她大很多的雕塑家保罗－埃米尔－佩尔什隆住到一起。



菲南蒂·奥丽维，摄于1905年。

同居不长，菲南蒂·奥丽维猛然发现丈夫是个疯子，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走几件破衣服，菲南蒂·奥丽维毅然离开了保罗－埃米尔－佩尔什隆。通过奥东·弗雷兹（她姐姐的情夫）和胡奥·杜飞的关系，她来到蒙马特高地的画室，给画家们当模特。



菲南蒂·奥丽维与女友贝耐特塔·卡那尔，摄于1904年。

奥东·弗雷兹和胡奥·杜飞，这两个勒哈弗尔的野兽派画家很欣赏奥丽维的开放意识和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教给她初浅的现代派艺术。

毕加索来到“洗衣船”时，菲南蒂·奥丽维也刚刚安顿下来。他们的相识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克利尼大街，毕加索到颜料商科可兹的店里买绘画用品。菲南蒂·奥丽维引起了毕加索的注意；没多久，在“洗衣船”前的拉维尼昂广场，毕加索见到菲南蒂·奥丽维和其他艺术家走在一起；特写镜头：菲南蒂·奥丽维站立在公共喷泉旁边。早上，“洗衣船”的房客们很喜欢去那里散步。那天，他们一见倾心。其余的就进展很快。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菲南蒂急急忙忙回到住处，毕加索突然出现走廊上，拦住她，开玩笑地递给她一只猫。她笑着接了过来。毕加索趁机邀请她参观他的画室。在菲南蒂的记忆里，那段往事是那么简单，却又那么甜蜜。

“他（毕加索）魅力十足，我难以抗拒。他想认识我时，我也很迫切地想跟他相识。”

对毕加索来说，遇到菲南蒂，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爱情：当时，毕加索已经23岁了，第一次坠入爱河。后来，毕加索只喜欢邂逅的艳遇。毕加索的恋爱完全是西班牙式的，充满激情，但很爱吃醋。他不想让菲南蒂和其他男性接近，就让她待在家里，自己去杂货店和水果店买日用品。菲南蒂慵懒地躺在沙发上，边喝茶边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偶尔点上根土耳其香烟：她可真像“温室里的花朵”。

菲南蒂性情平和，容易满足，懂得机智地掩饰困境，是个理想的生活伴侣。和毕加索共同生活的第一年冬天，她闭门不出，在家里整整待了两个月，

原因是没钱买鞋子。年轻的情人穷困潦倒的生活从来没让她感到任何意外，她爱他，他也爱她……受冻挨饿又有什么？

基希拉岛爱之船不能总是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航行。菲南蒂－毕加索的爱情诞生于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暴风雨也在所难免：吵了，好了，分开了，和好了。葛楚·史坦讲道，1907年初，毕加索和菲南蒂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菲南蒂搬到蒙马特高地顶部，给一帮外国人上法语课。她说一口地道的法语，对市郊的熟语还了如指掌。只不过，学生太少，为了生活，菲南蒂不得不把毕加索送给她的金耳环卖掉。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和她的情人和好如初。

喷泉前的相遇，并不意味着之后的生活也一如既往地无忧无虑。直到斯坦和塞尔日·斯妥基那经常买毕加索的作品，毕加索夫妇的日常生活才得以保证。帕高·迪西奥几次帮毕加索和奥丽维渡过难关。帕高·迪西奥很可怜这对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夫妇，每天早上，他在他们房间门前放上一篮子食物。毕加索对帕高·迪西奥给予的帮助心知肚明，但是，这个迷糊的西班牙人，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穷困生活，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帕高的美意。

弗拉曼克曾讲道，毕加索和菲南蒂经常去阿庸的小酒馆吃中饭，酒馆老板阿庸准许他们赊账。有人听到菲南蒂给他们的狗弗里卡要了一块排骨，噢，原来他们连在肉店给狗买点碎肉的钱都没有。

朋友的“旺季”

尽管穷困不堪，年轻和爱情的魔力还是使日常生活的缺食少穿显得微不足道。“洗衣船”的日子一如既往地幸福愉快：小屋里洋溢着歌声和欢笑。毕加索每天工作到清晨。下午，毕加索起床洗漱，他的朋友纷至沓来。碰上天气好，毕加索索性就在瓦拉斯喷泉边上开沙龙，用粉笔在人行道上为他的朋友画小动物，一笔就画出来，看得围观者惊叹不已。在蒙马特，所有人，无论艺术家，还是普通的村民，都被毕加索的才华迷得一塌糊涂。他个子小小，眼睛深邃，才华横溢，视友谊为珍宝。除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由于雅克琳夫人的反对，毕加索的家里一直是高朋满座。

在蒙马特，毕加索的朋友分成两部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第一组：西班牙人不固定，他们经常往返于西班牙和巴黎，很少有人在巴黎长住。西班牙人一到巴黎，就找巴塞罗那艺术圈或四卡塔卢尼亚集团的老朋友。帕拉雷斯、卡撒杰马斯、诺奈尔、毕加索的雕塑启蒙老师贡扎莱斯兄弟、曾跟他讨论希腊艺术的印象派画家絮罗阿加、第一次到巴黎的旅伴若姆·安德鲁，朱奈尔、埃特克维利亚……都只在巴黎待几个月或几年就打道回府了；有的时不时地来巴黎，如毕加索的密友，回忆录作家萨巴泰斯，于1905年赴乌拉圭，30年后回到巴黎，担任毕加索的私人秘书。



萨巴泰斯　毕加索（1901年）

跟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相对固定。而且，在毕加索方面，也更为重要。在回忆录中，菲南蒂·奥丽维列出了所有法国朋友的名字。在此，特别要说的是里卡尔多·卡那尔，他也住在“洗衣船”。毕加索刚刚到“洗衣船”时，经常去他家蹭饭。卡那尔夫人，贝耐特塔是个居家能手。贝耐特塔以前做过巴托洛梅的模



毕加索与朋友们在洗衣船画室，约摄于1901年。

特，是拉雪兹神父公墓雕塑的原型。

拉蒙·皮肖，四卡塔卢尼亚集团的名人，是毕加索最好的朋友之一。皮肖又高又瘦，简直“耶稣第二”。嘲弄的外表下，皮肖有一颗敏感宽容的心。他的作品一直没有买主，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去旧书店淘古书，再转手卖给美国富豪摩根。胡安·格里斯曾是皮肖的“保护神”，他向皮肖伸出热情的双臂，帮助他改变画风，摒弃原有的幽默讽刺，进行立体派艺术创作。不过，一战后，皮肖对格里斯持敌视态度。而葛楚·史坦是格里斯的维护者，因此，皮肖和葛楚·史坦的关系很僵。

最后，还有马诺罗，本名马尼埃尔·于格，酷似《拉摩的侄子》里的西班牙人，他是“毕加索集团”的重要成员，是蒙马特地区波希米亚生活的代表人物。马诺罗是毕加索在巴黎最早的朋友，他比毕加索年长近10岁。不过，马诺罗对立体派艺术深恶痛绝，除了挖苦，就是讽刺。

马诺罗的闹剧

马诺罗人长得很帅气，他的雕刻风格和马约尔类似。毕加索刚到“洗衣船”时，马诺罗就是个街头小混混，特爱自吹自擂，扬言：“除了杀人，你说我什么没干过？”吹得无边无际。

马诺罗是私生子，父亲是一名西班牙将军，后来去了古巴，做了种植园主；母亲是巴塞罗那一个快乐的寡妇。马诺罗14岁时，母亲去世，他无家可归，开始了流浪生活，整日和强盗、皮条客、同性恋者为伍。他怀疑警察，知晓如何从他们手中逃脱。后来，马诺罗父亲回到西班牙，找当地保安局打听他的下落，真是怕鬼遇见鬼。父子两个的会见妙趣横生，父亲对马诺罗的生活情况很是关切。到处流浪招惹是非的马诺罗在警察局有了不少案底，他父亲决定教育他改邪归正。

马诺罗还非法倒卖赌场门票，远远看见警察走过来，他就赶紧藏到教堂的中殿里。在那里，他一边抽烟，一边欣赏祭坛柱子上的雕刻。马诺罗还流浪到圣家教堂工地，建筑师戈地为圣家教堂设计了很高的钟楼。逐渐地，马诺罗喜欢上艺术。而且，他又多了种谋生手段：在糕点店，把黄油雕成牛或

花。

1900年，马诺罗逃军役来到法国，比毕加索稍早一点。马诺罗极端厌恶集体生活，他宁可逃跑，也不愿长期忍受兵营的杂乱不堪。马诺罗是个积极的民族主义者，为维护君主制度和阿尔方斯八世的统治，他做了很多充满激情的演讲。

在蒙马特，毕加索和马诺罗重逢，毕加索欣喜若狂，他喜欢听马诺罗讲故事。跟毕加索比起来，菲南蒂很谨慎："马诺罗个子小小，出类拔萃，仪表堂堂，脸黑黑的，眼睛黑黑的，头发黑黑的，无忧无虑，爱讽刺人，敏感，懒惰，神经紧张，随机应变，知道如何自我解脱。"菲南蒂对马诺罗不失热情，但总有所保留。她对马诺罗不放心，这不无道理。无论在蒙马特，还是在巴塞罗那，马诺罗的生活和职业令人生疑，坑蒙拐骗，无所不能。马诺罗没钱买粘土和创作工具，三年间，他带着一幅素描四处溜达碰运气。马诺罗还向买画的人推销一种花花绿绿的"彩票"，每张5法郎，和西班牙的彩票很像，长长的小木片上写着号码。

彩票的有效期为3年，但从没开过奖。碰到"彩民"，问马诺罗有没有兑奖，他只是回答："早开过了，大诗人安德烈·萨尔蒙中了头彩。"如此这般，不止一次，搞得萨尔蒙尴尬无比。

马诺罗善于抓住任何一个骗人的机会：趁圣一让教堂出租椅子的人不在，跟信徒要跪凳钱；利用专门发放捐赠物的"修女"搞募捐，他声称"为了穷苦人"。"穷苦人"，就是他自己。

一天，马诺罗在圣－拉扎尔车站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听到两个顾客正在谈论摄影。其中一个抱怨说没有钱买相机，马诺罗彬彬有礼地走上前，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中，并装作无意，流露出他正好有一台照相机，九成新，他想低价出售。问题是：相机抵押在当铺里。

那个摄影爱好者喜出望外，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马上把当票买了过去……相机？自然成了泡影。这张某寄存处的票据又辗转到一个咖啡店伙计的手里，也是去取相机。

讲起这件事，马诺罗不无得意地说："简直做白日梦，竟想拿20法郎换个新相机。"

最能揭露马诺罗无耻嘴脸的是，他居然连曾招待过他给过他东西吃的朋友都骗。帕高·迪西奥去毕尔巴鄂探望母亲，托马诺罗帮忙照看他在“丛林地带”的小屋。帕高·迪西奥前脚走，马诺罗后脚就把迪西奥的衣服卖给旧衣商。帕高·迪西奥个子矮小，旧衣商嫌裤子太短拒收，为此，马诺罗还气得七窍生烟。

善良的帕高回来后，并没有责怪马诺罗。过了不久，没记性的帕高再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马诺罗。马诺罗觉得帕高很大方，马上把帕高收藏的高更作品以500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沃拉尔，太过分了！帕高回来后，简直气疯了，抓住马诺罗的脖子逼他说出买主姓甚名谁。马诺罗解释说：“当时，我快饿死了。我别无选择：饿死，还是卖你的高更。我最终选了你的高更。”

气急败坏的帕高找到沃拉尔，跟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沃拉尔毕竟有些心虚，担心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而他本人也会因犯窝藏罪而被起诉，他才不想惹火上身，同意把高更的画作还给帕高，条件是支付500法郎。

凡·唐吉也被马诺罗骗过，好在损失不大。马诺罗跟唐吉借了15个画框，说有个朋友开画展用。结果，唐吉在阿贝斯路的一家旧货店里瞧见了那些画框。不过，跟帕高不同的是，凡·唐吉没钱把画框重新买回去。

马克斯·雅科布也曾落入马诺罗的圈套。有一天，马诺罗心血来潮，要请雅科布在一家大饭店吃饭。为美食所诱惑，雅科布接受了马诺罗的“美意”。他们点了很贵的菜，引起了饭店老板的特别注意。酒足饭饱之后，马诺罗优雅地把侍者叫来：“买单……还是把警察叫来吧。”

饭店老板不想惹麻烦，把他们赶了出去，吼骂道：“快滚，胆敢再来试试！！”

弗拉曼克讲了很多马诺罗的轶事。一天，马诺罗拿着一张面值20法郎的纸币，想体验一下金钱的魅力。马诺罗碰到一个街头小混混，便把钱拿给他看，说：“如果你能把狗食吃了，这20法郎就是你的。”马诺罗觉得怎么可能吃狗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赌输了，钱没了。

马诺罗住在普瓦利埃旅馆，在“洗衣船”对面，非常破旧。一天晚上，一阵乱糟糟的动静把他吵醒。第二天清早，马诺罗向老板娘抱怨说：“你能不能让其他旅客做爱时，搞的动静小点？”

老板娘回答说："只有一个老太太住你隔壁，今天早上死了。"

黔驴技穷之后，马诺罗和他的同伙巴斯勒——波兰籍犹太艺术评论家兼油画中间人——决定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们分别去找对方认识的人，通知说对方快死了，但连一块裹尸布都没有。结果却让他俩大跌眼镜：朋友为能够永远摆脱他们的纠缠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马诺罗是蒙马特地区无赖的典型：为人狡猾，恬不知耻，忘恩负义。不知怎地，人们还是愿意接受并信任他。

马诺罗的支持者之一，弗朗克·阿维朗，是利摩日瓷器制造家族的后代，优雅高贵，被"洗衣船"的艺术家们称为"款爷"。弗朗克·阿维朗决定按照莫里斯·雷那尔的建议给马诺罗一次机会。从1910年起，弗朗克·阿维朗供马诺罗吃住，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当时，阿维朗在塞雷买了座宅第，他建议马诺罗搬到那里和他同住。绝对的冒险之举：直到那时，马诺罗没有一件雕刻作品问世。他仅仅按照帕高·迪西奥的意思做了几件首饰，还不能有充分的把握断定马诺罗有无艺术天分。

定居到塞雷，标志着马诺罗流浪生活的结束。

35岁时，马诺罗隐隐约约感觉是改邪归正的年纪了。他和拉丁区的一名女招待托托特相识。托托特成为马诺罗终生的伴侣。在爱情的激励下，马诺罗开始创作，而且，在塞雷，除了工作，他也没有别的可做。几年内，马诺罗完成了一系列作品，但规格都比较小，风格粗俗但不乏趣味。和毕加索、布拉克、德兰合作的卡恩维勒开始对马诺罗感兴趣。卡恩维勒代替了弗朗克·阿维朗，成为马诺罗的经纪人。马诺罗还是本性难改。多年后，阿维朗曾和我讲起，马诺罗如何千方百计地从他那里骗走一笔钱，借口是要完成一件大的雕刻作品。八个月后，马诺罗把作品带来了，是一个蹲在地上的妇女雕像，跟个板凳差不多高。对此，阿维朗颇为生气。马诺罗反驳道："她站起来，要有一米五呢！"

一战后的赦免令使马诺罗回到西班牙。几年间，他往返于巴塞罗那和塞雷，最终定居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座温泉疗养站，摇身一变，成为受人尊敬的马尼埃尔·于格先生，艺术学院的教授。马尼埃尔·于格最重要的作品就矗立在塞雷市的一座广场上。人们为了纪念他，还把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莫雷亚斯，读完马诺罗的一首诗歌后（马诺罗也是一位诗人），在他的《百合钟声》中写道："马诺罗先生是个好人。"或许，莫雷亚斯眼光独到。

赴诗人的约会

1909年，毕加索离开"洗衣船"搬到克利尼大街。之前，他用粉笔在画室的门上写下："赴诗人的约会。"

显而易见，尽人皆知。

毕加索的法国朋友大多是诗歌流派的创始人和倡导者。他们对毕加索欣赏有加，因此，毕加索周围的环境对他的艺术发展极为有利，他越来越有艺术品位。毕加索晚年生活在"生活圣母"，那里的气氛让他窒息。

第一次来巴黎，还有随后的两次旅行，直到1904年才在巴黎安顿下来，可以说，当时的毕加索没有最基本的文化修养，会读会写，仅此而已。在四卡塔卢尼亚集团时，艺术家、诗人、作家和记者经常聚集在一起辩论。耳濡目染，毕加索逐渐掌握了一点美学知识。拉蒙·皮肖给他讲印象派艺术；米克尔·于特里利奥·伊－莫兰教他欣赏已被人们忘却的希腊作品；比尔纳－若纳和德国植物状装饰风格大师、北欧印象派画家当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帮他了解源于象征派的艺术运动。另外，巴黎地区的幽默报纸，土鲁兹－劳特累克和斯坦伦的作品都让毕加索大开眼界。

起初，毕加索对文学、哲学、诗歌一窍不通。第二次来巴黎，他和马克斯·雅科布相识，马克斯·雅科布成为他的文学启蒙老师。

毕加索和马克斯·雅科布的相遇缘于在沃拉尔画廊举办的首次个人画展。马克斯·雅科布曾做过艺术评论，他很喜欢展出的几幅作品，并在离开时留下一张卡片，写着几句祝贺的话。画展的组织者马尼亚克意识到，如果能得到大诗人的支持，好处没法估量。马尼亚克找到马克斯·雅科布，邀请他一起去毕加索的画室。雅科布得到别人的重视，很开心，直接跑到克利尼大街，毕加索站在门口欢迎雅科布的到来。第一次见面，他们就签订了合同。马克斯·雅科布长得很滑稽，卡恩维勒说，雅科布的眼睛弥补了他滑稽的外表："他（雅科布）的眼神里有万千柔情，还有对以色列民族命运的担忧。"雅科

布饶有兴致地当着评论家，拿着画作端详，用有表现力的手势表达他的看法。第二天，轮到毕加索去雅科布家：毕加索像个斗牛士一样，由他的西班牙朋友陪着。

真是久逢知己，马克斯·雅科布和他的客人们一起高唱贝多芬交响曲，唱得声嘶力竭，一直闹到深夜。其他人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的时候，马克斯开始读他的诗作给毕加索听。多么令人激动的一刻啊，他们这一生都难以忘怀。“你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毕加索动情地说，即便是他不能完全理解词的含义，至少从诗句的节奏、马克斯的语调中，毕加索感觉出那是篇上乘之作。马克斯·雅科布说，“那天，他得到了一生都受益不尽的鼓舞。”

从此，这两个年轻人简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大诗人主张“爱他就不怕说出他的名字”，对毕加索具有的所有男性－女性品质大加赞赏。这个个子小小的西班牙人才华横溢，马克斯·雅科布为之倾倒。为了毕加索，马克斯·雅科布可以不辞劳苦，可以做出任何牺牲。第三次去巴黎时，毕加索身陷困境，马克斯·雅科布竟然去求他的表哥贡贝尔。贡贝尔在伏尔泰大街开了一家巴黎－法国[1]，雅科布求他让毕加索暂时当仓库管理员。穷困的诗人给了比他还穷困的画家无私的资助。

从1904年到毕加索的作品开始为世人赏识，马克斯·雅科布不仅供毕加索吃住，还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去给毕加索打杂。雅科布亲热地称毕加索“我的孩子”。毕加索一旦被人纠缠，雅科布就动用全部的智慧——幽默、恶毒、故弄玄虚——为毕加索解围。马克斯·雅科布还把毕加索的作品推荐给收藏家，不知是毕加索的才华打动了收藏家，还是雅科布的口才一级棒，反正每次雅科布都能如愿以偿，挎着一筐食物回到“洗衣船”。

马克斯·雅科布发现毕加索欠缺文学知识，又渴望学习，就从诗歌入手，给他讲法国文学。当时，毕加索连法语还不能应用自如，雅科布却给他讲龙沙、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马拉美。毕加索听不懂，但他深受诗歌的熏陶，而且诗歌对他的影响一生无法磨灭。直到去世，在毕加索周围，总有诗人伴他左右。诗人曾是他的“芝麻开门”，在他们引导下，毕加索走进了法国

①商店名。

文学艺术的宝库。

毕加索在巴黎安顿下来，马克斯·雅科布也从巴尔贝斯大街他当裁缝的哥哥家搬了出来。为了靠近“洗衣船”，马克斯·雅科布把家安在拉维尼昂路7号，房间在庭院的一角，像个堆垃圾箱的仓库。毕加索说，那是“画家和诗人互相影响的时代”。

马克斯·雅科布的居住条件很差。他所有的家具就是一张放在四块砖上的床垫、一把旧扶手椅、一张桌子。马克斯·雅科布经常趴在桌子上画树脂水彩画或用纸牌算命。房间阴暗——过了很久，房东才叫人开了玻璃窗——雅科布不得不整天点着油灯。屋里比毕加索“劳特累克时期”画的屏风还消沉，充斥着油灯、烟头、乙醚的气味，令人作呕。马克斯·雅科布也吸食乙醚。

阿波里奈尔来蒙马特之前，在毕加索的生活中，马克斯·雅科布一直担当着重要角色：法国文化“使节”、家务总管、侍从。菲南蒂·奥丽维和毕加索确定关系时，马克斯·雅科布还对她冷嘲热讽。不过，和菲南蒂第一次会面，马克斯·雅科布还彬彬有礼地跟她行了吻手礼，好像在特里阿农宫一样！菲南蒂刁钻狡猾，在马克斯·雅科布面前，假装亲热，故作媚态。

后来，马克斯·雅科布接受了菲南蒂·奥丽维的存在。菲南蒂也懒得和他闹别扭。他们的关系逐渐好转，菲南蒂唤醒了马克斯·雅科布原有的幽默天分。“毕加索集团”讨论艺术、朗读诗歌、模仿歌手时，雅科布就带菲南蒂去看马戏，看电影，去蒙巴那斯的百合钟声。

马克斯·雅科布还干零活维持生计：主要是给人算命。他的作品根本卖不了多少钱：一篇儿童短篇小说才卖30法郎。马克斯·雅科布给议会主席约瑟夫·卡约算过一次命，那一次让他声名远扬。崇拜者保罗·普瓦雷对马克斯·雅科布甚是崇拜，每介绍新的收集品，总找马克斯·雅科布算算吉凶。保罗·普瓦雷给雅科布带来不少客人。每周一，是马克斯·雅科布的接待日，许多马车停在他家门前。另外，他还照着明信片画受小学生欢迎的简单树脂水彩画——用一笔画就能出来——也能有些额外收人。每次，马克斯·雅科布去城里吃饭，总要带上他的画作，期待有钱的朋友会看中一两幅。

1909年11月22日，雅科布声称，在房间墙上见到了耶和华。他把那激

动人心的一幕记在《伪君子的反击》里：

"我住在拉维尼昂大街7号，院子最靠里的地方。那是我记忆中的永远的'教堂'。我躺在四块砖撑起的床垫上思考问题，房东在天花板上凿了几个洞，房间的光线稍稍明亮了些。

——谁这么早就敲门？

——快开门，快开门！别穿衣服。

——上帝！

——十字架太重了，我要把它放一放。

——十字架怎么进的屋？门那么窄。

——从窗户里进来的。

——我亲爱的上帝，快进来暖和暖和吧，外面太冷了。

——看着十字架！

——噢，我将用我的一生凝视它。"

这是马克斯·雅科布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个阶段。他给牧师讲他的幻觉时，牧师们还当面嘲笑他。一战期间，1915年2月18日，锡安的圣师接受给马克斯·雅科布洗礼。毕加索，他的介绍人，给他起名叫西普里安，很滑稽的名字。

马克斯·雅科布模样滑稽，作风轻浮，不过，在蒙马特高地，人们对他还是喜爱有加。他总是彬彬有礼，跟杂货店老板和门房都脱帽行礼。西普里安对身后的闲话和讽刺毫不在意，而且总能给大家友好的建议。

马克斯·雅科布待在简陋的房间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玩塔罗纸牌，煮咖啡，有时，也欣然接受街区妇女给他织的袜子、毛线衫，或者是钱。到了晚上，马克斯·雅科布穿上哥哥给他缝制的考究得体的衣服，喷上香水，潇洒倜傥地参加社交集会，不动声色地推销他的新诗集。半夜，回蒙马特高地时，就在大街上盯同性恋的"梢"，回去后他就有新的忏悔题材了。

弗拉曼克喜欢听马克斯·雅科布讲他的同性恋经历，有警察，有泥瓦工，有肉店的学徒。马克斯·雅科布在大街上还遇见一个，后来还成了名人：莱

昂·儒奥，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

“你会被人敲竹杠的。”弗拉曼克预言道。

不过，弗拉曼克还是继续问马克斯·雅科布。一天，马克斯·雅科布一脸好奇地问弗拉曼克：

“快，告诉我，莫里斯，你对那事还感兴趣吗？”

野兽派画家叫了出来：“我再也不答理你了。”

很快，厄泽说出了对待马克斯·雅科布的绝招：“他（马克斯·雅科布）有很多坏习惯，给他两耳光，他会安静点。”

1910年前后，马克斯·雅科布在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但仍旧是一贫如洗。卡恩维勒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马克斯·雅科布所有的手稿。后来，“洗衣船”的艺术家们时来运转，荣耀和金钱兼得，和胡安·格里斯一样的下场，马克斯·雅科布才思枯竭。毕加索离开“洗衣船”后，和马克斯·雅科布逐渐疏远。马克斯·雅科布觉得自己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无法接受一个人孤零零地和那些笨蛋继续生活在一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崇拜毕加索，偶尔偷偷地埋怨毕加索不仁不义。

阿波里奈尔的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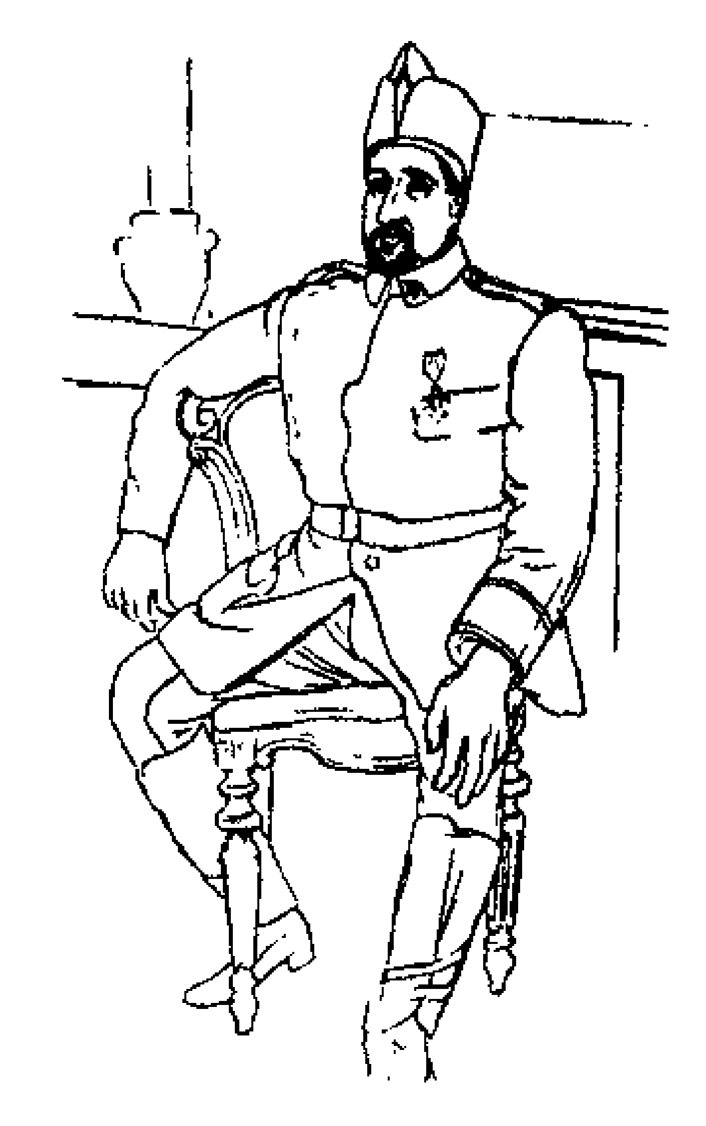
谈谈毕加索和阿波里奈尔之间的关系吧！他们的友谊主要是美学观上的志同道合，而非单纯情感上的相互欣赏。毕加索能够成名，阿波里奈尔功不可没。在绘画领域取得成就后，毕加索曾表示，他的才华和自信与先锋派文学密不可分，而这是马克斯·雅科布所不及的，人们也不相信他能做到。

毕加索和阿波里奈尔的相识缘于莫莱“男爵”。一天晚上，莫莱在阿姆斯特丹路的富克斯酒吧的后厅办晚会。当时，阿波里奈尔每天都在那里等车回维西内他母亲家。一见钟情，对两个男人也适用。毕加索一见到阿波里奈尔，就像当年见到马克斯·雅科布一样，立刻惊呆了。很快，他们开始用“你”称呼，好像老友重逢。

毕加索对阿波里奈尔赞赏不已，后来，还带着马克斯·雅科布去富克斯酒吧，引见他和阿波里奈尔认识。两个诗人还在某些诗歌观点上不谋而合：



“打倒拉法格，兰波万岁。”



阿波里奈尔肖像画　毕加索（1916年）

阿波里奈尔微胖，脸松弛虚肿，嘴巴又肥又小，显得很贪吃，鹰钩鼻：像用猪油刻出来的拿破仑。毕加索给他画了很多画像、素描和漫画，有时把他画成戴着桂冠的诗人，有时把他画成拳击手或举重运动员。其实，阿波里奈尔不是非常胖。有一次，马尔库西看到阿波里奈尔脱衣服，发现了他显得肥胖的原因：阿波里奈尔，像个洋葱，穿着一层又一层的内衣。不穿衣服，他就很苗条。

自从和毕加索在富克斯酒吧认识后，阿波里奈尔几乎天天去拉维尼昂广场，他在位于勒佩尔蒂埃路的勒佩尔银行负责起草证券交易单据。当时，毕加索越来越宽裕，偶尔，阿波里奈尔就去“洗衣船”吃饭。按菲南蒂的说法，在他们家，有“桌布一角”留给阿波里奈尔——毕加索夫妇还没买餐巾，客人们都用桌布擦嘴。“美丽的菲南蒂”注意到，阿波里奈尔不像马克斯·雅科布只在被邀请时才出现。阿波里奈尔做事没有分寸感，不过，还能容忍，毕竟他很友善，而且魅力十足。

菲南蒂感慨道：“（阿波里奈尔）很迷人，有教养，有艺术品位，多么优秀的诗人啊！他不刻意，具有孩子般敏感的心，稚气而魅力十足，不合常情，夸张，却简单、朴实。”

毕加索离开“洗衣船”后，梅特赞热来到蒙马特。他补充说：“是的，和他（阿波里奈尔）谈话让人陶醉。他随便说几句，就能表露出深厚的诗歌功底。他会选差别最大的两件物品做比较，总那么恰到好处。”毕加索的作品得到世人的赏识，也引起阿波里奈尔深深的共鸣。可以说，毕加索画笔下，“蓝色时期”的穷人及“粉红色时期”颀长柔弱的街头卖艺者直接影响到阿波里

奈尔的艺术评论生涯。之前，他只写过两篇简短的德国绘画评论文章。阿波里奈尔对现代绘画几乎一无所知，仅有的那一点，还是弗拉曼克在去维西内的火车上教的。和毕加索认识后，阿波里奈尔为他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与其说是美学分析，倒不如说是情感评论。

阿波里奈尔无比激动地描写了“不再吸引男人目光的妇女”，“被生活压垮的乞丐”，“没人疼爱的孩子”，“受蔑视的风华正茂的修女”，“越来越多的街头艺人”……五年来，毕加索画笔下凄凉而堕落的世界，又在阿波里奈尔的笔下重现。阿波里奈尔用他精彩的文学语言弥补了绘画方面的欠缺。不过，阿波里奈尔的洞察力和辨别力很一般，他所有的感受只能说明他在绘画艺术上一窍不通。弗拉曼克讲道：

“他（阿波里奈尔）只读通俗小说，对着蹩脚的彩色画片说：‘比苏姗的好吧？’

第二次，他会自我安慰说：‘是比苏姗的好。’

他总是满怀猜疑、毫无秩序、无比荒诞地对待所有身边的事物。”

不管怎样，阿波里奈尔还是凭借他的聪明，凭借他对诗歌的感悟，还有语言方面的天分，影响了整整一代热衷于革新的人。没有他，住在“洗衣船”的毕加索和其他艺术家——絮尔瓦热和夏加尔——将会用更多的时间确定他们的地位，树立他们的威望，阿波里奈尔用他特有的斩钉截铁的预期让世人相信毕加索他们的才华。在这一点上，阿波里奈尔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阿波里奈尔从来不为诗歌和文学创作担心，相反，他酷爱低级趣味甚至色情故事——《一万一千个阴茎》——他在摩纳哥的圣－夏尔寄宿中学读书时买的。生活上，阿波里奈尔也不是很讲究：举止随便，穿着走样的花呢西服，衣服口袋被一沓画稿撑得变形。阿波里奈尔还特贪吃，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而且在美食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要知道，人家是在国家图书馆里学来的。弗拉曼克，在他的晚年，还曾和阿波里奈尔争过到底谁是美食冠军。他们约好去餐馆，点菜单上所有的菜，从头盘到餐后点心，谁先求饶，谁付账。一天，阿波里奈尔点了一份半肉汤，然后就投降了。不过，最后还是弗

拉曼克买单，因为阿波里奈尔除了贪吃，还吝啬得要命。

阿波里奈尔和玛丽·洛朗森的恋情也与众不同。玛丽·洛朗森又高又瘦，骨瘦如柴。阿波里奈尔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灵感突现，创作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温情的几首诗篇。

在阿波里奈尔眼中，玛丽·洛朗森无比优雅，一双羚羊般的杏眼。但是画像上的她总是眯着眼睛，像只瘦骨嶙峋的山羊。大概她属于那种寓美于丑的典型，脸部丰富的表情使她真实的美丽更加迷人。就像莫雷亚斯唱的一样：

"光彩隐藏在
她美丽的
眸子里。"

毕加索是阿波里奈尔和玛丽·洛朗森他们的月下老人。毕加索在一家画廊碰到玛丽·洛朗森，当时，她在亨伯特画院为布拉克工作。第一次见到她，毕加索就觉得她是阿波里奈尔孤独心灵的最理想的伴侣。他嘲讽地对阿波里奈尔说："我要送给你一个女人。"接着，阿波里奈尔和玛丽·洛朗森玩笑般地见面了，事实证明毕加索的直觉很正确：他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志同道合，怪异无比。玛丽·洛朗森平常很爱静，但她会冷不丁学马嘶叫几声。她的这一癖好搞得"洗衣船"的艺术家很不舒服。但碍于阿波里奈尔，大家还是忍了下来，但就是不能真正接受她。菲南蒂·奥丽维非常讨厌玛丽·洛朗森，在回忆录中，菲南蒂把玛丽描绘成一个荡妇。菲南蒂·奥丽维无法原谅玛丽曾画过她的一幅漫画，还在下面写着：Pika?o 夫人。

最爱散布流言蜚语的马克斯·雅科布说玛丽曾堕过胎，还写了一首歌，惹得阿波里奈尔大怒：

"啊！我愿意
爱抚你的乳房
让你乐如天使

玛丽·洛朗森！玛丽·洛朗森！”

50年后，毕加索和德兰还不时兴高采烈地唱起这首歌。

聪明而急于成功的玛丽·洛朗森，只得忍气吞声。和毕加索的谈话，她受益匪浅。

在她的回忆录中，玛丽·洛朗森写道：

“我学到的知识都是伟大画家教我的：马蒂斯、德兰、毕加索、布拉克。他们也许不喜欢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我要像卡门那样：‘假如你不爱我，那么我爱你。’”

玛丽·洛朗森如此评价她和毕加索及其朋友的关系。

玛丽·洛朗森很聪明，对立体派艺术，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矫饰风格的版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菲南蒂·奥丽维来说，玛丽的画作完全是从《女士日记》中抄来的。阿波里奈尔简直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竟然把玛丽·洛朗森列入立体派画家的名单。

阿波里奈尔和玛丽·洛朗森的相处一点都不开心。阿波里奈尔习惯于偶然相遇的爱情，他既腼腆又粗暴。1914年初，玛丽·洛朗森再也无法忍受提心吊胆的生活，毅然离开阿波里奈尔，嫁给了蒙巴那斯的一个帅气的德国人，让阿波里奈尔自己待在痛苦的深渊里吧。

“米拉波桥下，流淌着塞纳河。

我们的爱情”

诗人与数学家

在毕加索的艺术生涯中，除了马克斯·雅科布和阿波里奈尔，还有其他诗人，其中，人们最熟悉的要属安德列·萨尔蒙了。他和毕加索来往的时间不长，1909年，安德列·萨尔蒙结婚后，搬到蒙巴那斯，他和毕加索的联系



随之结束。之后，安德列·萨尔蒙主要和凯斯林、齐博罗弗斯基、莫迪里亚尼交往；尽管如此，安德列·萨尔蒙在写到他们时，还是罗列了很多不真实的情况。萨尔蒙，身为《巴黎日报》的编辑，运用一种该受谴责的新闻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写出耸人听闻之事。他不惜歪曲、夸大事实来写一些下流淫秽的趣闻轶事。所以，最好对他的叙述持保留态度。



安德列·萨尔蒙在毕加索"洗衣船"画室，摄于1908年。

在蒙马特，安德列·萨尔蒙先是住在圣－樊尚路的一套古怪的公寓里，房间对着一小片墓地，里面堆满了原来主人收藏的各式各样的座钟和挂钟。后来，1908年，安德列·萨尔蒙搬到"洗衣船"的一间画室里，在毕加索楼下，也就是说，住在底层，他成为"毕加索集团"的一分子，当时，毕加索和阿波里奈尔刚刚认识。

安德列·萨尔蒙生活放荡不羁，但他显得很高雅，穿着极为讲究，很瘦，笨手笨脚，格外腼腆，毕加索给他画了不少有趣的画像。安德列·萨尔蒙爱绷着脸说笑话，最擅长用夸张的上流社会语气讲下流故事。在"洗衣船"，安德列·萨尔蒙最重要的事件是1909年7月14日他结婚了。萨尔蒙夫人很奇特，黑得像拉柩车的马。但是，安德列·萨尔蒙对她却是心醉神迷，死心塌地。阿波里奈尔在他的婚礼上还即兴作了首诗，当然是精心准备过的：

"我们兴高采烈，
因为我的朋友安德列·萨尔蒙结婚了。"

“毕加索集团”的其他人：诗人皮埃尔·勒韦迪，超现实主义的先驱，20年后，他和可可·夏奈尔还有过一段跌宕起伏的风流韵事；还有，评论家莫里斯·雷那尔，后来的立体主义史学家，他非常有钱，住在左岸，经常在家里设宴款待穷困潦倒的画家。

“洗衣船”活跃的生活气氛也有戏剧界的功劳。迪兰不喜欢“洗衣船”，“毕加索集团”所有人都觉得他平淡无奇。“驼背，奇丑无比，还用鼻音说话。”毕加索这样对热内维埃夫·拉波特评价迪兰。“毕加索集团”最喜欢阿里·博锷，他夸张的动作和啰里啰嗦的话语逗得大家大笑不止。“毕加索集团”还给他起外号，他去敲画室的门，大叫：“快开门，是我，锷尔·卡博。”

马塞尔·奥兰性格内向，相当崇拜恶魔主义。他不仅是个才华横溢的演员，还是个杰出的诗人，特别喜欢演“古怪的家伙”。马塞尔·奥兰爱吵好斗，很能和朋友们搞恶作剧，骗马克斯·雅科布说请他吃饭，却把他带到低级酒吧，给郁特里洛灌酒。一天晚上，毕加索给舞台上的马塞尔·奥兰送去一个瓷的不凋花花环，为大家吐了口恶气。几年后，这一幕还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马塞尔·奥兰，英俊的“小阿飞”，没能从战场上回来。在凡尔登战役中，他带领大家向敌人进攻，壮烈牺牲。死后，被追认为英雄。

另外一个“社会边缘人”普兰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毕加索的艺术发展。普兰塞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计算员，他经常在小酒馆里给毕加索和布拉克讲空间几何。后来，人们亲切地称他“立体派艺术数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他和毕加索以及其他画家的谈话让艺术家们有了思考的空间，逐步形成了立体主义。

普兰塞，红棕色头发，蓄着胡子，特爱嘲弄人。不过，命运最终狠狠嘲弄了他一番。他的夫人，美丽的爱丽丝——毕加索第一次到巴黎时就和她认识——易冲动，突然离开他，和德兰生活在了一起。之后，普兰塞一直很沮丧，一家酒馆一家酒馆地喝酒解闷，逃避着曾经背叛他的德兰夫妇。安德烈·瓦尔诺告诉他，失望会导致新的悲剧，普兰塞就把胡子剪短了。后来，普兰塞吸食印度大麻、沉迷于象棋，寻求慰藉。最后，他在索来斯迈斯的本笃会修士身上找到了心理平衡，再后来，他就死在了那里。

法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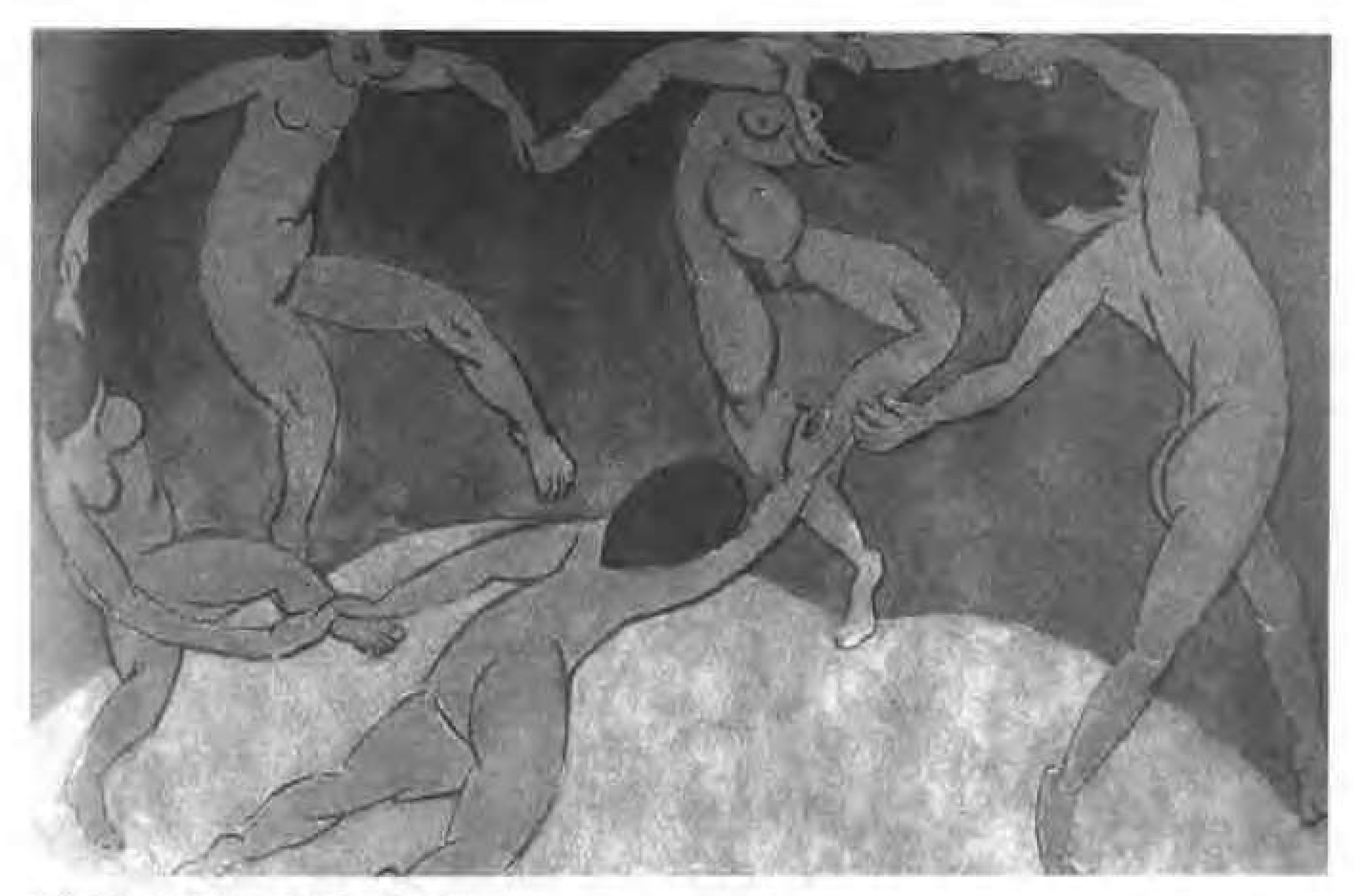


画室中的布拉克，约摄于1910年。

1907年起，在毕加索身边，法国画家逐渐取代了西班牙人。毕加索和德兰、布拉克经常一起热烈地讨论艺术问题。布拉克被阿波里奈尔带到“洗衣船”，欣赏蒙马特高地最富魅力的画作——《阿维农少女》。参观者络绎不绝地来到毕加索的画室，或出于好奇，或是想趁机好好嘲笑一下毕加索。德兰曾对卡恩维勒预言说，人们会发现毕加索就吊死在这幅画后面。不止他，布拉克也不喜欢《阿维农少女》——当时，那幅画的标题是《阿维农的妓院》，是为纪念巴塞罗那的一家妓院而作——布拉克和毕加索争执不休，最后气得离开：“你不要再费口舌了，你的杰作，我们可欣赏不来。”当时，和其他勒哈弗尔画家——奥东·弗里兹和杜飞——一样，布拉克还停留在野兽派阶段。后来，布拉克把在“洗衣船”的所见重新思索了一下，很快，他就由反对毕加索转为协助他创立立体派。

布拉克行为端正，爱穿海军蓝哔叽布西服，后来，受“洗衣船”其他艺术家影响，改变了穿衣风格，改穿蓝色工作服。他在一家拍卖行买了一套库存货，穿在他身上，活脱脱一小灰瓜。同时，布拉克的举止言谈也发生改变；他开始说一些下流话，甚至参与到“洗衣船”房东无聊的笑谈中。

生活一向有条不紊的布拉克，到了星期天，也给自己放假，邀请伙伴们到他在奥塞尔路的画室做客，或是去磨房舞会跳舞，布拉克是个华尔兹高手。



马蒂斯的代表作《舞蹈》，1910年。



马蒂斯的代表作《音乐》，1910年。它们表现了马蒂斯画作“一种协调、纯粹而又宁静”的审美风格。



在所有的法国画家中，德兰对毕加索的影响最大：他们无话不谈，经常连续几个小时地谈论古代艺术。毕加索和德兰一起去卢浮宫参观埃及古代艺术品展厅。还有马蒂斯，他到蒙马特仅仅是为了看看大家在做什么。德兰特别好奇，对任何事情都分析得很精细，但他最大的弱点是疑心很重，经常搞得别人极为消沉，但对他的精神魅力毫无损害。一战后，20世纪20年代，在德兰周围，聚集着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他对他们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当年的毕加索。

德兰，由弗拉曼克陪着，经常在蒙马特高地的饭馆里和艺术家们见面。无论身材还是性格，德兰和弗拉曼克都构成鲜明的对照。弗拉曼克，胖嘟嘟的，总想找一个反对者来辩个你死我活。德兰比弗拉曼克高，比他瘦，笨手笨脚，一战期间，德兰长胖很多，但他的肉松软松软的。

毕加索喜欢和德兰、还有弗拉曼克一起出去。他们三个挺着肚子，扭着肩膀，大摇大摆地从拉维尼昂大街的斜坡走下去。毕加索回忆道："在蒙马特高地，大家很尊重我们，因为我们的衣着，还有我们的肌肉。他们把我们三个当成是拳击手。"

弗拉曼克住在吕埃耶，"绿色的郊区"。他跑到蒙马特，只是为了证实他对艺术圈的厌恶。他不经常去"洗衣船"。弗拉曼克最爱炫耀他的无政府理论，预言"永久的黑暗正在逼近"，让"洗衣船"的艺术家们很是惊讶。他还向人们讲述他的写作主题——弗拉曼克一共发表20多部作品，题目足以说明质量：《都是为了它》，《从一张床到另一张》，《模特的灵魂》……德兰为弗拉曼克的小说画了很多插图，直到现在，人们还为这些插图收藏弗拉曼克毫无文学价值的书。

在此，不能不讲一下毕加索和马蒂斯的关系。和安德列·萨尔蒙完全相反，马蒂斯很受人尊重。当然，马蒂斯举止庄重，戴着金边眼镜，文质彬彬，在放荡不羁的艺术界，显得卓尔不群。人们很友好又不无戏谑地称他"博士"。最搞笑的是，马蒂斯和毕加索就像敌对的俩兄弟，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手——"绘画的北极和南极"——但他们又互相欣赏，他们之间的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最有力的证明是，毕加索的遗产中，竟有十几幅马蒂斯的画作。

1909年，毕加索画室变成一座“大市场”。朋友、商人、收藏家以及评论家接踵而来，影响了毕加索的艺术创作。其实，早在两年前，由于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毕加索不得不放弃晚上的创作。最后，毕加索毅然选择了离开，他看中了克利尼大街的一个配有画室的套房。在奥尔达－德－埃布罗度完假回来，毕加索搬出了“洗衣船”。与此同时，现代艺术的“黄金时期”和蒙马特的“辉煌时代”也宣告结束。



第五章　文艺界的“丛林地带”

“丛林地带”的历史

在蒙马特，还有一个适宜艺术家生活的环境——“丛林地带”。这片地区非常广阔，延伸至蒙马特高地北部，在煎饼磨房和科兰古路之间，19世纪成了贫民窟。“丛林地带”的土质是粘土，很不稳定，只能建小房子，不能盖砖石结构的大房子。为了能获得点收益，土地所有者们很乐意把土地长期租出去。

人们在斜坡上、在长满山梅花、百合、山楂树和玫瑰花的小花园里，用轻型建筑材料——灰泥砖和木板——杂乱无章地建了很多简陋的小屋。一些还被它们的主人精心布置过并仔细维护着；有一些还有个很大的饲养场，养着兔子，甚至山羊。

还有些小屋的材料是货物箱、浇过柏油的纸板和油布，肮脏不堪，简直就像狗窝。其中一座奇怪无比，看着它，人们会禁不住目瞪口呆：主框架是用烂木头搭起来的，大梁由收紧器支撑，整个小屋用油布盖着。它的主人，歌唱家阿聚尔和工程师雷米，他们异想天开，建这个怪房子主要是为了逃门窗税——18世纪，如果在建筑物正面开洞需要交税。当然，阿聚尔和雷米的屋子没有门窗，进去只须稍稍提起油布一角。

警局的收税官根本不听他们的解释，叫来警察，让他们交税。一天清晨，“丛林地带”的人们被街区的警察吵醒——一共四个。在这场冲突中，阿聚尔和雷米大获全胜，他们说服派出所所长，他们无须交税的理由：房子既没窗子也没门。这件事让住在勒皮克路的库特林着实高兴了一把。

“丛林地带”荒无人烟，对蒙马特高地的小家伙们来说，那里是逃学者的天堂。让·雷诺阿小时候，经常去那里捉蜗牛，啊，最好的勃艮地蜗牛！冬天，老人们去采蒲公英；春天，人们去那里围猎。一只家兔先被放回大自然，一帮画家和小孩在后面飞奔，叫喊着追赶兔子，叫得口干舌燥，再去科兰古路的小酒馆里玩闹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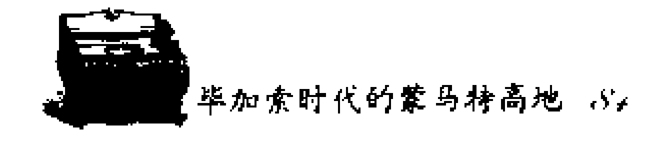
伊莎多拉·迪康和她的学生们还去“丛林地带”跳希腊舞，那里顿成一片欢乐的“沙滩”——“丛林地带”是沙质土壤。伊莎多拉·迪康她们穿着古希腊的短披风和短外衣，光着脚在沙子上跳舞。难得瞥见女性小腿肚的时代，她们的举动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学生们都来自富裕的家庭，戴着贵重的别针手镯。有些围观的人瞎起哄，叫她们不要戴那玩意，有人真的就把珠宝扔到灌木丛里，接着，首饰在旧货商那里换成钱，再换成牛排和红酒。

画家们也来到“丛林地带”，美轮美奂的景色让他们大为赞叹：蒙马特高地的三座磨房俯视着迭复的小屋。早在1886年，凡·高第一次来巴黎就发现了“丛林地带”，还用毕加索和西涅克教他的点画法创作了一幅风景画。之后，蒙马特的“土著”画家纷纷来到“丛林地带”：郁特里洛、基泽、马克莱、还有勒普兰，他最后一个来。勒普兰从马塞来到蒙马特，当时，蒙马特已于几年前开始拆除。

厄泽记得，他和于泰尔在科兰古路的市镇小学读书时，就画过“丛林地带”的风景。有一次，苏珊·瓦拉东遛狗经过就给他们上了一课。看过他们的涂鸦后，苏珊·瓦拉东挖苦他们说：“天空和大地怎么会同一个画法呢？”她的一番“教导”着实让厄泽和于泰尔思索了一阵。

“丛林地带”的居民也是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捡破烂的，废铁商，收兔子毛的，果品蔬菜小贩，给软椅重塞稻草的……有一个奇怪的旧货商，德莱尚，他既是车夫，还是诗人、画商。有时，艺术家和诗人乘他的马车回蒙马特高地，德莱尚就成了他们最忠实的听众。莫迪里亚尼对他很赏识，听德莱尚读诗，还给他讲诗。

一间小屋里，住着一位老人，个子小小，曾获一级教育勋章。20年来，他一直在准备一出马戏：古罗马马车比赛，只不过，车由老鼠来拉，“马车夫”也是小老鼠。



"丛林地带"的日子留给让·雷诺阿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个叫若斯菲娜的鱼商，她的房子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鸡呀，鸭呀，鹅呀，吃得肥肥的，满院子跑；山羊大嚼大咽蔓生的黑莓和多刺的灌木。到了晚上，一天的劳动结束，若斯菲娜把包金的扶手椅拖出来，坐在门前休息。她的消遣是猛烈抨击共和国政府，在她眼里，"那么多部长都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若斯菲娜拥护君主政体，就像伟大时代的市场卖菜妇一样，她梦想回到身穿缎子短裤头戴假发的绅士时代。

若斯菲娜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演员，是一位著名外科医生的情妇；另一个颇有心机，装扮招摇，整个"丛林地带"都为她倾倒。姐妹两个互相忌妒，关系闹得很僵，经常一见面就"开战"：舞蹈演员经常指桑骂槐地说，有个门垫被巴黎所有的人都踩过了；另一个则漫不经心地指责，某一外科医生实在愚蠢到家，竟敢把眼镜忘在病人的肚子里！若斯菲娜希望一家人和睦相处，有时，不得不对两个宝贝女儿动用"武力"。

"丛林地带"的居民主要有三类：艺术家，社会边缘人，小流氓。对年轻的艺术家来说，"丛林地带"是他们艺术生涯的第一阶段。刚刚来到艺术之都，一切都不熟悉，很多人先在"丛林地带"安顿下来，小屋的租金低廉。斯坦伦和布尔波起初就住在"丛林地带"，后来，他们的住处离那里也不远。1910年，亨利·洛朗斯和最杰出的立体主义雕刻大师杜桑-维隆也暂住在"丛林地带"。

凡·唐吉也难"脱俗"，他一下火车，就去投奔住在"丛林地带"的老乡唐·卡特。1897年，他乘坐一班节假日低价旅行列车来巴黎庆祝国庆，后来身无分文，在北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他索性把回程票卖了。

当时，凡·唐吉还没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巴黎之行，他理顺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要达到的目标，他要从荷兰绘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凡·唐吉在"丛林地带"过了一年的流浪生活。凡·唐吉曾在一个鞋匠家里住过，晚上睡在一张行军床上，第二天早上，用滑轮再把床吊到屋顶上。凡·唐吉还住过茨冈人的大篷车。他没钱剃胡子，胡子疯长，像个流浪汉。他为自己的窘相羞愧万分，站在蒙马特高地的大街上，远远望着土鲁兹-劳特累克、雷诺阿、德加经过，却自惭形秽，不好意思走上前，和他们搭话。

每天早上，凡·唐吉都要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一日三餐？他阅遍所有的小启事，然后，一一尝试：沿街叫卖的报童，菜场的搬运工、办公室点炉工，粉刷工……和弗拉曼克一样，夜幕降临，他要去克利尼大街、樊尚门，还有纳里路的集市当角力者的“配角”。先吹牛：“谁敢和我对打？”当然，装腔作势一番，乖乖地被人打一顿，狼狈离开，兜里揣着赚到的100个苏。

一年之后，凡·唐吉无法继续忍受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而且整天为生活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绘画创作。步毕加索后尘，凡·唐吉打道回府，回到德尔夫沙文的家里。三年后，凡·唐吉攒了100盾，重又回到巴黎，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从事绘画创作。

九年后，莫迪里亚尼来到“丛林地带”。重复凡·唐吉的路线，莫迪里亚尼先在玛德莱娜区的一家小旅馆住了几天，随后在“丛林地带”安顿下来。莫迪里亚尼深深陶醉在巴黎如画的美景中，他跑遍整座城市，逛遍巴黎的博物馆。

莫迪里亚尼住在“丛林地带”底部的一座小木屋里，在科兰古路边上。15年后，在那里，开了一家名为“风格”的饭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风格”饭馆成了蒙马特艺术家的食堂。

路易·拉图雷特讲道，莫迪里亚尼在“丛林地带”的第一间画室——搬到蒙马特之前，三年间，莫迪里亚尼前前后后共有十几间画室，旅馆不算在内——应该还是蛮舒适的。屋内的家具简单体面，还摆着一架竖式钢琴，不过没有弦，用沃多瓦的话说，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莫迪里亚尼的画室是德莱尚的仓库。莫迪里亚尼的另一件家当，就是一个浴盆；它陪伴着莫迪里亚尼走遍整个蒙马特地区，一直到蒙巴那斯。和毕加索的做法不同，莫

爱丽斯　莫迪里亚尼（1915年）





横躺的裸女　莫迪里亚尼（1917年）

迪里亚尼从不往浴盆里扔书或报纸，他每天都躺在里面仔细沐浴。

在"丛林地带"起初的几个月，莫迪里亚尼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一战前，莫迪里亚尼还没有什么名气。当时，他在寻找自己的风格，他的自我定位过程相当缓慢和复杂，直到1915年，莫迪里亚尼才开始创作体现他艺术风格的肖像画和裸女图。1906年，做最初绘画探索和尝试的莫迪里亚尼，经常为蒙马特的姑娘们画素描，有时，心血来潮，他就一下子销毁不满意的作品。莫迪里亚尼已经开始酗酒，吸食乙醚，但很节制，不像萨尔蒙、乔治·米歇尔和西形容的那样不可救药。

年轻的莫迪里亚尼，身穿天鹅绒条纹西服，褐色的纽扣衬得他意大利古典气质的脸格外帅气。不过，在爱情上，莫迪里亚尼可不算一路平坦。他曾和一个名叫玛多的女人打得火热。玛多一头金发，颇有几分姿色，之前是毕加索的情妇。安德列·萨尔蒙和阿尔蒂尔·佩方斯歇尔曾说，在蒙马特高地，莫迪里亚尼经常和当地小伙子发生争执，他们觉得他抢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女人。面对爱情，莫迪里亚尼非常"勇猛"，敢于横刀夺爱，并时刻准备与情敌决斗。

在"丛林地带"，雷诺阿也很特别，一年内，他只创作一个主题：身着战袍的士兵和他们的战马在橡树下。他不厌其烦地画呀画，每次只改变一个小细节，比如，小军旗的颜色呀什么的。每个星期，雷诺阿都带着画作，去巴

黎参观画展，或去旧货商挂毯商那里逛逛，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不过，雷诺阿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总能把他的“杰作”推销出去，然后回到“丛林地带”，继续该主题的创作。

蒙马特的海洋

不，在“丛林地带”，尽管有不少怪人，疯子，傻子，但还是有很多作家、艺术家生活在那里。人们不禁困惑，到底是何种力量激励着穷途末路的人不辞劳苦地来到“丛林地带”？

有两个英国人，日子过得极端贫苦，衣衫褴褛，但总整整齐齐。他们举止庄重，彬彬有礼，活脱脱两位英国绅士。他们教蒙马特高地的“布尔波”们打羽毛球，教得非常耐心。要知道，在当时，对法国人来说，羽毛球还是一种很奢侈的运动。

还有一对“男爵夫妇”，鬼知道为什么叫他们“男爵夫妇”。他们每天在附近的小酒馆里抬胳膊肘。由于运动量不够，他们在家里继续练习。一天，“男爵夫人”正练得不亦乐乎，突然倒在“男爵”脚下，死了。“男爵”异常冷静地叫来一个邻居，面无表情地说：“把‘男爵夫人’打扫一下。”

更怪诞的是，皮雅尔男爵的称呼不光可疑，而且让人生厌。他住在“丛林地带”边上，在房间里造了些多桨小快艇。到了春天，皮雅尔男爵就在马恩河上举行赛艇比赛。闲暇时，他总在擦拭他的桃花心木或柚木小快艇，或是打光、上清漆。

皮雅尔男爵是个大海迷，并在蒙马特高地创建了海洋协会，设在泰尔特广场的布斯卡拉饭馆。坎佩尔人马克斯·雅科布，还有生活在蒙马特高地的布列塔尼艺术家们担当名誉会员。皮雅尔男爵还把莫迪里亚尼强拉进来。莫迪里亚尼在一座港口城市出生，和“男爵”的海洋协会多少沾点边。

加入海洋协会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至少去过海边，喝一杯盐水。协会会员每次聚会吃饭，只吃海鲜和鱼；饭后，大家一起高唱水手歌曲，还学海员嚼烟草。协会还负责教蒙马特高地的孩子们游泳，没有泳池和池塘，皮雅尔让学生们像青蛙一样趴在马扎上，教他们蛙泳。一战后，皮雅尔男爵又在

协会节目单上添加了一年一次的远足旅行——去特勒雷波尔或迪耶普。

鸦片的夜晚

令人忧虑的是，皮雅尔男爵酷爱麻醉品。在蒙马特高地，他的小屋是瘾君子的"司令部"。1914年前，法国爆发了由海军军官和殖民地移民倡导的维护毒品运动，主要是维护鸦片。在对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征服过程中，吸食鸦片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那时，只有很少人吸毒，不像现在，毒品简直就是一场瘟疫。毒品是一种"高贵的罪恶"，具有神秘东方的魅力，与19世纪末颓废的社会风气相呼应。而且，整个文学界都在为毒品辩护：《鸦片烟》、《小盟友们》、《克里桑泰姆夫人》、《战役》……它们的作者皮埃尔·洛蒂[①]和克洛德·法雷尔都曾是海军军官，要知道，他们还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

法国与远东地区联系密切便利，因而，毒品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那时，还没有法国缉毒局，吸毒者无须遮着掩着，就能从商人那里买到毒品，而且价格低廉。

在蒙马特，1906年到1909年间，每天晚上，嘴巴里叼着鸦片烟斗去皮雅尔男爵家，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在回忆录中，菲南蒂·奥丽维曾追忆在这位画家－快艇驾驶者家度过的美好夜晚："朋友们，或多或少，坐在席子上，在那里（在皮雅尔男爵家）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客人们喝着柠檬茶，在昏暗的鸦片灯下聊天，气氛友好，这在"洗衣船"并不常见。

在回忆录中，菲南蒂·奥丽维还讲到毕加索也曾去皮雅尔男爵家尝试过乙醚和鸦片。一天晚上，毕加索吸了鸦片，变得异常兴奋，大叫大嚷，扬言发现了摄影术，还要自杀，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不知晓的。后来，毕加索突然就戒掉了鸦片，和那个虚假的世界一刀两断。维热尔吸乙醚过度而自杀。维热尔自杀事件深深震惊了毕加索，他意识到，不悬崖勒马，后果将不可想象。很快，毕加索把吸毒用品全部处理掉，从此，再也没碰过一支鸦片烟。

①法国小说家，作品有《冰岛渔夫》。曾来华活动。

早在来巴黎前，莫迪里亚尼就开始吸毒。对他来说，认识皮雅尔男爵，简直就是天意。在蒙马特安顿下来以后，莫迪里亚尼不仅吸食乙醚，还开始酗酒。一战期间，莫迪里亚尼到了蒙巴那斯。不过，在蒙马特，他还没有任何自杀倾向。不然，鬼知道是什么后果。

皮雅尔男爵不是莫迪里亚尼惟一的毒源。他还从克利尼和比加尹广场的黑市上买回成团的乙醚，乙醚是他的"最爱"。直到晚年，莫迪里亚尼才开始抽可卡因。他在皮雅尔男爵家尝试过鸦片，但他不喜欢。在皮雅尔男爵家，莫迪里亚尼在他的绘画练习本上画了些素描：在一张纸上用铅笔潦草地写着"我找到了方向"，真是荒谬透顶！还有一幅素描：一个卵形的女人坐在一个圆柱的口子上。当时，莫迪里亚尼对锡耶那绘画艺术研究了很多年。

可爱的年轻人

最后，在"丛林地带"，还有些坏蛋，但数量不多。"丛林地带"的居民大多是穷困潦倒的文人，一群"可怜虫"。

和所有警察调查区一样，"丛林地带"也有一些坏家伙。安德烈·瓦尔诺讲道，有时，回到家，得先用枪吓跑闯进他房子的人。就算他的叙述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丛林地带"是危险人物理想的庇护所。

雷诺阿在回忆他父亲的书中，提到两个可爱的年轻人，他们在"丛林地带"有一座漂亮的小木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同性恋。他们把屋子收拾得漂漂亮亮，花很大的气力把花园拾掇一新，还把栅栏刷成白色，种上细草，挂上一连串的彩色字母，木屋洋溢着瑞士风情，小花园的布置呈洛可可式风格。雷诺阿开玩笑，说，再养只牛，就更锦上添花了。

两个年轻人的花园里，树枝上挂满牛铃，稍稍一碰就发出欢快的响声。

雷诺阿很赏识这两个谦恭的年轻人，他们对他也满怀尊敬。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他作品的评价恰到好处，而不落人俗套。偶尔，他们流露出要继承一笔财产，不过……

他们要做的是等警察来。一天早上，警察把"丛林地带"封锁，然后收查年轻人的小木屋。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花园的小路上，放出警犬，攻击木

屋的主人。但是，那两个年轻人早已逃之夭夭。警察在小木屋里翻出一整套造假币的工具和几张百元假钞。

经调查核实，这两个男孩根本不是同性恋，而是合伙人。他们造了50万法郎假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投放到瑞士，他们好像在瑞士买了座城堡。从此，这两个年轻人好像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人遇见他们。

“丛林地带”的终结

很快，从1902年起，“丛林地带”开始改造，前后共用20年时间。最初，先开通了朱诺大街，后来，从科兰古路一直通到诺尔樊路。于是，“丛林地带”的居民逐渐搬出。再后来，一场大火从天而降，人们不得不赶紧搬离。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帕高·迪西奥，他本来住在吉拉尔东胡同，房子很破旧，政府要在那里建苏珊·比松公园。对可怜的陶瓷工帕高·迪西奥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帕高·迪西奥在20年代已经惨遭不幸，卖掉他收藏的高更画作。脆弱的帕高·迪西奥再也经受不住，终于病倒。二战期间，他在圣－安东医院治疗无效，孤独死去。没有一个曾受过他恩惠的人——如毕加索——去看望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带给他友情的慰藉。

朱诺大街的小旅馆于20年代竣工。朱诺大街不仅是“丛林地带”的交通干道，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艺术展览会。布尔波住在13号，他把房子的外墙做了条形装饰，表现蒙马特高地的孩子。郁特里洛住他隔壁，11号。“住”好像不很恰当，应该说：郁特里洛关在那儿。

当年，郁特里洛是他妈妈和他继父的“摇钱树”。1918年后，郁特里洛是个可怜的酒鬼，长住疗养院和精神病院。最后，苏珊·瓦拉东把郁特里洛送到科尔托路的一家医院，还雇了一个身强力壮的护士全职监视他。郁特里洛的不幸遭遇深深触动了加斯东·伯恩海姆，他主动把郁特里洛从医院接走。加斯东·伯恩海姆决定帮助郁特里洛，挽救他的艺术才华。加斯东·伯恩海姆建议苏珊·瓦拉东以郁特里洛的名义买下朱诺大街的一家旅馆。瓦拉东－于泰尔夫妇很快发现，这笔生意让他们损失惨重。

在朱诺大街，郁特里洛没有任何起色，只是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

和在科尔托路时的情形差不多，郁特里洛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房间窗子装了铁护栏，牢固却也不失别致。金钱和舒适的生活并没有给郁特里洛带来幸福感，恰恰相反，他越来越苦恼：到了晚上，苏珊·瓦拉东在餐厅里大摆宴席，客人的笑声和欢呼声不断传到郁特里洛的耳朵里，他烦透了，把房间里的家具扔到地上，以示抗议，提醒大家他的存在。苏珊·瓦拉东对惊慌的客人解释说："没什么，是拉米努！"

拉米努？是他们家的猫！！！

郁特里洛多少总有些改变，毕竟朱诺大街比科尔托路繁华热闹得多。郁特里洛越来越懒于创作，至多一星期一幅，而且质量低下，郁特里洛的作品大多是树脂水彩画和水彩画，而不是油画。郁特里洛整天把头贴在窗玻璃上，注视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老妇女们。有时，他就突然打开窗子，冲着她们打招呼，或是打几手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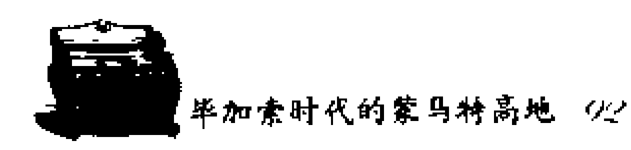
最搞笑的是，郁特里洛一看到警察骑着自行车爬上斜坡，就大吼："无政府主义万岁……"那一刻，他会无比开心，还问布尔波："你听到我大叫了吗？"

街区的人们被郁特里洛弄得心烦意乱，他们知道他并不坏，也毫无办法。听到郁特里洛歇斯底里的鬼叫："笨蛋们，我没疯。我是个酒鬼。"他们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离"丛林地带"和蒙马特不远，住着一位年轻的画家。当时，他还算不上先锋派画家，但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立体派风格。他就是雅克·维庸，本名加斯东·杜桑。他原来住在科兰古路，离"丛林地带"很近。雅克·维庸1898年搬到"丛林地带"，1907年离开。后来，他定居到皮托，他的画室成为立体派画家除"洗衣船"集团的又一"根据地"：菲南蒂·莱热，格莱兹，梅特赞热，拉·弗雷内。

雅克·维庸的宿舍

雅克·维庸是杜桑家的长子——因崇拜诗人维庸给自己取了这个笔名，



父亲在包法利夫人的故乡布兰维尔当公证人，每个月给他150法郎的生活费，雅克·维庸无须为生计发愁，他经常向幽默报纸《黄油盘子》、《法语信笺》、《笑》等投稿，赚些零用钱。雅克·维庸的作品流露着“美好时代”微酸的幽默感。

后来，大器晚成的雅克·维庸把这段日子称作“不可承认的时代”，而且对他当时的作品不甚满意。

雅克·维庸讲道：“我在报业工作的时间不短，我对大众喜好有了初步的了解：要虚构故事，想象场景，抓住事实。当时，报纸对艺术的影响不容置疑。多亏报纸，绘画艺术才从学院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和阿波里奈尔的观点不谋而合。

维庸的艺术风格与街头艺人大相径庭，他思维敏捷，是一位优秀的幽默画画家，擅长运用报纸的技术潜力。在他最初的作品《行走的纤夫和士兵》中就有所体现。

维庸极力表现假日气氛里的蒙马特，情人供养的女人，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学徒，堕落的姑娘，金水滴的坏蛋……雅克·维庸和凡·唐吉、胡安·格里斯合作完成了一幅幽默画，刊登在《法语信笺》上，维庸的幽默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翘着鼻子的女人和一个画家在床上。“你有女人吗？”一位邻居出其不意地问他。

维庸回答：“是的，老朋友，她和一个哥们在一起。”

维庸的弟弟马塞尔1904年来到蒙马特，跟维庸住在一起，也给幽默报纸撰稿。马塞尔，未来的达达主义画家，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讽刺“武器”，后来被人称为“幻想科学司令”。

虽然也生活在蒙马特，跟“洗衣船”的房客们不同的是，维庸不喜欢去“蹦蹦兔”咖啡馆和小酒馆。我问他，他回答说：

“在蒙马特，我和毕加索联系不多。我从来没去过‘洗衣船’。奇怪的是，毕加索第一次来巴黎时，我还见过他。当时，毕加索跟着一帮西班牙人，有几个我还认识。别人给我介绍毕加索，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为什

么！后来，我在勒皮克路又碰到过一次毕加索，他拉着一辆二轮马车，车上装着他的破衣烂衫和他的劣作。我觉得，见到我在笑，他西班牙式的自尊心肯定受伤不浅。为此，他怨恨了我15年。"

毕加索还没有混到赖房租偷偷搬家的地步。维庸肯定对一次简单不过的搬运，做了相当恶意的渲染。

在"丛林地带"，雅克·维庸的生活并不是特立独行，他与邻居们也并非老死不相往来。相反，雅克·维庸和"丛林地带"的"怪人"关系相当密切，和他来往最多的是中产阶级，维庸的房间很有点数世军宿舍的风格。据他邻居弗朗西斯·儒尔丹回忆，维庸的房间简直是怪人的天下：没有画架的画家，没有新闻的新闻栏编辑，罗马奖候选人，不吃猪肉的猪肉食品店学徒，让－皮埃尔·勒韦，未来的法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又高又瘦，活脱脱瓦朗坦·勒·德索塞第二。

比比·拉·皮雷、马塞兰·德布丁、还有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也时不时地参与到聚会中。

比比·拉·皮雷又脏又丑，手脚还不干不净，惹人厌烦，总身着青色西装，头戴大礼帽，是蒙马特高地有名的怪人。住在"雾堡"时，雷诺阿经常给他东西吃，这是摆脱他纠缠的惟一办法。毕加索和维庸觉得他的脸无比有趣，经常给他画像。

比比·拉·皮雷，本名萨利斯·德·萨格利亚，夸口说自己是魏尔伦的朋友，还说魏尔伦曾送给他一本亲笔签名的诗集："我了不起的朋友比比·拉·皮雷惠存。"据说，比比·拉·皮雷的衬衫也是大诗人送的：他人可不换衬衣！比比·拉·皮雷经常不邀自来，堂而皇之地参加各种聚会，自我介绍说："本人比比·拉·皮雷，魏尔伦的密友。"还厚颜无耻地跟别人借钱："嗨，老伙计，快借我10个苏。"

比比·拉·皮雷是有名的"三只手"，他西服的下摆处经常会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闹钟、旧书、厨房用具、破雨伞，是有名的"几进宫"。最过分的是，比比·拉·皮雷常常装出卖东西的样子，趁机跟别人借钱。

在"蹦蹦兔"咖啡馆和蒙马特高地的小酒馆里，比比·拉·皮雷常常朗



读魏尔伦的诗，或模仿让·莫雷亚斯的腔调，说："不能当傻帽，不能说傻话。"

马塞兰·德布丁和雅克·维庸相交不长：马塞兰·德布丁于1902年去世。这位杰出的雕刻家，曾是印象派画家的知音。马塞兰·德布丁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勒迪埃布瓦和新阿泰那咖啡馆。马奈、莫奈、德加、毕加索、雷诺阿都是那里的常客。

马塞兰·德布丁曾和女演员埃伦·安德烈一起为德加的画作《痛苦》当模特。马塞兰·德布丁长得像布里牧羊狗，毛发很重，嘴里衔着短管烟斗，晚饭前，去小酒馆逛逛，到处问："你们见我的烟嘴了吗？"然后，和朋友们边喝酒边聊天。所有印象派画家中，德加和马塞兰·德布丁来往最为密切，德加很喜欢和他侃大山。

同比比·拉·皮雷和马塞兰·德布丁相比，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奇特的流浪汉。维庸和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不知为什么，维庸总亲切地称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表哥"。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微胖，聪明沉着，一言不发，喜欢观察，跟父母同住，从不为生计发愁。每天晚上，在家里舒舒服服吃完晚饭，抽着根雪茄，迈着小步子，溜达到维庸家。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的房间很舒服，不过，他最喜欢穿过巴黎，去蒙马特，露宿街头，睡在一叠旧报纸上。

人们以为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在体验流浪汉的生活，为小说收集素材。其实，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只是很喜欢蒙马特的艺术氛围。

25年后，雅克·维庸和弗朗西斯·儒尔丹讲年轻时代的生活，突然，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去看我的'表哥'。你知道吗，他刚刚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是的，康斯坦丁'表哥'，你不记得了吗？"

康斯坦丁"表哥"就是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一天，莫里斯·康斯坦丁－韦耶神秘地消失。后来，听说他去了北美洲的荒野地区。在那里，他创作出《人只对过去感兴趣》，获龚古尔文学奖。

后来，雅克·维庸终于厌烦了整天聚会不得一刻安宁的生活，决定和狐朋狗友们一刀两断。他毅然搬出蒙马特，定居到皮托，在德芳斯的圆形广场处，地点偏僻，只有三座小楼，藏在一片茂密的丛林里，倒也鸟语花香。维庸在那里生活了近50年，无声无息地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印象主义版画。不过，

不如他的同龄人，如勃那尔、马蒂斯、毕加索他们运气好。维庸大器晚成，到了晚年，他的作品才被画商路易·卡雷发现，后来，终于为世人赏识。雅克·维庸不无玩笑地说："在艺术领域，最艰难的是最初的70年。"

其他的怪人

后来生活在蒙马特的德帕基、德劳·德尔库、还有蒂雷·博涅，没什么好说的。他们的才华足以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也能让他们在艺术领域不断改变自己的风格。但是，在蒙马特，在上个世纪最初的10年，还是有很多疯疯癫癫的人，以艺术家自居。罗兰·多热莱斯在他的作品《文人群》中列举出一系列情况。多热莱斯像只老掉毛的公鸡，整天鼓吹他的民族主义信仰。他曾是保罗·戴鲁莱德的知音，他们一同进入特别最高法院。罗兰·多热莱斯住在加布里埃尔路，他在屋顶上建了座观景楼，经常站在上面，拿着望远镜，观望街区来来往往的人们，搞得邻居们指责他有偷窥癖。

富尼埃，一位前陆军上尉，住在勒马尔克街，屋里塞满了箱子、猎枪和软木太阳帽，他总待在昏暗的房间里画风景。马克·奥兰最喜欢听他讲旅途奇遇。

弗洛罗，也叫菲罗，是个空想画家，住在奥尔尚路，后来，他把画室改建成商店。弗洛罗最喜欢高谈阔论，他经常收留无家可归的人。不过，他们必须耐心地听他长篇大论。只有上帝知道，弗洛罗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啊！除了画画，他更喜欢写有关仙女、女神、农牧神的文章，还曾梦想装饰巴黎先贤祠的圆屋顶。弗洛罗经常以做模特之名把姑娘们带回家，有一次，他从泰尔特广场遇到一个模特，被毕加索用做《卖花女琳达》的原型。后来，这幅画被热特吕德·斯坦买走。

在蒙马特，还有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于连·卡雷，既是诗人，还是作家，真正的职业是法院书记员。于连·卡雷最喜欢在小酒馆里给大家讲故事，这是他惟一的爱好。后来，他索性自己开了一家小酒馆。在圣－西尔－上莫兰买下几座旧房子，乔治·德洛最早在巴黎附近发现的一个小村庄，后来，皮埃尔－马克·奥兰就定居在那里，于连·卡雷的"清煮蛋"商业饭馆也就吉

日开业了。

于连·卡雷的"清煮蛋"商业饭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整个蒙马特高地的居民都来捧场，饭馆一直红红火火到1904年。

最后，还要介绍另外一位特别的人物：乔治·布兰丁布尔。一讲到这位幽默作家的奇遇，弗拉曼克就会乐得手舞足蹈。乔治·布兰丁布尔是《法语信笺》的新闻栏编辑。

要指出的是，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还有凡·唐吉，他们生活在蒙马特高地，却从来没专门写文章，描述当时的生活。而恰恰是生活在郊区的弗拉曼克给后人留下一部活的蒙马特编年史。

涉足文学界之前，乔治·布兰丁布尔是达达主义者，还是"窟窿哲学"的创始人，他的哲学理论很简单："我们从一个窟窿里来；靠一个窟窿呼吸，生存；最后又要回到窟窿里。"

弗拉曼克讲道：

"布兰丁布尔住在奥尔德内尔路的最高处，房间破烂不堪。他所有的家当就是几个包装箱，还有一堆破烂玩意。但他从不发愁。一天早上，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在咖啡吧里遇见他。

他对我们说：'来我家吃中饭吧。'

几个小时以后，他为我们打开门。桌子上，只有三只没洗干净的小碟子，和一盒打开的卡芒贝尔奶酪。几小块肉丁在锅里炖着。布兰丁布尔把肉丁倒在一只铺满小扁豆的平底锅里，然后，又倒进盘子。

'请自便。'他一边说，一边坐到包装箱上。饭桌上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吃了一点卡芒贝尔奶酪，喝了一小杯红酒。

'你们真是资产阶级。'布兰丁布尔极其不屑地对我们说。"

"太有趣了。"讲到这段回忆，弗拉曼克不禁感慨道。50年过去了，弗拉曼克还没意识到，当年，布兰丁布尔，这位幽默大师，曾痛痛快快地讽刺过他一把。

第六章 "蹦蹦兔"咖啡馆的晚会

诗人的小咖啡馆

来谈谈"蹦蹦兔"咖啡馆吧，它简直是蒙马特的代名词。在它的传奇故事中，有很多空想诗人、才华横溢的画家，他们饿着肚子，用乙醚驱散他们的苦闷；还有骨瘦如柴的说唱艺人，他们自编自演，逗大家开心，自己却食不果腹。1905年到1910年间，对生活在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们来说，"蹦蹦兔"咖啡馆确实是个吸引人的地方，是不羁文人的文化中心。正经诗人，如：马克斯·雅科布、阿波里奈尔、萨尔蒙、还有勒韦迪，从来不在那里露面；而罗兰·多热莱斯、卡尔科、马克·奥兰等人却是那里的常客。

"蹦蹦兔"咖啡馆客人的数量和"质量"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一开始，主要是拉丁区的医科学生，他们去那里去唱自创的荒唐无比的歌曲。50年后，毕加索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那些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和卷发女孩共舞》、《马车夫夫人》、《八月三十一号》……全都登不上大雅之堂。不过，他喜欢，喜欢歌曲的旋律和歌词。

除了戴着黑丝绒贝雷帽的大学生，还有艺术家、诗人、作家、记者，他们也特别喜欢去"蹦蹦兔"咖啡馆，晚上去那里坐一会儿：它可是村子里的小客栈。

在蒙马特，在"丛林地带"的小屋，在"洗衣船"，在科尔托路的小酒馆里，会碰到一些"社会边缘人"，他们荒诞古怪，令人焦虑不安。安德烈·瓦尔诺谈到一个彪形大汉，脸红红的，像个杀手，穿着灯芯绒的衣服，手里握着一根又短又粗的木棍，经常要给客人看手相（当然要付钱）。通常，人们慑

于他的淫威，只得乖乖地把手伸给他看。人们猜测，他可能是某一流氓集团的成员，或者干脆就是警察派来的，或者合二为一。

瑟弗里尼记起，当年，年轻的弗朗西斯·卡尔科看起来像个歹徒。1908年来到蒙马特时，卡尔科留着钩状鬓角，戴着红色的头巾。瑟弗里尼讲道："卡尔科对大家很友好。他嘴里总哼着马约勒的歌，还模仿马约勒的动作和表情，把大家逗得不行。"先达达主义者于勒·德帕基的故事和歌曲也在"蹦蹦兔"咖啡馆赢得阵阵掌声。"于勒先生"还从布斯卡拉旅馆搬到离"蹦蹦兔"咖啡馆很近的地方，便于他时常光顾那里，有时还趿拉着便鞋。

夏尔·迪兰经常在"蹦蹦兔"咖啡馆给大家读波德莱尔或魏尔伦的诗，然后拿顶帽子跟大家讨钱，他实在是快要饿死了。贝尔特，弗雷德夫人，总在迪兰离开前，递给他一块厚厚的猪肉三明治。白天，可怜的迪兰，就学街头歌女，沿街给大家读诗，偶尔，有人会从窗子里扔出几个铜币，他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生活。最惨的是，有一次，他竟然在狮子笼子里读诗，一个晚上可以赚到5法郎。曾身临这一幕的人们都说，当时，他的声音压过了狮子的吼叫。

国土解放以后，毕加索想起曾和热内维埃夫·拉波特合作过的一位演员，直到那时，毕加索还对他获得成功惊叹不已："人们认为他完全不是块当演员的料：驼背、奇丑无比、说话带有浓重的鼻音。"就是在"蹦蹦兔"咖啡馆，一天晚上，他碰到了他人生的伯乐——戏院老板罗贝尔·迪米埃尔。迪米埃尔要他进行一次试演。几天后，他参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出。就这样，他一夜成名。

然而，他还算不上"蹦蹦兔"咖啡馆的明星。弗雷德，"弗雷德老爹"，真名弗雷德里克·热拉尔，才是"老大"。是他，用已逝去很久的腔调，那把走音的吉他唱那些久唱不衰的歌曲：《樱桃时光》、《爱的快乐》，还有德尔梅的老情歌，他还在吉他上弹和弦。菲南蒂·奥丽维不喜欢他，在她的回忆录里说他根本不识乐谱。尽管如此，他的哼唱在"蹦蹦兔"咖啡馆相当有市场。

弗雷德很特别，是个勇敢的家伙，他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弗雷德个子很小，留着胡子，像个城堡伯爵，蓬乱的眉毛睫毛里闪烁着狐梗式的眼睛。他集鲁宾逊、阿拉斯加猎人、卡拉布里亚匪徒三类人的衣服于一身：厚



灯芯绒绑腿塞在靴子里面，冬天戴一顶无边皮软帽，夏天就围一块红色头巾。弗雷德为人热情，对所有人都用"你"称呼，喜欢跟人交流思想。打眼看，他压根儿不像小酒馆的老板，他一点都不惟利是图，钟爱囊空如洗的客人。他一旦知道客人口袋里连一毛钱都没有，就取下帽子，为客人搞"募捐"："某位先生手头有些紧……谁好心，"弗雷德就靠这种办法，委婉地把客人拖欠的账单搞定。其他客人也不是傻子，但到最后，他们还是很友好地把钱掏出来。"蹦蹦兔"咖啡馆午夜12点半打烊。等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弗雷德把窗子关好，然后让几个食不果腹的人进来吃东西。摩勒"男爵"和马诺罗经常一起在那里共进晚餐，马诺罗可是晓得所有填饱肚子的法子。

吉诺·瑟弗里尼讲道：

"我住在盖尔马胡同时，正在创作《潘潘在莫尼卡的舞蹈》，那幅画太大了，普通的画架根本放不下，他（弗雷德）很同情我，对我说：'我那儿有一个画架，可能合适。'我们就一起去了蒙马特高地，他从一个旧箱子里抽出几块木头。背着木头，他和我一起又回到我的画室，然后做了一个画架送给我。虽然破旧，但很结实。我就可以不费力地画底下的部分。画到上面时，苏珊·瓦拉东借给我一只小板凳。这样，我像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无比舒适地待在房间里画画。

作品完成后，我把画架还给他时，他说：'你留着吧，看见它，还能想起我。'我一直把它视为珍宝，它让我永远记着那位助人为乐的好心人。"

类似的故事还很多很多：人们把弗雷德看做是蒙马特高地的鲁宾逊。不经意间，他就创造出了热情友好的氛围。

"弗雷德老爹"的职业生涯

一开始，弗雷德并不是小咖啡馆老板。他原来是个流动鱼商。每天清晨，他就扮成布列塔尼渔民的样子，去巴黎中央菜市场进货，回来时，他的小毛驴洛洛背上驮着一筐筐的鱼。然后，刚刚起床的蒙马特高地的主妇们就听到

弗雷德沿街叫卖的声音。

后来，弗雷德决定开酒馆，随之，洛洛也“退居二线”，开始作威作福。人们用萝卜、香烟、美酒“讨好”它。到了冬天，牲口棚太冷，弗雷德就把洛洛牵到咖啡馆的大厅里，铺上干草，让它躺在壁炉旁。没有人感到惊奇，反而觉得别有生趣。

开“蹦蹦兔”咖啡馆之前，弗雷德先是经营“倒霉蛋”饭馆。饭馆很简陋，位于克莱芒广场的拉维尼昂路上部，离“洗衣船”只有几步远，位置很偏，周围还有一大片荒地，一共有三个很小的房间，一条长长的走廊。弗雷德在其中一间的地上放了些啤酒桶，既当桌子，又当柜台。屋顶上吊着五颜六色的纸横幅，是“倒霉蛋”饭馆惟一的装饰。

其他两间为熟客专用。有些客人从上午10点一直坐到午夜12点半饭馆打烊。主要是：小商贩、小手工业者、艺术家，特别是从奥塞尔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围坐在佐·达格扎身旁聚会。

刚到巴黎的毕加索，曾被马诺罗和其他在蒙马特高地定居的西班牙人带到“蹦蹦兔”咖啡馆。在那里，他们一待就是一个晚上，只“享用”一份火腿炒蛋——半个法郎——和半瓶啤酒。弗雷德很喜欢这帮西班牙人，他们是他的老主顾，而且从不惹是生非。弗雷德决定专门留一个房间给他们聚会。毕加索他们欣喜若狂，皮肖和毕加索忙活着重新布置小屋。毕加索画了《圣-安东的诱惑》，还有一幅很大的萨巴泰斯的画像，皮肖画了桑托斯-迪蒙飞艇飞过埃菲尔铁塔。后来，“倒霉蛋”饭馆拆除，这些画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倒霉蛋”饭馆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时常有争执，甚至打斗，摔杯子，摔酒瓶，甚至，还时不时听到枪声。

皮埃尔·马克-奥兰，在《圣-樊尚路》一书中，讲述了一次打架事件。三个酒鬼喝醉酒，在“倒霉蛋”饭馆闹事，被赶出来，他们不服气，叫来100多人捣乱，用石块砸窗玻璃，扬言要弗雷德的命。弗雷德和几个客人本来有充足的时间藏起来，但他们还是不顾敌强我弱，顽强抵抗了近两个小时。皮埃尔·马克-奥兰写道：“火苗在噼啪作响……万幸，没有人烧着。”第二天清早，警察全副武装，从阿贝斯广场出发，把“倒霉蛋”饭馆包围起来。一切又平静如初。

当时，那帮西班牙人吓了个半死，根本不敢迈出屋子半步。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偷渡者——马诺罗，就是个逃兵，偷越边境来到法国——他们担心警察怀疑，缩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弗雷德向他们打包票：跟着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危险一过，弗雷德跑到西班牙人聚会的房间里，发现他们像一群吓破胆的孩子。弗雷德手里握着半瓶啤酒，正儿八经地对他们说：“别害怕，干杯。不是天天都这样，来，再干！”

从那时起，弗雷德开始对毕加索有好感。后来，巴黎警察局认为“倒霉蛋”饭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贼窝，下令弗雷德关门停业。1903年，弗雷德接手了“蹦蹦兔”咖啡馆，他和毕加索之间的友谊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蹦蹦兔”咖啡馆是蒙马特高地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它的前身是一家马车车夫住宿的小客栈。19世纪80年代初，幽默画家兼诗人安德烈·吉尔改建成艺术家和文人的咖啡馆，就像它的招牌诠释的一样，咖啡馆里的气氛轻松活泼——最初的招牌现藏于老蒙马特博物馆——一只滑稽的兔子从一口锅里跳出来，爪子上有一瓶酒。

当时，“蹦蹦兔”咖啡馆又叫“杀手咖啡馆”，不是影射客人是杀手，而是因为大厅里挂着一套介绍特鲁波曼“赫赫战绩”的画作。咖啡馆里鱼龙混杂，客人多是去听安德烈·吉尔朗诵抨击资产阶级、抨击警察和军队的诗歌，而根本没注意到墙上挂着的图画。客人们政见不一，这正是曾诞生过巴黎公社的蒙马特的魅力所在。小商人、市政府的雇员们和小流氓们共聚一堂：有的从孩提时代就认识，有些还一起去市政府上班，他们都用“你”称呼。绅士们的原则是和小阿飞们井水不犯河水。皮条客们很不喜欢“老实人”，妓女们在“老实人”中很没有市场。慢慢地，正经人不怎么去咖啡馆，那里成了无耻的皮条客的天下。安德烈·吉尔死后，靠妓女养活的皮条客们成了咖啡馆的主人。

“蹦蹦兔”咖啡馆，原来的“杀手咖啡馆”，位于索利路和圣－樊尚路的交叉口，在蒙马特高地的半山腰上，只有一层，屋顶上铺着平瓦。屋内，有一小间房当吧间，后面是大厅，里面有一个壁炉。还有一个菜园，菜园里有一株很大的刺槐树，到了夏天，相当舒服。一个夏夜，毕加索曾把卡恩维勒带到这里，欣赏圣－德尼平原的星空。



“蹦蹦兔”咖啡馆外景

1886年，蒙马特爱丽舍夜总会原来的舞蹈演员，阿代勒，接替安德烈·吉尔开始经营“蹦蹦兔”咖啡馆。阿代勒可是个勇敢的姑娘，能说会道，一点都不担心“问题”客人。阿代勒充满活力，而且深谙如何获得大家的尊重。为了纪念原来的主人，她给咖啡馆重新起名为阿·吉尔（A. Gill）小兔咖啡馆，叫来叫去就成了“蹦蹦兔”咖啡馆。

阿代勒不仅做得一手好菜，而且能言善辩，擅长活跃气氛，嗓音悦耳动人。她和同伴，歌手于勒·儒伊轮流为大家唱歌。她低声哼唱，那些抒情歌曲催人泪下：《贝瑞的故乡》、《法兰西美丽的土地》、《两枝郁金香》……

那时，“蹦蹦兔”咖啡馆的客人里根本没有大学生和艺术家，人们大多从蒙马特高地或金水滴或贝尔维尔来，有点像美国西部沙龙，加了蒙马特的色彩。

1903年，阿代勒已经经营“蹦蹦兔”咖啡馆达17年。17年间，她赚了不少钱，觉得该休息休息了，就把“蹦蹦兔”咖啡馆卖掉，在蒙马特高地－潘松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在诺尔樊路顶头的小木屋开了家小饭馆，有点猎人的风格，美其名曰：山区木屋饭馆。在毕加索时代，那里是蒙马特高地惟一一家三星级饭店。“洗衣船”的艺术家们很少有机会去那里吃饭，菜价高得离谱，他们不得不望而却步：2法郎，含酒水。后来，春风得意的阿波里奈尔、德兰、弗拉曼克逐渐成了那里的常客。另外，阿代勒还和弗雷德夫人一起照料过郁特里洛。当时，郁特里洛没能力给家里挣钱，他母亲苏珊·瓦拉东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

“蹦蹦兔”咖啡馆的新主人不是弗雷德，而是阿里斯蒂德·布律昂，他在骑兵军帽咖啡馆唱歌，攒了点钱，而且接管“蹦蹦兔”咖啡馆对他来说，的



确是"天时地利"。他住在圣－樊尚路的另一头，离"蹦蹦兔"咖啡馆很近。阿里斯蒂德·布律昂很欣赏弗雷德的经营风格，就让他代管"蹦蹦兔"咖啡馆。这对弗雷德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后来，阿里斯蒂德·布律昂逐渐把"蹦蹦兔"咖啡馆完全交给弗雷德管理，他自己回到故乡库特内安度晚年。阿里斯蒂德·布律昂死后，把"蹦蹦兔"咖啡馆留给了弗雷德。

"新老板上任"，弗雷德着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重新装修咖啡馆，而是赶走赖在那里的小流氓。要知道，他在开"倒霉蛋"饭馆时就深受其害。不过，那可不是个轻松的活，他和小流氓间时常发生争执，直到1918年，弗雷德才获得最后的胜利。之前，弗雷德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关注着可疑客人。一旦觉察出有坏人出现在咖啡馆门口，弗雷德就友好而不失严厉地把他们请到门外理论。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阻止一个流氓把一位诗人打昏……那个流氓不喜欢拉辛！而那个可怜的诗人当时正把一本拉辛的剧作摊在桌上，还在那里摘抄他觉得精彩的诗句。起初，小流氓以为他在写便条给警察通风报信。他手指一弹，就把书打翻到地上，然后抓着诗人的衣领，吼道："去你妈的拉辛！"一拳打在诗人脸上，诗人欲辩不能。

这件事闹到了轻罪法庭，毕加索和马克斯·雅科布出庭作证。出庭时，毕加索衬衫领带，还戴了个大礼帽。对马克斯·雅科布来说，则是个不可多得的表现他幽默感的机会，他把整个法庭上的人搞得大笑不止：包括法官，律师，还有犯罪嫌疑人。

不过，在弗雷德和小流氓的斗争中，不总是以闹剧收场。1911年，上演了一出惨剧：一天晚上，维克多，弗雷德的女婿，被一个曾走进咖啡馆讨钱的流氓一枪打在额头上，当场死去。

与此同时，弗雷德开始重新装修"蹦蹦兔"咖啡馆，咖啡馆的风格大变：红色丝绸蒙着吊灯，屋里的光线微微泛红半明半暗；壁炉旁放了很大的石膏基督受难像，是雕刻家瓦斯雷的现实主义作品；墙上挂着画家朋友的画作：毕加索有名的自画像，苏珊·瓦拉东的油画，三幅郁特里洛的作品，还有不计其数的吉里厄和布尔波的作品。到了冬天，劈柴在壁炉里噼啪作响，气氛暖融融的，人的心也暖融融的。

文人俱乐部

平常，咖啡馆里总是稀稀拉拉：人们可以随意待在任何一个地方。到了周末，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100多口人挤在两个厅里，屋内烟雾缭绕。乙醚、啤酒、劣质蜡、饭菜、长时间不洗澡的体味混杂在一起。（当时，只有妓女和病人才经常洗澡。1914年前，许多人身上都因为脏而发出刺鼻的味道。）

周六和周日的客人不完全一样。在“蹦蹦兔”咖啡馆，经常有一些人，他们来蒙马特，主要是为了和艺术家们打交道。巴黎各阶层的人都有：雇员，小资产阶级，被供养的女人和她们的情夫们，猎艳的青年人。有时，一位钢琴师替弗雷德打理咖啡馆，弗雷德自己向大家展示他的艺术才华，边弹吉他边唱歌。他用小声哼唱，人们不得不保持安静，否则，根本听不清他唱什么。弗雷德很能活跃气氛，他的贤内助贝尔特又做得一手好菜，所以，“蹦蹦兔”咖啡馆里总是人声鼎沸。菲南蒂·奥丽维不无醋意地说，“晚饭最好在‘蹦蹦兔’咖啡馆里吃”。在阿代勒的饭馆，天哪，一餐饭至少要两个法郎，艺术家们哪里支付得起？在“蹦蹦兔”咖啡馆，能品尝到科西嘉的葡萄酒，或一种弗雷德用石榴红果汁、樱桃酒特制的“混合酒”。一枚樱桃放在烧酒里，添加了不少艺术味道。



小嘴乌鸦女人　毕加索（1904年）

1904年，毕加索定居到“洗衣船”后，和弗雷德重逢，他简直欣喜若狂。毕加索非常喜欢“蹦蹦兔”咖啡馆，这让他想起巴塞罗那，想起巴里奥·希诺的夜总会，当年，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美妙的夜晚。弗雷德则敞开双臂欢迎毕加索，他们早在弗雷德经营“倒霉蛋”饭馆时就很谈得来。他几天不见毕加索，就亲自带着洛洛去“洗衣船”看他。弗雷德知道毕加索很喜欢小动物，知道他见到



洛洛会很开心。说到洛洛，它在毕加索画室的表现可真是差劲，经常把画纸和烟盒搞得一团糟。

1905年，毕加索把他的《小丑自画像》送给弗雷德，他和弗雷德之间的深厚友谊可见一斑。画面上的毕加索正在和一位很优雅的女士一起吃饭，——很有可能是在"倒霉蛋"饭馆——女士头上戴着一顶插满羽毛的帽子。画的背景是弹着吉他的弗雷德。这幅不可多得的杰作，现收藏于美国，当年，就挂在"蹦蹦兔"咖啡馆大厅的墙上。



毕加索在蒙巴那斯，约摄于1912年

1918年，弗雷德需要一大笔钱付酒水账，只好把那幅画卖给了瑞典芭蕾舞剧团的创建人罗尔夫·德·马雷先生：价格低得可怜，不过，弗雷德觉得很满意。他在艺术上是多么蒙昧无知啊！当得知那幅画值卖价的10倍时，弗雷德才开始后悔不已。

贝尔特的女儿马尔戈曾给毕加索的另一幅名画以灵感：《小嘴乌鸦女人》。马尔戈差点成了皮埃尔·马克－奥兰的妻子，她驯服了一只小嘴乌鸦，这件事深深吸引了毕加索。他让她斜靠在小乌鸦的身上，和鸟儿说话。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07年以后，毕加索就很少光顾"蹦蹦兔"咖啡馆了。偶尔在夏夜，他会去露天座乘凉，从不渴望那里是否有文化气息，对弗雷德的艺术修养，他心知肚明，也无所谓。毕加索喜欢去，是因为那里的氛围和四卡塔卢尼亚集团很像。后来，《阿维农少女》让毕加索声名鹊起，"蹦蹦兔"咖啡馆其他的艺术家和作家都很好奇，很多人开始密切注意他，甚至跟他胡搅蛮缠。尽管当时还不太流行收集名人的手稿，但已有人开始拾集毕加索在桌子一角下意识画下的素描。毕加索终于忍无可忍，发火

了。一天晚上，一帮德国艺术家专程从蒙巴那斯来到“蹦蹦兔”咖啡馆拜访毕加索。毕加索掏出手枪，向空中打了几枪，把他的崇拜者吓得抱头鼠窜。再后来，他新结识的朋友——斯坦姐弟，塞尔日·斯图基那还有画商烦得他分身无术。惹不起，总躲得起。一到晚上，毕加索就离开蒙马特高地，去蒙巴那斯，去克利尼广场的咖啡馆，去梅德拉诺杂技场，去电影院，去百合钟声酒吧。蒙巴那斯的繁华逐渐吸引了艺术家的目光，蒙马特却日渐萧条。在“蹦蹦兔”咖啡馆，几乎见不到毕加索的身影。卡尔科和多热莱斯的描述纯属虚构，故事多发生在他们来蒙马特之前，根本无从考证。

难忘的夜晚

马克斯·雅科布、阿波里奈尔、萨尔蒙很少去“蹦蹦兔”咖啡馆，而且每次都要毕加索陪着。在“蹦蹦兔”咖啡馆，他们不乐意当众朗读他们的作品，腼腆是一方面，主要是他们深信，正经诗歌在那里没有听众。“蹦蹦兔”咖啡馆的客人只喜欢轻佻的歌曲，或是弗雷德弹唱德尔梅的老情歌：《爱的星空》、《马农的诗句》……

在此，还要提一下马克·奥兰，他从不瞎编乱造。他讲起，一个冬夜，他和弗雷德坐在火炉旁，阿波里奈尔和萨尔蒙走进“蹦蹦兔”咖啡馆，外面寒风刺骨，他们要了加热的肉桂酒，边喝边取暖。也许咖啡馆内友好的气氛感染了阿波里奈尔：外面飘着雪花，屋内火炉噼啪作响，他给大家朗诵了一首他的新作，《醇酒集》中的一篇。那是惟一的一次。

马克斯·雅科布很沉默，不爱高谈阔论。不过，有一次，他在“蹦蹦兔”咖啡馆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弗雷德请他在贵宾留言簿写点东西，马克斯·雅科布大笔一挥，一下子就写了一首超现实主义诗歌，表现了在蒙马特寂静夜空下，人声鼎沸的小咖啡馆：

“上船喽！阿·勃尔钢琴

航海日志

巴黎，思索的大海，带来



在夜空下，带到你的门外
哦，小酒馆的老板，雾气缭绕的岸边
一股泡沫。”

德兰、布拉克、凡·唐吉去“蹦蹦兔”咖啡馆完全出于好奇，他们想知道那里到底啥样。弗拉曼克声称他从未踏入其中半步，他是个新教徒，是个相当严肃的人，虽然他不保守，还是无法接受蒙马特的生活方式。50年后，他还流露出他的厌烦之情：

“一整天，大家都在激烈地讨论艺术问题，然后，纷纷离开。我突然感觉很孤单。

我选择了逃离，不愿意和艺术家们相伴。不羁文人的氛围让我沮丧，让我神经衰弱。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巴黎！远离那女人味十足的地方！远离那片爱的荒漠！远离房间里床和洗手间混杂的气味！！

路上，我骑着脚踏车，我疲惫不堪；在塞纳河边的小酒馆里，我吞食着牛排和猪肉馅饼。如果没有恼人的艺术会议，闻不到蒙马特咖啡的苦涩气味，生活该多美。”

未来派艺术家君临蒙马特高地

1911年，“西班牙集团”离开蒙马特高地，他们和毕加索一起开始光顾克利尼和皮卡伊大街的豪华咖啡馆。继“西班牙集团”，“未来派艺术家集团”，经吉诺·瑟弗里尼推荐，来到蒙马特高地，他们人数不多，但是相当有真知灼见。当时，吉诺·瑟弗里尼在蒙马特高地已经生活5年。他讲道：“和我在一起的总是一些幽默画家，如吉诺·巴尔多，还有来自意大利四面八方的艺术家，比西、比热利、皮罗拉、莫迪里亚尼，等等。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都试图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

1911年，未来派艺术家——博西奥尼、巴拉、卡拉、吕索罗——由马里奈蒂带领，来到巴黎，不过，他们在巴黎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幸亏有瑟弗里



意大利未来主义五位代表人物卡拉、马里奈蒂等在巴黎

尼给他们当导游，带他们去了艺术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当然，"蹦蹦兔"咖啡馆绝不会错过。

这次未来派艺术运动持续到1914年，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然，其间难免有丑闻。起初，只是一次单纯的文学事件，倡导者是托马索·马里奈蒂，埃及裔意大利人，在巴黎大学研究文学，马里奈蒂稀奇古怪，满脑子鬼点子，口若悬河，说话夸张、能说会道、仪表堂堂，简直是拍卖人错投到文学战斗中。托马索·马里奈蒂先模仿爱德蒙·罗斯唐，后来转变态度，又模仿阿尔弗雷德·雅里的风格，最终如愿以偿，在文化圈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他意识到先锋派文学比法国沙文主义象征文学更有利可图。1909年2月20日，托马索·马里奈蒂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诗歌宣言，宣告机器和速度时代的到来。人们猜测他的文章只会对年迈的贵妇人，还有约克俱乐部的成员产生点影响，他们才是报纸的忠实读者。

1910年，卡洛·卡拉，吕索罗，还有雕刻家博西奥尼声明他们完全同意马里奈蒂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们曾在米兰碰面。卡洛·卡拉、吕索罗和博西奥尼也发表宣言，把马里奈蒂的观点从文学扩展到了绘画领域。他们确定了9条"清规戒律"：

"必须蔑视所有的模仿形式，颂扬所有的新奇形式。

必须摆脱'和谐'与'品位'的语言束缚，表达方式太过灵活，容易破坏伦勃朗、戈雅和罗丹作品的风格。

艺术评论毫无价值，甚至妨碍艺术发展。

必须清除所有陈旧的题材，尽最大可能表达我们漩涡般的生活，那充满傲



气、骄傲和速度的生活。

必须视'疯狂'为荣耀，因为只有疯狂，我们才得以堵住革新者的嘴。

互补于绘画，就像自由诗于诗歌，复调乐曲于音乐，是必不可少的。

应赋予绘画以活力和感觉。

要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首先要做到真诚无邪。

运动和光线会破坏物体的物质性。"

只有最后一条重要，由此，未来派艺术家们创作出很多充满运动的作品，预示着现代活动艺术的诞生。

在巴黎的最初日子，未来派艺术家们运用幼拙的手法来表达他们的艺术观点。人们总在蒙马特的咖啡馆里、克利尼大街的"幽乡僻野"餐馆里见到未来派艺术家们，有的一只脚穿着红色袜子，另一只脚却是绿色的；有的把裤子挽得老高，引起别人的注意。瑟弗里尼最前卫，用彩带当鞋带。1912年2月，年轻的未来派艺术家们举办画展，他们的幼稚行为引来众多非议。

简而言之，未来派艺术是立体派绘画的变形，运用重重叠放的画法表现运动和速度。阿波里奈尔担心未来派艺术家会对他的立体派画家朋友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于是，对他们毫不留情地打击讽刺。不过，对瑟弗里尼还是留有情面——瑟弗里尼的代表作为《潘潘在莫尼卡的舞蹈》，后来，希特勒认为这本书风格颓废，宣布为禁书。

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之，"未来派艺术家集团"作鸟兽散。只有瑟弗里尼立场坚定，继续捍卫着自己的艺术理论。后来，瑟弗里尼成了法西斯主义者，而且是法西斯主义者的领导人物，除了墨索里尼以外，没有人答理他。还是达农齐奥有远见啊！

刚到蒙马特时，莫迪里亚尼就经常去"蹦蹦兔"咖啡馆。当时，莫迪里亚尼特别腼腆，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也不和艺术家们来往。有一次，莫迪里亚尼喝醉酒后，把吧台上的玻璃杯打碎了，从此以后，弗雷德才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发现莫迪里亚尼也不可小觑。莫迪里亚尼自己觉得很尴尬，就不再光顾"蹦蹦兔"咖啡馆。尽管如此，和毕加索一样，他也经常嘲弄弗雷德的

艺术修养。

不过，正是莫迪里亚尼把瑟弗里尼带到"蹦蹦兔"咖啡馆。本来，这两个年轻人互不相识，在蒙马特高地，他们偶然相遇，瑟弗里尼讲道：

"当时，我刚到巴黎还不到两个月，一直待在18区，也就是说在蒙马特。一天早上，我朝圣心教堂的方向走着，当时，圣心教堂还在建。就在勒皮克路，确切地说，在煎饼磨房前面，我遇见了莫迪里亚尼。当然，那时，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都停了下来，然后就认识了。大家都从意大利来，都是托斯卡那人，还都是画家。老天注定我们成为朋友。"

为了庆祝他们的相识，莫迪里亚尼把瑟弗里尼带到弗雷德的"蹦蹦兔"咖啡馆。后来，莫迪里亚尼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瑟弗里尼开始一个人去咖啡馆，而且认识了几个艺术家。瑟弗里尼为人热情，思维敏捷，逐渐成了"毕加索集团"和"意大利集团"的联系人。多亏他，阿波里奈尔对未来派艺术家不再那么苛刻，并为他们写了几篇赞扬的文章。在写作方面，阿波里奈尔确实才华横溢，虽然自相矛盾，但总能自圆其说。

瑟弗里尼的中间人当的时间不长：多数艺术家离开蒙马特去了蒙巴那斯，他本人也娶了"诗歌王子"保罗·福尔的女儿为妻，于1913年离开蒙马特高地。

"'蹦蹦兔'咖啡馆"的孩子

郁特里洛一直是"'蹦蹦兔'咖啡馆"的孩子：从认识苏珊·瓦拉东起，弗雷德就认识郁特里洛。弗雷德非常善解人意，给这个可怜的孤儿家的温暖。苏珊被安德烈·于泰尔迷得神魂颠倒时，对郁特里洛不管不问，让他整夜在外面流浪。——让·保罗回忆道："我看到郁特里洛吞下一节电池，躺在泥坑里。"——贝尔特经常把郁特里洛带到她的厨房里，给他一块烤羊腿充饥。为了表达谢意，郁特里洛送给弗雷德夫妇他画的树脂水彩画和水彩画。其中一幅画的就是"蹦蹦兔"咖啡馆，本来挂在大厅里，后来和毕加索的那幅"自

画像”遭受了相同的命运。一战期间，郁特里洛开始酗酒，变得爱大声嚷嚷，还很固执，经常纠缠其他的客人给他付酒钱。弗雷德对他不像原来那么热情，并开始拒他于门外。

郁特里洛一点都不记仇，反而去得越来越勤。后来，郁特里洛因酗酒而丧失了记忆力。吕西·瓦洛尔经常让他临摹原来的画作。这就是这位大画家的晚年：受人支配，还干造假的勾当。

“蹦蹦兔”咖啡馆还是“三一体”悲喜剧最后的舞台。194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苏珊·瓦拉东1938年去世——安德烈·于泰尔“接替”郁特里洛，在“蹦蹦兔”咖啡馆喝得酩酊大醉，忘记穿外套就回家了。从酒馆到他家并不远，但他还是被一块石头给绊倒了，在外面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时，发起高烧，感染上了肺炎。吕西·瓦洛尔听说后，赶到他在科尔托路的房子里看望他。安德烈·于泰尔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根本没有办法抢救。这位蒙马特高地的帅男，金发碧眼的电气工就这样结束了他动荡的一生：得病三天后死去。而当时，郁特里洛也是奄奄一息，垂死挣扎，差不多是个活死人。

“蹦蹦兔”咖啡馆也完成了它的英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和蒙马特高地的其他小咖啡馆也没什么两样。不管是蒙马特的历史，还是艺术家们艰辛的生活，都还在继续。

毕加索永远不会忘记那家小酒馆，年轻时，他在那里曾度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1938年，由萨巴泰斯陪着，毕加索旧地重游，在“蹦蹦兔”咖啡馆又一次见到了弗雷德。这也是弗雷德最后的欣慰，他于几个月后与世长辞。

第七章　蒙马特的舞会

毕加索两次去巴黎考察，还没有最终决定在“洗衣船”定居时，就见识过蒙马特的舞会。后来，情况发生转变：游客蜂拥而至，舞会随之变成廉价的娱乐。1900年到1901年，只有土鲁兹－劳特累克非常喜欢的煎饼磨房和红磨房还风采依旧。

而巴黎上层人士钟情的蒙马特－爱丽舍，号称巴黎第一舞池的蒙马特－爱丽舍，产生过“现代四对舞”的蒙马特－爱丽舍，大名鼎鼎的蒙马特－爱丽舍，其经营每况愈下，最后关门大吉。

在整个蒙马特地区——从蒙马特高地底部到皮卡伊路，到克利尼大街和罗什舒阿尔大街——毕加索由马尼亚克、卡撒杰马斯和皮肖陪着，重又找回劳特累克当年的回忆。

当时，劳特累克已经结束了他哀婉动人的一生，在巴黎再也寻不着他的足迹。第二次去巴黎时，毕加索本来可以见到当时也在巴黎的劳特累克。但这位曾创作过《红磨房的拉·古吕厄》和《雅娜·阿维里尔画像》的大画家早已不再光顾红磨房。后来，劳特累克仿佛预感到他行将就木，就待在他位于弗罗肖大街的画室里给自己的作品分类，销毁他不满意的作品，为他在阿尔比的劳特累克美术馆做准备。要知道，他的作品曾遭卢浮宫和土鲁兹博物馆拒绝。

1901年7月15日，劳特累克离开巴黎去朗得省。他在奥尔塞火车站和朋友们道别时，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了。”一个月后，他就病倒了。他母亲把他带回马尔罗梅城堡时，劳特累克已经是半瘫了。三个星期后，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劳特累克安静地死去。

就这样，毕加索一直没机会和土鲁兹－劳特累克相识。但在他的绘画生涯里，有那么几个月，他的创作一直是劳特累克生前最喜欢的主题，这一时期称作“劳特累克时期”。毕加索在“劳特累克时期”的作品，实际上是对劳特累克本来观点的歪曲，仅仅是对主题的简单练习。后来，皮卡比阿和马塞尔·杜尚把劳特累克的绘画技巧运用到印象主义创作中。

劳特累克对毕加索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而且仅限于主题和绘画态度两个方面。毕加索的作品中很少有明快的冷色调，或是运动的线条，以及触目惊心又巧妙深奥的内涵。而这最后一点是劳特累克最突出的特点，体现了他在日本铜版画方面的造诣之深，毕加索还远远没有涉及这一领域。

毕加索更看中的是色彩和内容，而不是画面本身。他喜欢运用奶油状的厚重颜料，大胆地运用色彩——第二次去巴黎时创作的《矮子》最有代表性，他极力地烘托出色彩，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和劳特累克完全相反，毕加索从不强调作品中人物的堕落，而且从不把他们的缺陷暴露出来。“蓝色时期”的毕加索，对蒙马特高地一无所知，除了《塞勒斯坦娜画像》，他从不刻意表现下层人的穷苦生活，而是更倾向表现人的孤独、放纵、绝望，而不是人的罪恶、愚蠢还有冷酷。



矮子　毕加索（1901年）

“劳特累克时期”的毕加索力图展示模特的感官特点，他不吝运用一些夸张的手法，刻画模特、下等妓女、轻佻的女人，在他的画笔下，她们身穿花花绿绿的衣裙，头戴插满羽毛的帽子，佩戴着奇形怪状的饰物。

热特吕德·斯坦讲起，有一次，毕加索站在一幅土鲁兹－劳特累克的作品前惊呼：“不管怎样，我画得比他



好！”自我解嘲！不过，毕加索对土鲁兹－劳特累克满怀欣赏：“到了巴黎，我开始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后来，毕加索在克利尼大街创作的《浴缸》最有说服力。

把贴有“劳特累克时期”标签的作品：《用晚餐者》、《朗诵者》、《流言蜚语》、《在红磨房》等等，归类到毕加索两次去巴黎的作品中，或许更合适。在毕加索的艺术生涯中，除了土鲁兹－劳特累克的影响，还隐隐约约透露着斯坦伦、莫里斯·德尼和勃那尔的影子。尤其和勃那尔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令人费解。毕加索对勃那尔很是厌恶。有一次，在泰里亚德家里吃中饭。毕加索瞥见墙上挂着一幅勃那尔的画，他怒不可遏，对泰里亚德说：“快取下来，不然，我什么也吃不下。”

红磨房的舞蹈，女舞蹈演员的连贯动作和肢体语言，深深吸引着劳特累克。毕加索只对表演中最表面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色彩、光线。毕加索画笔下的妇女像一群木偶，只有漂亮的脸蛋，如《流言蜚语》和《犬蔷薇小姐》。在毕加索的笔下，人物只是简单解释主题。

或许，毕加索频频参加蒙马特舞会时，拉·古吕厄和她的舞伴瓦朗坦·勒·德佐塞已经结束了跳舞生涯。蒙马特歌舞升平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五年间，拉·古吕厄只是偶尔路经红磨房，而瓦朗坦·勒·德佐塞去那里看演出。整个军校区，没有人去怀疑瓦朗坦·勒·德佐塞过去的身份，只知道他叫勒诺丹，曾是酒商，在蒙马特有很多房产，还把房子租给军官住。

毕加索在煎饼磨房

刚到巴黎，让毕加索流连忘返的不是红磨房，而是煎饼磨房。原因很简单，煎饼磨房离他住的加布里埃尔路只有几步路远。那里的东西——半杯啤酒才15生丁——一点都不贵。煎饼磨房的气氛也很轻松自由：客人多是巴黎的老百姓，而不是寻欢作乐的有钱人。毕加索在蒙马特的第一幅作品——一幅彩色粉笔画，主题就是煎饼磨房的舞蹈演员。画面上，人物清晰，演员们化着浓妆，在昏暗的光线下跳舞。五年后，这幅画被归为野兽派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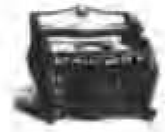
煎饼磨房的舞会　雷诺阿（1876年）

蒙马特舞会的盛况跟25年前雷诺阿画笔下的《煎饼磨房的舞会》没什么分别：工人、小手工业者、雇员，夹杂着几个艺术家。艺术家们去那里找自愿无偿服务的模特，或是……艳遇。

在煎饼磨房，付4个苏就可以疯跳整整一下午：四对舞、波尔卡舞、华尔兹，不亦乐乎，乐队奏出的音乐震耳欲聋。尤其是星期天，人们从下午3点跳到晚上11点，脚掌敲打着地面，尘土飞扬。

弗朗西斯·儒尔丹和瑟弗里尼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当时的舞会盛况。弗朗西斯·儒尔丹写道："舞蹈演员们全身心投入到舞蹈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煎饼磨房的气氛简直无与伦比。"瑟弗里尼补充道：

"如此的蒙马特，如此的生活。小酒馆里聚着许多年轻的姑娘，和她们的情人一起，碰巧她们的情人还是个艺术家。画家们也是那里的常客，他们总有拉维尼昂路酒吧的免费票。



'洗衣船'的艺术家们经常光顾的是埃米尔朋友酒吧。"

要指出的是，平时，尤其是周一，舞会的气氛和周末大相径庭。参加舞会的总是一些形迹可疑的家伙，舞会顿时成了流氓、荡妇、妓女的天下，有时情况则更糟。让·保罗说，他小时候参与过多次舞会散场后的打斗。最不可思议的是，舞会上竟有没戴帽子的女人。若在星期天，这绝对行不通。来跳舞的女士必须戴帽子，这是举止端正，有责任心的标志。男人们跳舞时也要戴着礼帽或草帽。雷诺阿1876年的作品《煎饼磨房的舞会》就是最好的写照。

在蒙马特，煎饼磨房不只是一处娱乐场所，它更是一处历史古迹。煎饼磨房的舞池对着勒皮克路，远远看去，像一个大棚子，灯光从屋顶打下来，绿色的花园栅栏围着。煎饼磨房是蒙马特高地仅存的磨房之一，后来改建成游乐园，门票价格：25生丁。1814年，巴黎被哥萨克骑兵占领时期，煎饼磨房还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当时，煎饼磨房的主人，磨房主德布雷和他的三个兄弟一起，向哥萨克骑兵发起进攻，英勇杀死三个敌兵。后来，不幸被敌人逮捕，德布雷惨遭杀害，四肢割下来，挂在磨房的风车上示众。

德布雷惨案并没有妨碍他儿子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把磨房改建成舞场。从此，煎饼磨房完成了磨谷粒的"历史使命"，开始了天天歌舞升平的日子，并且成了蒙马特高地最具魅力的场所，是蒙马特高地的象征。柯罗、雷诺阿、凡·高、沃隆经常画煎饼磨房的风景。对郁特里洛、勒普兰、基泽、马克莱、让·保罗来说，煎饼磨房是他们创作的主题。

后来，古老的磨房开始萧条，爱跳舞的人对煎饼磨房心存厌倦。二战后，其经营每况愈下，不得不关门大吉。再后来，煎饼磨房的舞池曾用做法国广播电视局的录音棚。值得庆幸的是，在煎饼磨房拆毁的附属建筑原址上又建了些低矮房子，风格和原来一致。但这都是徒劳的，"逝者如斯夫"！礼拜天，热情的蒙马特高地人聚在煎饼磨房，惬意地喝着薄荷汽水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蓝色舞者　毕加索（1900年）

现代四对舞

在此，还要提一下蒙马特－爱丽舍的舞会，它是蒙马特底部舞厅的典范。蒙马特－爱丽舍位于罗什舒阿尔大街72号，外墙镀金拉毛粉饰，室内装饰则是天鹅绒和猩红色长毛绒织物，灯罩色彩鲜艳。蒙马特－爱丽舍建于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时期达到鼎盛。当时，舞会的乐队有40人，乐队指挥为奥利维埃·梅特拉，《玫瑰华尔兹》的作者。巴黎公社后，蒙马特－爱丽舍被巴黎公社社员用做革命俱乐部。后来，客人越来越少，这也是主要原因。

曾一度，蒙马特－爱丽舍因现代四对舞即“离心舞”而声名大噪。拉·古吕厄和瓦朗坦·勒·德佐塞是现代四对舞的明星。跳现代四对舞时，女舞蹈演员们要把她们浸礼会教徒式衬裙掀到大腿，衬裙镶有长达60米的花边。结束动作是对着观众把两腿叉开，让人想入非非。在露出踝骨都有伤风化的时代，现代四对舞简直是大胆之至。

遥想当年，阿尔萨斯姑娘拉·古吕厄二八芳龄，精力充沛，体态丰满，朝气蓬勃。她不仅仅是舞蹈演员，她本人就是舞蹈。她翩翩起舞，舞姿优美煽情，观众看得目不转睛。她的舞伴瓦朗坦·勒·德佐塞，瘦瘦高高，关节弯



曲，对他来说，跳舞就是他的命根子。在拉·古吕厄看来，瓦朗坦·勒·德佐塞无可挑剔，他们是大家公认的“黄金搭档”。瓦朗坦·勒·德佐塞沉着冷静，不苟言笑，气质忧郁，把拉·古吕厄的青春活力衬托得淋漓尽致。瓦朗坦·勒·德佐塞是击脚跳大师。拉·古吕厄和瓦朗坦·勒·德佐塞被一群优秀的女舞蹈演员围着：“奶酪姑娘”，“四脚朝天姑娘”，“麦宁炸药”。

“麦宁炸药”，本名雅娜·阿维里尔，简直为舞蹈着了魔。雅娜·阿维里尔瘦弱，优雅，微笑挂在嘴边，特别是她跳独舞时。人们经常在背后对她议论纷纷，说她出身贵族，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她母亲是半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她父亲是意大利贵族。雅娜·阿维里尔，她父亲正忙于再一次攀越阿尔卑斯山脉。雅娜·阿维里尔的生长环境有些堕落，但她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气质。劳特累克对她很欣赏，为她画了很多画像。在劳特累克眼中，雅娜·阿维里尔是他的红颜知己，只有她真正欣赏他的才华。

红磨房出现

劳特累克发现了现代四对舞之美，这比煎饼磨房的女舞蹈演员更让他着魔。劳特累克还从现代四对舞中汲取创作灵感：节奏、色彩、光线的相辅相



舞蹈　毕加索（1900年）

成，相得益彰。

红磨房开张，劳特累克对煎饼磨房的喜爱也随之结束。很快，红磨房就从煎饼磨房挖走几根“台柱子”，观众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过来，而煎饼磨房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红磨房是理想的跳舞场所，不再尘土飞扬，设施完备。现代“磨房”代替了蒙马特高地破旧不堪的磨房，人们尽情娱乐，跳舞，跳舞，跳舞。

红磨房的创建者约瑟夫·奥雷也算得上个人物，很特别，蒙马特就有魔力把这种人吸引来。约瑟夫·奥雷，加泰罗尼亚人，父亲是位冒险家。一天，约瑟夫·奥雷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巴黎，他确实运气不错。他经营红磨房以后，又乘势开了巴黎互助会、儿家剧院、新杂技厅、滑车道，在他的成就记录上又添加了几笔。

他的合作伙伴——夏尔·齐德勒跟他恰恰相反。夏尔·齐德勒是个老头儿，花白的颊髯，饱满、红润的脸，活脱脱一喜剧书记员，原来做过屠夫，在令人作呕的水里洗牲畜的皮毛。后来，转行开小酒馆，对蒙马特的舞会了如指掌。

约瑟夫·奥雷和夏尔·齐德勒最天才的投资是在布朗什广场，位于克利尼大街90号，布朗什广场不是很繁华。约瑟夫·奥雷和夏尔·齐德勒从别人手里把已停业四年的白皇后歌舞厅盘下来，建造了一间假磨房，漆成红色：露天舞池在小花园中央。夏天，客人们一边畅饮香槟酒，一边观赏节目。

拉·古吕厄的辉煌和衰落

红磨房自开张起，就获得极大成功。齐德勒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是个绝妙的公共关系专家。1889年10月5日——“博览会和埃菲尔铁塔年”，在红磨房的开业典礼上，他在整个巴黎大散请柬，邀请的都是社会名流：真正的贵族，手段高明的交际花、画家、作家、喜剧界大腕，巴黎各界名流。所有人都愉快接受了邀请，都满怀好奇。当天晚上，瓦斯灯发出的绿色光下，大厅里人头攒动，名人云集，有：埃利·德·塔莱朗王子；奥雷里昂·肖尔，巴黎报业大王；上流社会画家热尔韦克斯和阿尔弗雷德·斯蒂文；色情小说家

让·洛兰，土鲁兹－劳特累克，上流社会人士兼大画家。齐德勒把土鲁兹－劳特累克的一幅画高高挂在大厅里：《红磨房的舞会》。

那天晚上，红磨房成了整个巴黎的焦点。拉·古吕厄、瓦朗坦·勒·德佐塞，现代四对舞的其他女舞蹈演员："檐沟栏"、"金光线"、"奶酪姑娘"，全被齐德勒从蒙马特－爱丽舍挖来，加入到红磨房，而且他们的表演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雅娜·阿维里尔也跳槽去了红磨房：她逐渐取代了拉·古吕厄在劳特累克心中的位置。而拉·古吕厄，昔日蒙马特－爱丽舍光芒四射的明星，活力和身材大不如前：经常大嚼大咽，胡吃海喝，像个无底洞，转眼心宽体胖，大腹便便。她生活在曾经的成功中，变得任性，目空一切。她的同伴对她厌恶到了极点，还公然嘲笑她。

劳特累克亲眼目睹了拉·古吕厄辉煌到衰败的过程，他无比痛心。要知道曾经的拉·古吕厄的劈叉动作有多完美！1892年，拉·古吕厄彻底结束了她的舞蹈生涯。一天晚上，她喝得酩酊大醉，一步没跳好，摔倒在地上。观众们站起来喝倒彩，大声骂她。奥雷借口她不再叫座，而且出场费太高，就把她辞退了。

几年间，拉·古吕厄激发了土鲁兹－劳特累克的创作激情，他当时的几幅作品，达到世界级水平。首先是为红磨房作的海报，画面上的拉·古吕厄高抬着腿，衬裙散开。《红磨房》画的是拉·古吕厄的背影，观众为她深深吸引。《红磨房的舞会》画的是拉·古吕厄和她的"黄金搭档"瓦朗坦·勒·德佐塞在表演他们的拿手绝活。

在红磨房，拉·古吕厄赚了不少钱。曾有一段日子，齐德勒给她的报酬每月高达3750法郎：金法郎！离开红磨房时，拉·古吕厄还是个富婆，只不过好日子没过几天。1895年，解除所有聘约后，她产生了个荒唐的想法：在蒙马特的集贸市场、在纳纳集市上、在巴黎御座庙会（即茴香蜜糖面包庙会）上，与一帮老妇女表演东方舞。当时，她早就跳不起来了，就扭扭腰摆摆臀，烘托烘托气氛。拉·古吕厄写信给劳特累克，让他帮她画两个装饰广告牌，挂在表演用的小木棚上当门面。劳特累克欣然接受，他一直梦想能够有机会搞搞装饰工程，不管怎样，一间集贸市场的小木棚也未尝不可！几个月后，劳特累克就按拉·古吕厄的要求，做好了广告牌。其中一块，有9平方米，画

面上的拉·古吕厄东方歌舞女打扮，披着透明的薄纱，观众们出神地望着她。其中一个，从侧面看，很像奥斯卡·维尔德。当时，劳特累克刚刚在伦敦见过这位作家，还被奥斯卡·维尔德水母般松软的面容、淡色的眼睛、还有纤维般的头发深深吸引住。画面上，费利克斯·费内翁坐在奥斯卡·维尔德身旁。费利克斯·费内翁留着一撮靡菲斯特山羊胡子；雅娜·阿维里尔背对着大家，和她的表兄塔皮埃·德·塞莱朗一起。

第二块广告牌的主角仍旧是拉·古吕厄，画面上，她和瓦朗坦·勒·德佐塞在红磨房翩翩起舞。劳特累克想唤起人们对她往昔光彩的回忆。

这两块广告牌出现在纳纳集市上。不过，观众看重的不仅是宣传，更是拉·古吕厄的舞蹈。他们这样评价劳特累克为拉·古吕厄量身定做的广告牌："大画家开的国际玩笑、离谱搞笑，拿大众艺术穷开心。"

拉·古吕厄越来越肥，总是醉醺醺的，粗俗不堪。如此瞎搞了5年，拉·古吕厄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把首饰、毛皮衣服、家具全卖光。最后，不得不把劳特累克做的广告牌也转手。起初卖给了维奥博士，后来又转到一个小商人手里。小商人把广告牌分成小块，以为这样会出售得顺利迅速。1929年，巴黎美术馆重新买回，现藏于手工制作博物馆。

拉·古吕厄的景况越来越糟。毕加索住在蒙马特时，她成了地地道道的女酒鬼，又肥又胖，大腿把裤子撑的紧绷绷的，远远看去，仿佛两条羊腿在蠕动。她"壮志未酬"，拿出仅有的钱，作最后一搏：和驯兽师朗贝尔合作搞驯兽表演。很不幸，驯兽表演又以失败收场，还酿成一场悲剧：在鲁昂，一只狮子把一个孩子的胳膊咬了下来。

绝望的拉·古吕厄做了街头小贩。她在咖啡馆和小酒馆门前卖花，卖糖果，卖橘子。让·保罗——蒙马特地区的活字典，后来成为一名画家——这样描述1918年的拉·古吕厄："她在新红磨房的门口，——劳特累克和毕加索钟爱的红磨房于1915年毁于一场大火——穿着拖鞋站在雨中，脖子上挂着一根绳，绳上拴着一只盒子，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糖果。"

埃德蒙·厄泽年轻时代就和拉·古吕厄相识，他详细描述了这位女舞蹈演员：

“拉·古吕厄平民出身，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只要见过她跳舞，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她完全为舞蹈而生，像一只拴在绳套上没有思维的动物，恕我冒昧。她完全投身到声音、拍子、节奏中，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气氛随她的舞姿不断改变，她跳啊跳啊，最后达到忘我的境界，这可是我们常人远远不能涉及的时空。

拉·古吕厄曾在一家洗衣店做洗烫女工，洗衣店位于金水滴路，离夏尔特路不远。就像左拉在《娜娜》中描述的，拉·古吕厄经常去公共洗衣处洗衣服。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模样俊俏。晚上，她就去卡普拉路、萨博路拉·夏佩尔大道，参加那里的风笛舞会。偶尔，和公共洗衣处的小伙子喝上杯红酒。

很快，拉·古吕厄就被街区的地头蛇们盯上了。他们是一群活一天算一天的皮条客，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水果蔬菜小生意，经常是手里拿着刀子，强逼拉·古吕厄和他们跳舞。

拉·古吕厄天性爱跳舞，她感觉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慢慢地，她开始光顾蒙马特一爱丽舍，在那里和一个名叫勒诺丹的怪人相识。在巴黎舞蹈界，勒诺丹的名气比瓦朗坦·勒·德佐塞稍稍逊色。他是法国司法部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和拉·古吕厄一样，酷爱跳舞。勒诺丹跳遍巴黎所有的舞场，开创了现代四对舞。他和拉·古吕厄配合得天衣无缝，场场叫座。勒诺丹受过良好教育，做事很有分寸，无任何不良嗜好，只喜欢马术和跳舞。

拉·古吕厄中等身材，略微矮胖，金色短发，像个小孩，和她的气质很匹配。瓦朗坦·勒·德佐塞高高大大，戴着高筒礼帽，特别瘦，看起来有两米高，脸部中间突出，像一只前行的船头，鹰钩鼻，有点像舞蹈演员唐·基肖特。”

皮埃尔·拉扎尔夫，当时还是个年轻的小记者，还没有梦想建立传媒帝国。他曾为晚年的拉·古吕厄写过一篇报道。昔日的“舞蹈明星”，成了在集市上做小买卖的粗俗女人。

“有好事者想一鸣惊人，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拿拉·古吕厄开涮。

远远走来一胖女人，穿着尚显华丽的旧衣服，肉嘟嘟的，嘴边露出一丝微笑，有些恐怖。连头都没回，就坐在酒馆平台角落的一只白木箱子上，喝下满

满一瓶酒。然后，舌头满意地咂吧两下，用手背擦了擦嘴，哈哈大笑两声，吐了口痰。有人逗她说话：'嗨，老太婆，过去还是很美妙的吧？你忘了吗？'她傻笑一下，回答说：'你说，怎会不记得呢？跳得嗨呦嗨呦的，很滑稽。'

这就是60岁的拉·古吕厄。"

后来，拉·古吕厄的处境越来越糟：在妓院里当女佣，在街区里捡破烂。1929年1月底在拉里布瓦西埃尔死去。临终前，她对神父忏悔："亲爱的神父，您说上帝会原谅我吗？我是拉·古吕厄。"

翩翩起舞中

毕加索去红磨房完全出于好奇，朋友们总跟他谈起，对那里赞不绝口。毕加索有心去看看红磨房到底是个什么样。而且，毕加索听说劳特累克对红磨房情有独钟，他很感兴趣，还可以顺便欣赏一下现代四对舞，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不过，当时，现代四对舞已成一副空壳。红磨房也大不如前，不再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场所。奥雷和齐德勒的合作终止，奥雷一人经营红磨房。只要赚钱，奥雷才不管客人是谁呢。如同原来的蒙马特－爱丽舍，红磨房也是人满为患，三教九流，拉皮条的、妓女、外国佬……

居斯塔夫·科基奥把毕加索带到红磨房。尽管红磨房不尽如人意，还是赋予毕加索创作激情。他给怪癖的女歌手让娜·布洛克画了几幅画像。画面上，让娜·布洛克一手抓着法国军帽，一手抓着根领带。她总唱黄色歌曲，根本不像个歌手，倒像个妓女。让娜·布洛克很灵巧也很特别，毕加索对她极为赏识。除了肖像画他还为她画了几幅彩色粉笔画。

1904年起，毕加索就不再光顾红磨房。当时，他正在潜心创作"蓝色时期"作品，根本无暇顾及红磨房的舞会。毕加索刚刚找到他的创作方向，不想有一丝一毫的懈怠。由此，有人认为，毕加索的"劳特累克时期"，是他整个创作生涯的一个小小插曲：初到艺术之都的毕加索，陶醉其中，不知如何表达他的创作欲。



对刚刚成年的毕加索来说，在巴黎，最吸引他的还是能让他忆起巴塞罗那，忆起帕拉勒罗和巴里奥·希诺的热闹地方。闹哄哄的集市舞会也让他流连忘返：光线、音乐、叫嚷声、灰尘，刺鼻的气味都那么亲切。

克利尼大街的节日，蒙马特的集市，吸引着街区所有的年轻人。从昂韦广场一直到巴蒂尼奥勒大街，空地上挤满了小木屋、射击场、动物小屋、滑梯、跷跷板、驯马场、糖果摊、蜂糕和拉丝香糖小贩、打木偶游戏摊、摔跤运动员、走江湖的魔术师……现在的集市内容空洞，和当时的盛况简直没法相提并论。

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们像一群大胡蜂一样频频参加集市庙会的活动。凡·唐吉也多次从蒙马特的节日活动中获取灵感，创作出不少作品。曾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位叫阿妮塔的茨冈女人生活在一起，阿妮塔风情万种，凡·唐吉为她画了一幅裸体图，是他重要的画作之一。

马戏场的魔力

马戏是蒙马特地区主要的娱乐之一，和庙会相比，马戏场更能吸引毕加索的注意力。一连几年，毕加索几乎每个星期都去梅德拉诺杂技场。毕加索整个"粉红色时期"的作品：杂技演员、穿杂色衣的小丑、马戏团演员都是以马戏场作为背景。菲南蒂·奥丽维干脆就把这一时期称作是"江湖时期"。



马背上的小丑　毕加索（1905年）

梅德拉诺杂技场就是原来的费尔南多马戏场，因雷诺阿的《穿白衣的小丑》、德加的《拉拉小姐》，还有修拉、劳特累克而闻名遐迩。最值得一提的是劳特累克，他在纳里路的圣－雅姆疗养院治疗时，搜索自己的回忆，创作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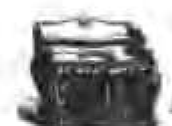
小丑之死　毕加索（1906年）

系列“马戏场”作品，向家人和医生证明他身体和精神上都很正常，这简直就是“回光返照”。

毕加索不仅喜欢看马戏，他更喜欢杂技场的氛围。坐在那里，他深深感受到隐藏在浮华背后的伤感和凄凉。在他的画笔下，无论是穿杂色衣的小丑，还是街头艺人都很颓废，或体弱多病。这和毕加索当时的精神状态很一致。在杂技场后台，或杂技场酒吧里，毕加索总跟杂技演员和小丑聊天，他和杂技演员马尼兹和马内洛、表演平衡节目的杂技演员阿多尼斯和利奥娜·戈兰科、手技演员布里亚托尔、驯兽员夏斯·巴隆，还有初出茅庐的格罗克都很熟。演员愚笨粗俗的表演让毕加索赞不绝口。菲南蒂·奥丽维还讲起，住在“洗衣船”的艺术家们都是杂技场和杂技场酒吧的常客。酒吧里面弥漫着一股马尿、狮子皮毛、汗臭、吐擦剂、乙醚混杂的味道。其他人去看演出，毕加索和布拉克就待在酒吧里和马戏场的小丑们侃大山。特别是毕加索，对他们之间开的玩笑津津乐道。尽管大部分演员是英国人或德国人，语言不通，但他们好像靠“沃拉卜克语”来沟通。有一次，毕加索邀请一个他很喜欢的小丑夫妇到“洗衣船”吃中饭，搞得菲南蒂·奥丽维很恼火。

不过，菲南蒂·奥丽维对格罗克的印象很好。在回忆录中，菲南蒂·奥丽维写道：“格罗克在杂技界崭露头角，他为人热情。我们越来越喜欢去梅德拉诺杂技场，一个星期三到四次。”

看完演出，毕加索就和朋友们一起，带上格罗克，去距梅德拉诺杂技场很近的两个半球酒店的酒吧里继续玩。马戏团的演员都住在那里。酒吧的节目单贴得满墙都是，各种语言都有。毕加索觉得他就是那里的一分子，人们



错把他当成西班牙表演平衡节目的杂技演员时，他开心得要命。毕加索去克利尼大街的动物医院给他的小狗看病时，医院的兽医就跟他要梅德拉诺杂技场的招待票来抵医药费。

毕加索对音乐或戏剧毫无兴趣。跟贝多芬比，他更喜欢茨冈人边弹吉他边敲响板边唱的歌曲，或弗雷德唱的《樱桃年代》。毕加索去剧院完全是为了讨好马克斯·雅科布，他是个大戏剧迷，酷爱看《科内维尔的钟声》、《让内特的婚礼》、《小公爵》和《福神》。马克斯·雅科布还喜欢在顶层楼座观赏戏剧——每次半法郎——他在那里打听到很多荒谬离奇的故事。毕加索则一边看戏，一边用铅笔在纸上画。剧院的引座员总留给他们最好的位子，而且细心地给毕加索准备好靠垫、小望远镜，还有水杯，让他冲洗画笔。毕加索的技法很奇怪，先在水里把画笔泡软，然后在纸上把粉笔碾碎。德加也用这种技法。

多年以后，毕加索和热内维埃夫·拉波特提起他和马克斯·雅科布一起去巴蒂尼奥勒路看戏的情景：马克斯·雅科布看《艺术家生活》时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他可真投入！毕加索还讲，有一次，他们在幕间休息时吃了蒜味香肠，剧院的工作人员还不让他们入场。



杂技艺人们　毕加索（1905年）

毕加索创作《阿维农少女》和初涉立体派艺术时，他又爱好上了电影。这一回，菲南蒂·奥丽维太高兴了。每周五换电影时，"洗衣船"所有的艺术家，由阿波里奈尔陪着，去杜埃路的电影院看纪录片、梅里爱的梦幻剧、德拉

南的戏剧电影、或纳皮尔蔻斯加的《神秘的女人》。后来，毕加索离开蒙马特，但仍保持着看电影的习惯，他时常光顾盖特路的千柱影院，一周上映一部新电影。每场都有杂耍歌舞：歌手、魔术师、杂技演员。

在蒙马特，在“洗衣船”，有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加斯东·莫多，因在一出戏里当了特技演员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放弃绘画。后来，“洗衣船”的其他艺术家就到杜埃路的剧院给加斯东·莫多捧场。

第一批电影女演员——纳皮尔蔻斯加、米塞多拉、佩尔·怀特等等——让菲南蒂·奥丽维羡慕不已，她自己也产生了当女演员的念头。菲南蒂用毕加索画画赚来的钱买了奇装异服，还买了几顶如植物园大鸟笼般的帽子。全副武装一番，很是得意忘形，但菲南蒂还是未能实现她的梦想。太天真了，她的生活环境和电影简直是大相径庭。30年后，菲南蒂·奥丽维才意识到她当时的疯狂举动，可惜太迟了！



第八章　穷人的食物

在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让艺术家们久久难以忘怀的不仅是煎饼磨房和红磨房，还有黑猫小酒馆和骑兵军帽咖啡馆。

那时的蒙马特，无论是在克利尼大街，还是在“洗衣船”，耳濡目染的仍是黑猫小酒馆或骑兵军帽咖啡馆的精神。人们无比怀念罗多尔夫和阿里斯蒂德·布律昂两个大冒险家的别出心裁和口若悬河……“逝者如斯夫”，只留下昔日重来的奢望：萨利斯死了，布律昂和客人吵了架，回老家去了。

这两个人的故事，尽管与毕加索的绘画风马牛不相及，仍然不能不提，是他们创造了蒙马特活跃的生活氛围。

黑猫小酒馆的睿智

在经营黑猫小酒馆之前，罗多尔夫·萨利斯什么职业都尝试过：漫画家、雕刻工、考古学家、画家……一事无成。在蒙马特－爱丽舍附近，他拥有一间很大的房子。他决定做最后的尝试，开一家艺术小酒馆。当时，他已过而立之年。

罗多尔夫·萨利斯的小酒馆带有浓厚的“古典法国”风情：破旧的门窗，路易八世风格的扶手椅、精致的锡壶、盔甲，教堂的玻璃窗，中世纪的器皿。墙壁装饰成猫形檐壁，暗示出店名——黑猫小酒馆。墙上挂着一幅维莱特的画，《帕尔斯·多米那》，花了200法郎，描画的是蒙马特高地惊险而浪漫的故事。

萨利斯给侍应生们定做了瑞士风格的猩红色制服。从旧衣商那里，给四

个酒保买来法兰西学院院士礼服。萨利斯油嘴滑舌，他有一句口头禅——“什么是蒙马特？什么都不是。它应该是什么？一切。”士兵的长相，商人的头脑，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对客人百般阿谀奉承，称他们“王子”、“老爷”、“绅士”，恶心之至。

黑猫小酒馆迷人的夜晚弥补了这一点。萨利斯是个机灵鬼，不知他用了什么伎俩，伊德罗帕特俱乐部从拉丁区搬到了黑猫小酒馆。幽默作家埃米尔·古多和俱乐部的成员们就在那里高谈阔论，很快，黑猫小酒馆成了功绩赫赫的文学论坛，众多的作品随之诞生：《百合钟声》，《植物咖啡馆》，《双瓷人》。整个世纪的睿智来往于黑猫小酒馆：阿尔方斯·阿莱、夏尔·格罗——一位风格奇特的先达达派诗人，还是彩色摄影机和留声机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卡皮、阿尔贝·萨曼、魏尔伦、让·里什潘、让·莫雷亚斯、让·洛林、莫里斯·多内……总之，“美好年代”的所有思想，好的，坏的，最好的，最坏的，都在黑猫小酒馆集中体现。

在这些幽默作家和诗人中，特别要谈谈平民文学的创始人——让·里科蒂斯，即加瓦里埃尔－朗东·德·圣阿芒，瘦骨嶙峋，笨手笨脚，长发飘飘，苍白羸弱，十足的瘾君子和嬉皮士。他是黑猫小酒馆的“明星”，给大家带去很多欢笑。

毕加索在德韦咖啡馆见到让·里科蒂斯时，他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让·里科蒂斯是德韦咖啡馆的老主顾。他靠给客人朗读曾带给他瞬间辉煌的诗歌来维持生计。

一战后，让·里科蒂斯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他于1933年去世，下场跟他的诗歌一样悲惨。死前，他住在卡米耶－塔昂路，就在蒙马特公墓旁边。他的灵柩，再现了他在诗歌里描绘的穷人的葬礼，转了几个圈，他就到达了他长眠的地方。

黑猫小酒馆的经营，由于蒙马特－爱丽舍里的流氓捣乱，也日渐萧条。1885年的一个晚上，萨利斯搬到赖伐尔路（即维克多－马塞路）的一家旅馆。画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文斯也住在那里。

萨利斯的离开，当时，在巴黎很轰动：送行仪式很隆重。萨利斯身着行政长官服：镶着金边的燕尾服、两角帽、佩剑；他走在侍应生前面，侍应生



们身穿法兰西学院院士礼服手举火把；乐师们敲鼓吹号；黑猫小酒馆的诗人们跟在后面。一路敲敲打打，甚是热闹。

或许是滑稽过了头，亦或是人们没了新鲜劲，反正从那时起，黑猫小酒馆就不再有作家诗人们的身影。进而，想跟诗人作家们打交道的富人对那里也失去了兴趣。

10年后，萨利斯破产，逼不得已，把黑猫小酒馆卖给了别人，只身去了外省和阿尔及利亚。萨利斯的景况越来越凄惨，于1897年3月去世。之前，他还妄想把大势已去的黑猫小酒馆赎回。

阿里斯蒂德·布律昂和骑兵军帽咖啡馆

在萨利斯离开后不久，"接班人"就来了。阿里斯蒂德·布律昂逐步取代了萨利斯。阿里斯蒂德·布律昂更是个机灵鬼，"喜欢惹是生非"（于勒·勒梅特尔语）。阿里斯蒂德·布律昂感觉黑猫小酒馆的那一套早已过时，于是把萨利斯的老规矩全都废弃，进行了全新的改革和装修：在天花板上悬挂了一顶巨大的骑兵军帽。骑兵军帽咖啡馆大张旗鼓地开业了。"老爷"，还有"尊贵的夫人"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讥笑讽刺。起初，客人们听到布律昂叫他们"笨蛋"、"杈杆儿"、"蠢货"都很生气。奇怪的是，他们很快就默认而且喜欢上布律昂的欢迎方式，有些下流，但不无好玩之处。布律昂嚷道："注意！款爷们来了，他们可是兜里有货的。还有些款姐，后面跟着拉皮条的。"大家兴奋得一塌糊涂，也随声附和，招呼新来的客人。

而准备离开的客人，也逃脱不了被讽刺的命运。

布律昂一门心思赚钱，骑兵军帽咖啡馆的啤酒劣质香槟变味，酒杯还越来越小。客人一旦发发牢骚，就招来布律昂一阵劈头盖脸的辱骂。

从骑兵军帽咖啡馆一开张，土鲁兹-劳特累克就是那里最忠实的客人。他对布律昂的做法很欣赏。布律昂骂那些有钱人时，劳特累克就在旁边咯咯地笑。劳特累克给布律昂画了一幅画像：身穿天鹅绒西装，头戴毡帽，脖子围着红色围巾，手里握着根大棒槌。这是"栅栏艺术"最轰动的作品。

除了嬉笑怒骂，“民间说唱艺人”阿里斯蒂德·布律昂还唱些滑稽小曲，酸涩且下流，不过，客人们还能够接受：《致圣－拉撒路》，《致梅尼尔蒙唐》，《白色玫瑰》……

阿里斯蒂德·布律昂的性格很矛盾，他既真诚又爱弄虚作假。如果说他的诗歌表达了他真挚的情感，同时，他童年的狡猾又无处不在。他一门心思只想做一件事：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卢瓦雷省。为了实现梦想，他要努力赚钱。他也做到了。

骑兵军帽咖啡馆里客人最多的时候，阿里斯蒂德·布律昂从店里回到他的小屋准备睡觉时，经常是时钟已指向凌晨2点。他住在蒙马特高地索利路和圣－樊尚路的交叉口。一想起他小花园里的树木花草，他就激动不已：

“夏天的清晨，我打开窗子，树叶轻轻拂在脸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我比去乡下度假的富人们还幸福。”

1900年，阿里斯蒂德·布律昂终于美梦成真。他把骑兵军帽咖啡馆委托给别人管理，然后回到库特内，他在那里买了座城堡。他还以资产阶级的方式迎娶了喜剧歌剧院的女歌唱家，马蒂尔德·塔尔基尼·德奥。阿里斯蒂德·布律昂终于过上了资产阶级生活，这在他内心深处曾设想了千百遍。

之后，阿里斯蒂德·布律昂就很少去巴黎。1922年，保罗·普瓦莱把露天戏剧《奥阿西斯》的舞台搬到旅馆的院子里，还把阿里斯蒂德·布律昂请来，场面甚是热烈，客人们都想一睹多年未曾露面的阿里斯蒂德·布律昂。保罗·普瓦莱在他的回忆录《拼排时代》中写道：

“他（阿里斯蒂德·布律昂）说，大家并没有随他的离去而淡忘他的诗篇。他的话引起在座很多人的思考。他们曾以为，阿里斯蒂德·布律昂只是巴黎文学界一名匆匆的过客。直到后来才发现，他的作品魅力持久不衰，值得重视。”

1924年，布律昂重又登上欧洲人舞台。《致圣－拉撒路》带给他人生最后的辉煌。



几个月后，阿里斯蒂德·布律昂因心绞痛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4岁。

在很多字典里，有关阿里斯蒂德·布律昂的资料数不胜数，罗多尔夫·萨利斯的名字却没有任何记录。

在此，用如此多的笔墨来讲述黑猫小酒馆和骑兵军帽咖啡馆，其实没有其他目的。这毕竟是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下层人悲惨命运的写照。1900年到1910年间，萨利斯和布律昂的经营为蒙马特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两家店是艺术家们展现才华的舞台。

毕加索却全然不知。他喜欢去泰尔特广场那些热闹的酒吧或咖啡馆，比如“蹦蹦兔”咖啡馆，让他想起帕拉勒罗。那时，毕加索经常彻夜创作，他几乎没有闲暇去咖啡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他只喜欢在小饭馆里和朋友们聊聊天。

穷人美食

蒙马特高地的小饭馆可谓数量众多，客人们大多是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不喜欢在家里做饭。另外，他们简陋的工作间大多没有专门的厨房。而且，经过一整天的创作，无论是画画还是写作，到了晚上，他们更愿意和朋友们聚在热闹的小饭馆里聊聊天，放松放松。

一战前，还没有“工业快餐”——牛排、薯条、苹果馅饼、速溶咖啡。小饭馆的食物简直是价廉物美。花上0.9个法郎就能尝到白葡萄酒烩兔肉、炖肉、洋葱回锅牛肉片、扁豆炖羊肉、小块腌猪肉烧小扁豆、调味汁煨排骨。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小饭馆以这些传统菜为豪。价格方面，便宜得让人大跌眼镜：

鳕鱼：0.3法郎

小菜豆烧羊腿：0.5法郎

奶酪：0.1法郎

咖啡：0.1法郎

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小饭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比较简朴的有：卡特琳大妈饭馆，到了夏天，饭馆的小花园总是人满为患；可可妮艾大妈饭馆；文学艺术饭馆；蒙马特高地饭馆。这几家不仅供应低于1法郎的饭菜，还允许客人点半份——这种办法在意大利仍然适用，而且还向赶时间的客人提供外卖。饭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和寄膳者，他们有专门的位子和餐具。雅克·维庸在可可妮艾大妈饭馆就是如此。他父亲担心他大手大脚，直接把钱交给饭馆老板。至少，儿子不会饿着肚子进城。

比上述几家高级的饭馆，饭菜的价格则从1.5法郎到2.5法郎不等，最多4个法郎。当时，能吃上顿加了金融家调味汁的鱼肉香菇馅酥饼、南蒂阿调味汁鱼丸、橙汁鸭或葡萄酒鸭绝对是件奢侈无比的事！如果再碰巧餐后，酒馆老板送一小杯苹果烧酒或是上等烧酒……啊，美好的时光！

文学艺术饭馆的老板韦尔南，和蒙马特高地饭馆的老板阿庸都和毕加索息息相关。"粉红色时期"和立体派时期，毕加索是这两家饭馆的常客。

先说说韦尔南。他的小饭馆位于卡瓦洛蒂路8号，离"洗衣船"有段距离。不过，当铺就在旁边，而穷艺术家们每天午饭前都要去当铺把手表当掉，所以文学艺术饭馆相当地利人和。它离艺术家别墅和木炭画家别墅很近，因此，韦尔南的小饭馆聚集着了不同流派的艺术家。文学艺术饭馆的条件艰苦：饭厅低矮狭小，屋内弥漫着粮食和酒精的味道，空气污浊，烟雾缭绕。大理石面的饭桌排得密密的。毕加索、马克斯·雅科布、阿波里奈尔、萨尔蒙、迪兰、马塞尔·奥兰几乎天天在那里打发一日三餐。小店的客人也是三教九流：蹩脚的演员、在克利尼广场工作的建筑工人、马车夫……

人们都抱怨菜式太单调，韦尔南在菜单上从来不花任何心思。马克斯·雅科布曾在文学艺术饭馆寄膳，他烦透了天天吃一种菜，于是，想出一套新办法。韦尔南对传菜的人大叫："马克斯先生要一小份兔肉，还有一杯烧酒，快点……"

韦尔南的善解人意丝毫没有改变马克斯·雅科布的"忘恩负义"，还写了一首酸溜溜的诗讽刺他：

“烦透了韦尔南的小饭馆

但还得去

因为那里有烧酒

还有奶酪”

阿庸的蒙马特高地饭馆是野兽派画家的天堂。饭馆位于三兄弟路路口，紧挨着“洗衣船”。和韦尔南差不多，阿庸也是奥弗涅人，也喜欢一个子儿都没有的客人。他对艺术家的成名充满信心，到那时候，他也趁机沾沾光。“毕加索集团”经常在小饭馆里展开激烈的讨论，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阿庸跟他们解释说：“这是立体派艺术，他们要探讨问题。”阿庸没等到立体派艺术家出名就破产了。蒙马特高地饭馆总有些白吃不付钱的客人，胡安·格里斯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有些艺术文人更是过分，觉得白吃白喝理所当然，莫迪里亚尼首当其冲。瑟弗里尼一想起一次跟莫迪里亚尼吃晚饭的情形就恼火。

瑟弗里尼和吉诺·巴尔多一起，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在蒙马特，有几家意大利餐馆，最有名的一家开在卡尔瓦尔广场。他们看到莫迪里亚尼从斜坡上走下来：

“实际上，应该是莫迪里亚尼先看见我们。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端详我们的桌子。他的目光暗示我，他还没有吃晚饭。

出于礼貌，我请他跟我们一起吃。跟我们一起的还有一对夫妇。

餐馆老板是我的老乡，他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四个。我知道，他可不是个慷慨的主儿，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也不好说话。他允许我赊账，但只限于我本人。而且付账时，他还会摆出个样子让我难堪。

我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莫迪里亚尼点了一份兔肉，我要了一瓶红酒。而莫迪里亚尼一点也不体谅我，上餐后甜品前，他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团……我只好点了一份意大利餐馆特有的咖啡，味道确实不错，可是价格……

结果大大超乎我所料。一片嘲讽声中，我对老板说，把所有的账都记在我上面。要知道，我已赊了不少账。

我那老乡恼羞成怒：

'赶紧滚，流氓！我看我叫警察，谁敢拦着！一群外来户，把他们赶出去。'

还好，末了，老板打开门：'快滚，别再让我见到你们！'

哎，不管怎样，还吃了顿好的。"

在蒙马特高地饭馆，立体派艺术家们习惯围坐在毕加索身旁：德兰、布拉克、胡安·格里斯、阿波里奈尔、潘塞、弗拉曼克，探讨立体派艺术理论。闲谈中，厄泽还做了个小小的表演：

"知道是谁开创了立体派吗？我的哥们安德烈·于泰尔，潘塞的一幅漫画给了他灵感。

一天，潘塞突然冒出个念头，要给苏珊·瓦拉东画一幅几何形画像：两个黑色三角形表示她束起来的头发，菱形表示她的嘴巴，等等。于泰尔拿着画像，端详着，像条猎狗发现了猎物：'你画的真不错，但有些像书法。最好加上点阴影。'

他把手伸到咖啡里，在潘塞的画上点了几下。潘塞不解，问道：'那你的光线从那里来？'

'从这里。'于泰尔一边回答着，一边在两点咖啡渍间连了条虚线。

立体派诞生了！"

无稽之谈！但不容否认的是，新生的立体派艺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1908年到1909年间，在蒙马特高地饭馆和其他小酒馆，都在饶有兴致地谈论着。

1907年起，许多美国和俄国绘画爱好者相继来到"洗衣船"，他们买走了很多作品，"洗衣船"的艺术家们时来运转。一有钱，毕加索－菲南蒂夫妇就开始光顾高档饭馆。饭菜不见得有多美味，而且比韦尔南和阿庸的饭馆贵得多，但菜式繁多。特别是阿代勒小木屋，一到星期六，就供应2.5法郎的套餐，还有盛大的活动，酒水免费；美好的弗朗凯特餐馆是凡·高的最爱，马克·奥兰和让·里科蒂斯则是德瓦饭馆的常客。阿波里奈尔是个大馋鬼，经常呼朋唤友去饭馆大快朵颐。阿波里奈尔很大方，每次都是他买单。菲南蒂



喜欢去精致高雅的饭馆，炫耀她各式各样的帽子。毕加索从不挑剔，面对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他也只要一小截西班牙辣味香肠和一个番茄。他去饭馆主要是为了和老朋友谈论绘画。

阿波里奈尔是个大肚汉，吃起东西，像个无底洞。夏加尔记得，有一次和阿波里奈尔一起在蒙巴那斯的巴蒂吃午饭。想到这件事，夏加尔还心有余悸。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就看到他一杯杯酒不停地喝，一块块肉不停地吃。"而弗拉曼克对夏加尔的感受做出如下解释：在吃上面，这位俄国画家和毕加索差不多，不同的是，鲱鱼和黑面包代替了西班牙辣味小香肠和番茄。

小酒馆里的毕加索

在蒙马特高地，相对于那里的人口，小酒馆的数量真可谓是多。罗兰·多热莱斯把艺术家和诗人们光顾的小酒馆列了个清单，不算泰尔特广场的都足足有十几家：彻头彻尾的酒鬼，奥弗涅领事，贝塔妮小屋，电报，古老的木屋，轻步兵的军号，埃米尔朋友，野兽派酒吧，布斯卡拉，美丽的加布里埃尔……多得数也数不清。有的小酒馆只招待工人，还有的只在周末营业，招待去蒙马特过周末的"巴黎人"。

小酒馆的"遍地开花"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艺术家居住条件的简陋：在小酒馆里都比在家里舒服！尤其是冬天，小酒馆里暖融融的，在里面抽抽烟斗，和朋友们聊聊天，其乐无穷，还不贵，1到3个苏。在蒙马特，小酒馆不是下等人打发时间的地方，而是艺术家和文人的俱乐部。

埃米尔朋友酒吧位于拉维尼昂路下部，是"毕加索集团"最喜欢光顾的一家酒馆。杜飞和莫迪里亚尼也时不时去那里坐坐。毕加索从不喝烧酒，只喝一点点葡萄酒，矿泉水喝的最多。

格里斯和马尔库西分别为埃米尔朋友酒吧画了立体主义油画，作品完成得很仓促，但画面很形象生动。马尔库西的画让郁特里洛困惑不解，在那幅画前面站了几个小时，计算总共有多少立方体和菱形。最后，郁特里洛一句话没说，走开了。

后来，小酒馆换了老板，这两幅画也随之丢失不见。后来，保罗·纪尧

姆不经意在桑利斯妓院里找到了马尔库西的画，高高地挂在大厅里，妓女和嫖客们经常拿它开开玩笑。之后，又转手卖给了阿尔贝·萨罗。这幅画现藏于现代美术博物馆。

野兽派酒吧位于阿贝斯路的拐角上，大厅里还摆着一架机械管风琴，轰鸣声让客人对它敬而远之。野兽派酒吧的柜台前，总是人来人往。阿贝斯路是去“洗衣船”的必经之地，人们顺便在那里一停，喝杯东西。

布拉克和德兰则喜欢去阿贝斯路的乡村节日咖啡馆，跟一般的咖啡馆无异。总有人玩马尼拉牌，他们则在那里安静地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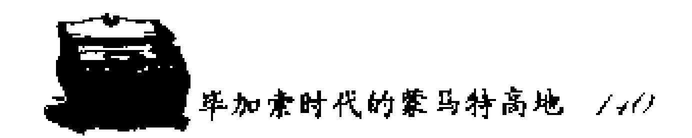
在泰尔特广场，也有很多家酒馆和咖啡店——最有名的一家叫卡特琳大妈饭馆，始建于1792年，算是蒙马特地区最早的小酒馆。其中斯皮勒芒和布斯卡拉的饭馆是蒙马特高地传奇故事的活的见证，特别是布斯卡拉饭馆（即现在的泰尔特艺术餐厅）。天气晴朗时，布斯卡拉饭馆的露天座简直人满为患。皮雅尔男爵把布斯卡拉饭馆的一楼改建成一间小小的海洋博物馆，摆满了船舶模型、鱼网、锚、捕鱼工具。一到周四，孩子们就过来玩耍。后来，布斯卡拉饭馆的老板给他新开旅店起名就叫“海洋宾馆”。毕加索不喜欢布斯卡拉饭馆，那里的客人多数是学院派画家。

后来，毕加索开始去蒙巴那斯的百合钟声酒吧。每到周二，艺术家和作家，吃过晚饭，三五成群，聚在“诗歌王子”保罗·福尔身旁，浓厚的文学氛围深深感染着毕加索。从那时起，毕加索涉足文学界。后来他的作家和诗人朋友极力鼓励他离开蒙马特，到蒙巴那斯定居。

小酒馆的老板们，虽然不像弗雷德那样风趣横生，但也各有千秋。斯皮勒芒年近古稀，原来是军号手，就是为了怀念那“清新而快乐”的战争，他给他的咖啡馆取名为轻步兵的军号。他的饭馆曾是第一个自由公社中心。直到现在，那里还是蒙马特的瞻仰地之一。

郁特里洛忧伤的爱情

玛丽·维齐尔和盖老爹，他们同郁特里洛的瓜葛就大了。马克斯·雅科



布和阿波里奈尔是玛丽·维齐尔的美丽的加布里埃尔饭馆的常客。后来人们猜测，可能就是他们把毕加索带到那里。

玛丽·维齐尔，壮壮实实，一头棕色的头发，屁股大大，乳房高高。当时，苏珊·瓦拉东被于泰尔迷得神魂颠倒，而对郁特里洛不管不问，玛丽·维齐尔成了郁特里洛的守护神，同时也是他的魔鬼。

玛丽·维齐尔深谙如何把嗜酒如命的人拉到她的店里来。蒂雷·博涅、于勒·德帕基、还有金属雕刻家比庸一直都是美丽的加布里埃尔饭馆的老主顾。她把他们玩于股掌之间，呼来喝去。他们喝得忘乎所以时，她就一巴掌拍过去。酒鬼郁特里洛当然也难以逃脱此类命运。被赶出酒馆以后，郁特里洛就坐在人行道上，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等玛丽·维齐尔出来。有时在大雨里一站就是到天明，等到她愿意让他走进她的房间。

郁特里洛不顾一切地爱上了玛丽·维齐尔。从科尔托路搬出来后，他就在酒馆的楼上租了个小房间住了下来——在圣－樊尚路和蒙塞尼斯路的交叉口。郁特里洛成为玛丽·维齐尔的情人了吗？郁特里洛画过一幅画：《美丽的加布里埃尔饭馆》，并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过，就算郁特里洛曾是玛丽·维齐尔的情人，时间也不长：郁特里洛，一个不满28岁的不折不扣的酒鬼，根本不合玛丽·维齐尔的胃口。但玛丽·维齐尔为了让他上钩，还是不惜动用引诱勾引手段。她对他呼唤："来嘛，来吻我。"每次，郁特里洛都得送给玛丽·维齐尔一幅画，她威胁他："没有作品，就没有爱情。"很快，玛丽·维齐尔就有了很多幅郁特里洛"白色时期"的作品，挂在酒馆的墙上。

但是，玛丽·维齐尔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这些画作的真正价值。郁特里洛有时就在刚刚布置一新的洗手间墙壁上画风景画。玛丽·维齐尔发现后，气得大叫："烦死了，讨厌，又把我的墙搞得这么脏。"然后，命令郁特里洛打扫干净。后来，等到郁特里洛的作品可以卖到好价钱时，她才意识到她当时真是傻透了。于勒·德帕基假装安慰她，"若无其事"地对她说："要是那些美国佬到你家，然后出一大笔钱买郁特里洛用来刷厕所的水，你会怎么办？"

玛丽·维齐尔的伎俩一用再用，郁特里洛对她越来越依恋。在爱情方面，郁特里洛既羞怯又粗暴。他忌妒所有和玛丽·维齐尔开玩笑的人。于勒·德帕基曾经在美丽的加布里埃尔饭馆寄膳，自然成了郁特里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等于勒·德帕基走出饭馆的一刹那，朝他腿上扔了口锅。不过，没打着，砸在了一个家庭主妇的脚上，主妇手里提着一只奶罐，吓了一大跳，奶罐扔到地上，一阵大叫大嚷，警察闻声而来，把郁特里洛带到了警察局……那位妇女抱怨说她被吓出了毛病。此后几年，郁特里洛在警察局都有案底。

"美丽的加布里埃尔"的卑鄙无耻和利欲熏心得到了时间的惩罚：1918年，玛丽·维齐尔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早早把她珍贵的收藏卖掉。保罗·纪尧姆经马克斯·雅科布的提醒，直接去蒙马特高地把挂在墙上的画一并买下来，每幅200法郎，实值2000多法郎。几年后，就是10000多法郎。玛丽·维齐尔知道后，叫苦不迭。

一战期间，盖老爹逐渐取代了玛丽·维齐尔。他的"快餐馆"开在保罗－费瓦勒路和蒙塞尼斯路的交叉口，跟美丽的加布里埃尔饭馆在同一片建筑群里。玛丽·维齐尔的客人大多是生活在现实之外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而盖老爹的客人则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苏珊·瓦拉东和这位退休老警察达成协议，每天付5法郎，盖老爹负责郁特里洛的一日三餐，外加监视他的行踪。


圣丹尼教堂　郁特里洛"白色时期"的作品（1908年）

盖老爹动用了他全部的智慧，还是实难"不辱使命"。最后，不得不使出杀手锏，把郁特里洛关在房间里。郁特里洛自有对策，他从房间（在一

楼）的窗子里跳出来，去蒙马特高地的其他小酒馆过酒瘾。

这个彻头彻尾的可怜酒鬼在盖老爹“快餐馆”痛苦地生活了5年。1916年后，他彻底地摆脱了盖老爹的控制。让人难以意料的是，最后，他和盖老爹成了朋友。尽管不自由，但在“快餐馆”，他享受到他生命中仅有的家庭温暖。盖老爹夫妇待他很好。他们夫妇两个对他谆谆教导，还使出浑身解数，帮助郁特里洛戒酒。有时，郁特里洛被玛丽·维齐尔赶出来，忧伤失落地回到盖老爹那里，他们夫妇就安慰他。后来，记者们采访盖老爹时，他说：“他（郁特里洛）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心肠善良，也很听话，不过，要时时敲打敲打。”

一点都不记仇，盖老爹！……他把郁特里洛捉弄他的往事都忘得一干二净。如果赶上郁特里洛大叫着要喝酒，来不及给他送过去，他就在房间里摔桌子砸板凳。可怜的盖老爹向弗朗西斯·卡尔科倒苦水，说郁特里洛把他和他夫人攒了一年的5升酒都给喝光了，还有一瓶凡立水：“真是难以相信，不粘他的肠子吗！”

郁特里洛厌烦了受人看管的生活，没有酒的日子他一天也过不下去。他开始逃跑，去近郊的小酒馆里喝酒，去圣－德尼区，去圣－鲁昂区，反正去没有人能找得到的地方过足瘾。郁特里洛还会寄明信片来嘲讽他的房东，上面写着：“没喝醉”，或者：“只喝一小杯”。

过够酒瘾的郁特里洛回到盖老爹家：耳朵耷拉着，浑身脏兮兮，衣服破烂。做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样子，对盖老爹保证说再也不碰酒精了。盖老爹也不记仇，随即就原谅他。此后几天，有时是几个星期，郁特里洛就乖乖地待在房间里画画，赚钱付他的伙食费。

与玛丽·维齐尔以及其他小酒馆老板一样，盖老爹也发现，郁特里洛不是一无是处，他的作品很有艺术和经济价值。于是，盖老爹临时充当郁特里洛的中间人，把他的风景画挂在小酒馆的墙上。别人问起，盖老爹就说那是“莫里斯先生”的作品。盖老爹买回颜料和画笔，让郁特里洛教他画画。郁特里洛受宠若惊，还真像模像样地当起老师来，时不时地改改他房东的作业：“好，好，不错……我最好的学生盖值得表扬。”

盖老爹也不是个白痴，他还有点艺术天分。郁特里洛不清楚他学画的“良

苦”居心，对他悉心指点。盖老爹画了一些具有“郁特里洛的风格”的蒙马特风景画，用画界的行话说就是“临摹”。1954年，巴黎科学博物馆和国家保安局组织的赝品展览会上还见到了盖老爹的几幅大作。

穷人的旅馆

和小酒馆相比，蒙马特高地的小旅馆（即对外出租房间的小酒馆）的条件更差，就像“沙漠旅行客店”。房间里弥漫着臭虫和肮脏的味道。在《人物和风景》一书里，弗拉曼克详细描绘了房间的情况：潮湿的墙，发霉快要脱落的墙纸，灰灰的脏兮兮的床单，有缺口的洗脸盆，处处透露着穷困潦倒。酒馆－旅店的价格是每晚1法郎。有些艺术家干脆租带家具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租金为每周4法郎，里面可以点个煤油炉做饭。

其中，普瓦里埃旅馆在“洗衣船”对面，库特林、马克·奥兰、乔治·布兰丁博格、乔治·德洛、于勒·德帕基、还有蒙马特高地最特别的人物之一——数学家和钢琴家肖德瓦、莫迪里亚尼都在那里租过房间。普瓦里埃旅馆的老板埃格卡菲耶夫人，是个很专制的女人，“蒙马特的女疯子”。她认为她应该关心房客的生活和道德。一天深夜，于勒·德帕基把一个妓女带回家，看到埃格卡菲耶夫人径直走到他房间里，还带着满头的卷发夹子。用手指着那位他在罗什舒阿尔大街领来的妓女，埃格卡菲耶夫人呵斥道：“快滚！”第二天，尴尬无比的于勒·德帕基在小酒馆里哀叹道：“在我明白过来之前，她（妓女）把我的钱全带走了。”

后来，普瓦里埃旅馆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现代的楼房。

1934年，两个对生活绝望的人在房间里打开煤气想自杀，引发了一场爆炸，普瓦里埃旅馆顿成一片废墟。

布斯卡拉也对外出租房间，里面的设施比埃格卡菲耶夫人的还要糟糕。莫迪里亚尼，被埃格卡菲耶夫人赶出来以后，就住在那里。有一次，他差点被屋顶上掉下来的石膏给打昏。

布斯卡拉个子高大，笨手笨脚，扎着个女招待的围裙，戴着顶黑斜纹布鸭舌帽，神情恍惚，像掉进弥撒酒坛子里的圣心教堂管堂雇员。这个狡猾的

奥弗涅人知道莫迪里亚尼一个子儿也没有，担心他赖账，就每天晚上没收他的绘画工具和作品。爆炸事件之后，布斯卡拉逐渐改变策略，留莫迪里亚尼过夜，还把他的东西还给他：万一莫迪里亚尼去警察局告他一状，他可不想惹祸上身；宁可少得几法郎，也不愿意修房盖屋。

当时，莫迪里亚尼穷途末路，不名一文。到了晚上，不得不在圣－拉撒火车站候车厅的长凳上过夜。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以为他是个流浪汉，很可怜他，就等到第二天早晨才把他赶走。



第九章　商人和奸商

1900年到1907年，为了生计，毕加索不得不时时遭受商人们的白眼。除了贝尔特·韦尹，在蒙马特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商人。只在比加尹路周围，有一些旧货商、镶框工人、还有颜料商答应在店铺里摆放艺术家们的作品，条件是他们要买东西。

毕加索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这些人的名字：苏利埃，一位床垫和床上用品商；昂左利；托马；勒普特；利博德；特别是贝尔特·韦尹更是举足轻重。克洛维斯·萨戈在拉菲特路开了家画廊，应该也把他归为蒙马特的商人之列；不过，他只和画家打交道，经常去他们的画室里转转。

19世纪末，艺术家们纷纷来到蒙马特定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里离拉菲特路很近，只须路过马蒂尔路。拉菲特路是当时惟一的油画市场。画商们不乐意做先锋派艺术生意，在拉菲特路和勒佩尔蒂埃路却有：迪朗－吕埃尔、伯恩海姆、乔治·珀蒂专营印象派画作；勒－巴克·德·布特维尔专营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唐普拉埃、迪奥、和热拉尔是巴比松画派和学院派画家的支持者；伯涅的橱窗里则摆满了马德莱娜·勒梅特尔的玫瑰油画，像个花店；沃拉尔只展出塞尚、高更、雷诺阿和凡·高的作品。拉菲特路的画廊每年组织秋季沙龙和独立派沙龙，独立派画家的才华得以向世人展示，并借机见识一下他们同行的作品。

贝尔特·韦尹，才华横溢的女伯乐

1900年秋天，毕加索第一次去巴黎，经马尼亚克介绍和贝尔特·韦尹认

识。贝尔特·韦尹可非同一般，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她和沃拉尔、卡恩维勒、保罗·纪尧姆一起看做是20世纪艺术的倡导人。和毕加索第一次见面时，贝尔特·韦尹刚开了她的第一家画廊——确切地说是一个摊位——位于维克托-马塞路25号，离德加的住处只有几步路。德加是个疯狂的排犹主义者，对有这样的邻居很感到耻辱，路经画廊时，总恶狠狠地瞪上几眼，根本不把杜飞称为"奇才"的贝尔特·韦尹放在眼里。贝尔特·韦尹个子小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确实不怎么讨人喜欢。她面色苍白，嘴巴紧抿，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看起来像教堂里出租椅子的，又像刚刚制服学生的小学老师。跟她的长相最不协调的是她说话的神情，尖酸刻薄，充满嘲讽，特爱发牢骚。她的性格在她的回忆录《眼睛的一角》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措辞激烈、尖酸、刻薄。

几年前，贝尔特·韦尹从阿尔萨斯来到巴黎，先跟一位古董家学收藏古董和买卖旧货的技巧，然后，在那位古董家去世以后，跟他的遗孀借了375法郎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她先是帮别人代销，后来逐渐开始买卖杜米埃、劳特累克、奥迪龙·雷东的石版画。马尼亚克和杜飞建议她在她的画廊展出年轻画家的先锋派作品。

贝尔特·韦尹的商业手段很粗鲁：油画被衣服夹子夹着挂在画廊的绳子上面。后来，她逐渐展出马蒂斯、杜飞、郁特里洛、莫迪里亚尼、德兰，当然还有毕加索的作品。当时，毕加索和马尼亚克已经签了合同。贝尔特·韦尹一点经商头脑都没有，做生意只凭一时冲动，她绝不会把画卖给对绘画一窍不通的人。贝尔特·韦尹为人诚实正直，曾拒绝5法郎买郁特里洛的树脂水彩画，因为郁特里洛当时喝醉了，她不想趁人之危。起初，她睡在杂物堆里，在画廊里煮点蔬菜和水果当一日三餐。只要能赚到钱，哪怕是一点点，她都会欣喜若狂；而经常是不得不到当铺把她那可怜的首饰当掉。最后，沃拉尔不仅收藏了几百幅油画，还留下了一大笔财产；而贝尔特·韦尹去世前，几乎是一穷二白，还要靠艺术爱好者协会的救济。她痛苦地说："火中取栗，这就是我的生活。"贝尔特·韦尹于1951年4月去世，享年86岁。她原来的学生，后来发了财，出了名，为她募捐，把葬礼搞得还算体面。

尽管毕加索巴塞罗那时期和劳特累克时期的作品卖得相当不错，他和贝



尔特·韦尹的关系也是变故多多。1902年4月，贝尔特·韦尹为毕加索和路易－贝特朗·勒梅特尔举办了一次画展，展出了毕加索放在马尼亚克那里的一些作品。后来，贝尔特·韦尹又从毕加索那里买了几幅“蓝色时期”的素描和水彩画。她极不欣赏毕加索的“蓝色时期”，作品销路很差，不得不以5法郎甚至3法郎的低价出售，尽管还有些是名作。



佩德鲁斯·马尼亚克肖像画 毕加索（1901年）。马尼亚克是第一个与毕加索签约的画商。

不管怎样，毕竟是贝尔特·韦尹为毕加索“吸引”来他在巴黎的第一批爱好者：阿道夫·布里松，《时代》杂志的文学评论家；于克，《土鲁兹快件》的主编；安德烈·勒韦，油画收藏家和经纪人；马塞尔·桑巴，18区的国民议会议员；奥利维埃·森塞尔——国家参议员，雷蒙·普恩加来执政时期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曾一下子花了225法郎买走毕加索的4幅水彩画，他不仅仅是毕加索忠实的崇拜者，而且，在“毕加索集团”里的西班牙人被怀疑为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还挺身而出，给予他们有力的保护。

不过，毕加索和贝尔特·韦尹之间的合作还是带有些嘲讽的色彩。直到她死，贝尔特·韦尹还经常记起毕加索跟她要账时恶狠狠的眼神。

安布鲁瓦兹·沃拉尔，昏昏沉沉的克里奥尔人

1900年，马尼亚克为毕加索举办第一次画展，地点在拉菲特路6号的



画商安布鲁瓦兹·沃拉尔 毕加索（1915年）

安布鲁瓦兹·沃拉尔画廊。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和贝尔特·韦尹截然不同。随心所欲做生意的贝尔特·韦尹，按道理应该归到旧货商之列。

近10年间，沃拉尔成功地举办了塞尚画展（1895年）、马奈画展、还有高更、凡·高和雷诺阿等一系列画展。尽管受到保守派的连连攻击，他还是逐渐成为先锋派艺术的第一位画商。

马尼亚克把毕加索的作品带给沃拉尔时，很难说清楚他是不是对毕加索的画真正感兴趣。另外，沃拉尔是不是真正懂得绘画艺术？对此，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热特吕德·斯坦、路易·沃塞勒、弗朗西斯·卡尔科、乔治·贝松觉得他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总是指望二流画家来发财：伊诺桑蒂，罗普斯，德·格鲁让·皮伊……而弗拉曼克和沃拉尔关系不错，还仔细观察过他，说沃拉尔有很强的艺术洞察力，他还举出几个小故事证明他的观点：

"一天，他（沃拉尔）拿出几幅塞尚的作品让我看。

他对我说：'我想留下一幅，告诉我哪幅最好？'

我回答他说：'不，你先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幅，我再告诉你它到底好不好。'

啊！他给我看的那一幅正是我也觉得最好的作品。"

最后要指出的是，沃拉尔的兴趣点不是绘画，而是出版业，最喜欢装潢精美的书，他还请大画家给他收藏的书制作插图，博那尔为他画了《平行》和《达尔夫尼斯与克罗埃》，胡奥·杜飞则制作了《欧仁·蒙福尔美丽的孩子》的



插图；德加的任务是《泰利埃的小屋》；奥迪伦·雷东的大作是《圣·安东的诱惑》；鲁奥的任务是《流星的圆谷》；毕加索则帮他制作了《不为人知的杰作》和《自然史》的插图。直到现在，这些书看起来还很漂亮。

如果说沃拉尔展出的都是不知名画家的作品，那也是抛砖引玉，吸引绘画爱好者前来欣赏他的印象派作品收藏。凡·唐吉就上了他的“圈套”，还在画展上帮他充当“义务推销员”。

1901年6月24日，沃拉尔为毕加索和巴斯克画家伊图里诺办画展，这可是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盛会，虽然沃拉尔为画展几乎没做什么准备。他只喜欢在他的墙上挂满买回来的画，一点都不想着把油画挂到橱窗里，除非橱窗是空的。除了办画展，平常，他的画廊总是空空的。展厅的摆设怪怪的，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许多书、杂志和报纸，还有两把用稻草填塞的扶手椅，还有一口戈丹牌锅。

沃拉尔就半躺在一把椅子上，像只猴子，打着盹。保罗·莱奥托写道：

“要知道安布鲁瓦兹·沃拉尔有点像……怎么说呢？……真不好说。像……算了，不说了！我只想说一句话，他像只猴子，对了，就是这个，像只猴子。另外，他非常热情。一天中午，他去看加涅斯庄园看望雷诺阿先生。突然，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先生把自己吊在一根树枝上，还在上面荡呀荡了几秒钟。雷诺阿先生看见后，对他大叫：‘沃拉尔，哥们，那可不是椰子树！’”

除了喜欢女色和酷爱美味佳肴外，沃拉尔跟贝尔特·韦尹一样，也总是缺食少穿。一连几年，他都穿着同一件破旧不堪的外套和一双同样破旧的鞋子，看起来像双平底皮拖鞋。他的床特别硬，睡得他腰疼，也没钱换。沃拉尔年轻时，为了攒钱买康斯坦丁·居伊斯的画，曾连续吃了几个月的干饼①。后来，生活好些，他把画廊的地下室改建成厨房，在那里招待客人。他给他们做克里奥尔风味的饭菜，很丰盛，但很辣：咖喱鸡、克里奥尔米饭、椰子蟹、椰菜……他好像得了嗜睡症，所以人们开玩笑，说他一边睡觉一边发财。

①旧时海军和陆军士兵的备用食品。

吃完饭，他总要睡上一会儿。弗拉曼克讲道："有时，他的头轻轻摆动，突然往后一仰，撞在隔板上。睁开一只眼睛看看，然后又睡着了。有时，睡到下午还醒不来。"

沃拉尔压根儿没想过他会从商。而恰恰就是他，发现了那么多人的才华：马蒂斯、毕加索、德兰、凡·唐古、鲁奥等等。沃拉尔的父亲，一位留尼汪岛的公证人，曾把他送到蒙彼利埃学法律，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但是那座城市最吸引沃拉尔的就是用细线切黄油。在留尼汪岛，黄油很稀罕，总是一盒盒的，从来没见过一大块一大块的。他简直欣喜若狂，做梦都想这样。

后来，沃拉尔去巴黎准备学士考试——不费吹灰之力，只不过，他没有涉足法律界，而是喜欢去塞纳河畔的旧书店里淘书。当时，旧书商那里还是有些好东西。沃拉尔发现了多米埃和加瓦尔尼的一些石版画、罗普斯和康斯坦丁·居伊斯的油画，然后，把这些转卖出去，赚了一小笔。一步一步地，最终于1890年，沃拉尔在拉菲特路开了他的第一家画廊。如果没有毕萨罗——也是个克里奥尔人，不过是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建议他要把眼光放在他的印象派画家朋友身上的话，他的生意很可能就限制在二流画家那里。毕萨罗特别向他推荐刚刚在印象派崭露头角的塞尚。当时，塞尚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在他的画室里，堆了几百幅油画和水彩画。沃拉尔觉得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开始着手和塞尚联系。万事开头难，塞尚不总待在巴黎。沃拉尔最后还是通过他儿子和塞尚见了面。塞尚愉快地接受了沃拉尔建议，并给沃拉尔一股脑儿地寄去150幅不同时期的作品。沃拉尔要为塞尚办画展的举动激发了先锋派画家的热情拥护，同时也招来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从此，塞尚为世人所认同，在1907年的秋季沙龙回顾展，他最终得到世人的赏识。塞尚画展，使沃拉尔在艺术界声名大噪，成为先锋派艺术的保护人。

沃拉尔的商业技巧很特别，从不对绘画爱好者有求必应。他总说，在他的店里没有客人想买的作品，说"你过两天来店里看看"就把客人打发了。而客人再次去他的画廊，又总见不着他的人影；再次见到他时，几个星期过去了。沃拉尔总能把这个伎俩运用得恰到好处，以此来刺激客人的购买欲：

"'这幅画多少钱？'客人问。



'130 法郎。'

'100 法郎，怎样？'

'福兰和罗普斯的作品你都讨价还价？！我 130 法郎不卖了，现在要 150 法郎。'"

沃拉尔对画家的态度也差不多。他从来不刻意去认识画家，或者尽力帮他们卖掉作品。沃拉尔喜欢把他看好的画家的作品全部买下来，他曾一下子买了很多幅弗拉曼克和德兰的画，然后放到地下室里。弗拉曼克每隔两三个月就给沃拉尔带过来二十几幅作品，有一次，他发现他带过去的画竟然原封未动。弗拉曼克气急败坏地说："我真应该在空白的画布上写下'去你妈的沃拉尔'。"

沃拉尔对毕加索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动很多，经历了很多冷战。一开始，沃拉尔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毕加索的西班牙风景画，到后来，尽管毕加索开的价很低，20 幅画 150 法郎，简直像做梦，沃拉尔却说什么也不愿意买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

直到"粉红色时期"，沃拉尔才重又开始欣赏毕加索，而且一下子花了 2000 法郎买了 30 幅油画。同时，还买了他的一套版画和几件雕刻作品，其中有《疯子》。

不过，从那以后，两个人又开始疏远。就像原来不喜欢"蓝色时期"一样，沃拉尔对立体派艺术嗤之以鼻，除了毕加索为他画的一幅满是菱形和三角形的肖像画。他背叛毕加索招来阿波里奈尔的挖苦和讽刺。本来，阿波里奈尔就不喜欢沃拉尔。

毕加索也不把这个整天昏昏沉沉的小商人放在眼里，不过，毕加索对他的优点还是赞赏有加：公正，遵守诺言，只须君子协议。沃拉尔喜欢搬弄是非，像个长舌妇。毕加索和沃拉尔不怎么在一起合作——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不为人知的杰作》和《自然史》制作插图，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1939 年 7 月底，沃拉尔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正在度假的毕加索还是从安提贝赶来参加他的葬礼，要知道，毕加索对死亡可不是一般地恐惧。这是他们友谊最有力的证明。也许，真正让毕加索遗憾和痛心的是，失去了一位

年轻时代和初涉绘画领域时期的朋友。

贝尔特·韦尹和沃拉尔为毕加索举办的画展都有些不尽如人意，至少不像马尼亚克允诺他的那样精彩。画展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吸引了不少绘画爱好者，他们最终都成了毕加索作品最忠实的买者和最忠诚的拥护者；对毕加索的绘画事业发展尤其有利的是，画展吸引了众多巴黎评论界的目光。除了马克斯·雅科布的好感、后印象派画家的保护者居斯塔夫·科基奥的钟爱以外，画展还引起《白色杂志》评论家费利西安·法居的注意，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独立艺术的爱好者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

费利西安·法居，是巴黎市政府户籍登记处的一名职员，个子小小，走路摇摇晃晃。他乘工作之便向沃拉尔提供了于比神父年历——因为沃拉尔取代了阿尔弗雷德·雅里——一个权威人士的名单：圣－奥兰格，童贞女；圣－佩拉德，主教；圣－古尔；圣－普罗菲；圣－加尔米耶；圣－卡尔普，主教；圣－维奥勒，童贞女和殉教者；圣－卡农，神父；圣－斯佩西尔兹；圣－布罗斯；圣－特朗谢；圣－佩罗内尔。除此之外，费利西安·法居还发现了《伙伴》的作者，于勒·罗曼！

法居的观点清晰，对毕加索的作品评价中肯：

"不难看出，他（毕加索）的狂怒还远远没有留给他充裕的空间形成自己独到的风格，他的个性体现在狂怒中，体现在他的青春率直中（毕加索当时还不到20岁，却是个高产画家，一天三幅）。对他来说，危险就在于这种创作的激情会很容易让他拥有精湛的技巧，容易获得成功。多产和作品丰富是两码事，就像暴力和精力充沛。"

直到现在，费利西安·法居的观点还可以用来评价毕加索已臻于完美的作品。

1902年贝尔特·韦尹为毕加索举办画展，给画展作序的阿德里安·法热对毕加索的评价和费利西安·法居不谋而合。

艺术旧货商

“蓝色时期”的五年，毕加索和马尼亚克断绝了来往，失去了沃拉尔的资助，那是他最困难的时光。贝尔特·韦尹什么也卖不出去，而且她一点都不喜欢“蓝色时期”。走投无路，毕加索只得求助于蒙马特的旧货商。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就把毕加索最好的树脂水彩画和素描买走了。说句公道话，他们也是只要能赚点就赶紧把画脱手。因此，收藏家兼商人威廉·于德以10法郎的价钱就把毕加索1901年在克利尼大街画的《浴缸》买走了。

毕加索作品最主要的两个买主，也是蒙马特旧货商的典型：苏利埃老爹和克洛维斯·萨戈，两个都是怪人。

欧仁·苏利埃，原来是集市上的角力者，后来在马蒂尔路开了家商店，在梅德拉诺杂技场入口的对面，主要卖床垫布和床上用品。艺术家们总去他的商店买东西，没钱付账，就用画抵押。就这样，不知不觉，苏利埃开始买卖油画——他每天都醉醺醺的，一天喝三顿——成了油画商人。苏利埃对艺术一窍不通，经常把代售的画就挂在铺面前面，从来不管天气好坏，也不担心狗把画咬坏。从画家手中买画，苏利埃开出的价格不会超过100法郎，但他会用现金支付，总有忠实的绘画爱好者来买。安德烈·勒韦尔不无讽刺地说：“一到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起他（苏利埃）。”

对毕加索来说，苏利埃更是功不可没。毕加索无米下炊时，就派马克斯·雅科布带着树脂水彩画和素描去苏利埃那里。马克斯·雅科布回到“洗衣船”总带回来一只装满食物的篮子，然后就有一顿丰盛的午餐。通常水彩画的价格是3法郎、素描是0.1法郎，马克斯·雅科布真是忍痛割爱。

苏利埃老爹像个吸酒精的海绵，他和另一个“臭名昭著”的酒鬼郁特里洛关系很铁。郁特里洛没钱买绘画用品，而他又很想去室外写生，他就去苏利埃老爹的店里拿颜料、板纸和画笔。苏利埃老爹总是友好地轻轻拍他一下：“随便拿，你画的可是名画。”

苏利埃老爹对绘画一窍不通，他经营的都是像杜飞、雷诺阿、劳特累克、梅特赞热、毕加索等大家的作品。1908年，毕加索花了5法郎把杜阿尼埃·卢梭的《克莱芒丝的肖像》买回家。

苏利埃老爹的晚年相当悲惨。警察局控告他有伤风化并涉嫌地下赌博，一系列的麻烦事把他搞得神经衰弱。他那些老朋友也没能带给他及时的心灵慰藉。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1909年4月死在医院里，死时，还不到60岁。

而克洛维斯·萨戈更怪。他原来是个面包商，后来不知怎地做起了油画生意，大概因为他哥哥埃德蒙在夏托登路卖木版画和铜版画。和苏利埃的区别在于，克洛维斯·萨戈酷爱绘画。不过，对待画家，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克洛维斯·萨戈表面上很大方，1913年，他去世以后，阿波里奈尔称他为"年轻画家的教父"。其实不然。克洛维斯·萨戈诡计多端，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公证人。看似慷慨，但当艺术家们有求于他时，他就会毫不留情面地狠宰他们一刀。克洛维斯·萨戈的店位于拉菲特路46号——还是个药店，时不时地向艺术家们兜售弹性润喉糖球和止咳糖浆——主要经营蒙马特年轻画家的作品，既有郁特里洛和毕加索的作品，又有埃尔潘和苏珊·瓦拉东的大作。克洛维斯·萨戈在绘画方面很有天分，也很有眼光。他出售的油画主题最大胆，有的还预示着未来艺术发展。克洛维斯·萨戈就是毕加索的"伯乐"，他们的相识也很不同寻常。穷困无路的毕加索要卖给他三幅街头卖艺者的画，萨戈很感兴趣，亲自跑到"洗衣船"和毕加索商议。最终，萨戈把价格抬高到700法郎，还是遭到毕加索的严词拒绝。

几天后，毕加索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不得不又去了趟拉菲特路。萨戈对毕加索的处境心知肚明，给出的价格是500法郎。毕加索狂怒不已。第三天，为生活所迫，毕加索再次来到萨戈的店。这次，萨戈只肯出300法郎。令人厌恶！上个世纪初，年轻的艺术家们遭受了无数次奸商的盘剥。

不知羞耻的萨戈还会去"洗衣船"，给毕加索带上一把从花园里摘的鲜花："收下吧，画画静物什么的，可以把画送给我嘛！"

虽然萨戈在绘画方面非常有天分、鉴赏力也不错，但还是为艺术家们所不齿。大家都不肯把作品卖给他，不愿意跟他交朋友，1913年，萨戈去世时，已是众叛亲离。他的遗孀，什么都不懂，很快就把萨戈的收藏转手卖掉，价格低得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那些珍贵的立体派画作。萨戈的收藏数量实在可观，直到现今，萨戈－勒·加莱克画馆的主要收藏品都是当年萨戈四处收

集来的。

画商中的“夏洛克”

虽然苏利埃和萨戈都算得上奸商，但和他们的同行利博德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利博德才是名副其实的奸商！他贪婪冷酷，对郁特里洛层层剥削，狡猾，出尔反尔，残忍，胆怯，活脱脱夏洛克或斯卡班第二。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做生意，还是真正喜欢艺术，反正只要有人出高价，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最珍爱的收藏卖掉；利博德对绘画，就像一只觅食的狗看到菰，能够发现块菰自然不错，但最爱的是骨头。菲南蒂·奥丽维讲起，有一次，她听到利博德跟别人说：“我买毕加索的画并非出于喜欢，而是我觉得有一天，他的画会增值。”

利博德原来是马匹拍卖估价师，爱好艺术。他的性格跟他的职业很配，雷诺阿就曾说：“他有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利博德吹毛求疵，多愁多虑，总说腰酸，胃痛，肝脏劳损，以此骗取别人的同情。他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发黄，简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巴齐尔大老爷。利博德还有一个怪癖，喜欢贴着墙走路，好像害怕碰到不想见的人或东西。当然，在蒙马特，他骗过很多艺术家，他们对他恨之入骨，“多行不义必自毙”。利博德自己也清楚得很，他去蒙马特高地时，总在口袋里放把手枪，以备不测。

此外，利博德就老老实实地窝在特律代那大街的商店里耐心等待“受害者”：艺术爱好者或艺术家。和沃拉尔一样，他总是凝视着玻璃窗，面色苍白，目光呆滞，像一只等待猎物的蜘蛛，密切注意着蒙马特高地的一举一动。

利博德和郁特里洛、苏珊·瓦拉东、还有于泰签了合同。尽管于泰才华平平，作品倒还值些钱。五年间，他们之间经历了不断的争吵、闹僵、再和好。利博德也逐渐开始和其他艺术家打交道，并且从旧货商那里收购艺术作品：毕加索、奥迪龙·雷东、凡·唐吉、马尔凯等人的画作。然后，把能赚到钱的再转手卖掉。利博德听说莫迪里亚尼生命垂危躺在医院里，赶紧跑到塞纳河两岸的旧货商店，把莫迪里亚尼的作品抢购一空。听到莫迪里亚尼去世的消息，利博德在小酒馆里欣喜若狂：“我运气真好！直到他死的前一天，

我还买到他的画，要知道，我可没花什么钱！”简直令人作呕。

在回忆录中，贝尔特·韦井这样评价利博德："吃死尸的鬣狗。"

为了逃营业税，利博德还对外宣称，说他在特律代那大街开的不是商店，只是一间办公室，是他和朋友们聚会的地方。他假装卖画，给艺术爱好者寄了很多宣传材料，上面印着："路易·利博德先生有意以友好协商方式出售他的现代绘画收藏。"而他的收藏很像达那伊得斯水槽里的水，永远都取之不尽、售之不完。

利博德从来不在自己的商店里为他钟爱的画家办画展。他像一只不在自己鸟窝孵蛋的布谷鸟，总在同行的画廊里办画展。利博德颇有文采——他好像还出水能跳，入水能游，亲自为画展作序，措辞恰当，评价中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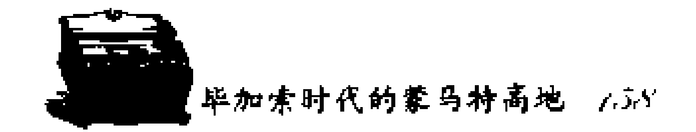
到了晚年，利博德是真病了，得了严重的胃溃疡，他放手所有的生意，离开了蒙马特。1923年利博德去世以后，他女儿把他收藏的郁特里洛"白色时期"作品卖掉，卖了100万法郎。相对利博德全部的藏画来说，这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而蒙马特其他商人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辛苦操劳，获利微薄。托马老爹在罗什舒阿尔路开了家画廊，主营梅特赞热和马尔凯的作品；昂索利老爹则把他的镶框店开在拉·维奥维尔路，阿贝斯路的角上，出售德加和瓦拉东的石版画和郁特里洛的树脂水彩画。昂索利老爹举止粗鲁，言谈粗俗，爱发牢骚。德加还给他讲绘画，昂索利老爹进步很快，逐渐对绘画有了独到的见解。德路、苏利埃老爹、曾当过屠夫的雅各比、还有利博德，他们都愿意和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打交道。

他们一开始可不是干这个的！这一现象，在当时的艺术市场很稀松平常。1978年，在巴黎，重要的画商中，原来有的做过理发师、袜商、地毯商、裁缝，甚至饭馆老板，军团士兵，等等。光荣的传统代代传！

最初的绘画爱好者

1904年到1907年，一方面，毕加索不得不和奸商打交道，另一方面，他还通过阿波里奈尔和马克斯·雅科布或其他人，直接把作品卖给爱好者。



一开始，毕加索粗略地统计过绘画爱好者的人数，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把与蒙马特地区的联系是否密切为标准，应首推马塞尔·桑巴。他是巴黎18区的社会党议员、蒙马特的民选代表，后来娶了若尔热特·阿居特为妻。而若尔热特·阿居特曾是古斯塔夫·莫罗的学生，创作过野兽派艺术作品，马塞尔·桑巴就在他夫人的指引下，开始进入先锋派艺术领域。他曾劝说他的同事支持独立派画家，没有奏效。哎呀！饶勒斯只喜欢墨守成规的画家；马塞尔·加香和西尼亚克则只对新印象派画家感兴趣。

桑巴-阿居特夫妇在绘画界颇有名气。他们完全是"美好年代"菲勒蒙-博西斯夫妇的翻版。若尔热特·阿居特和马塞尔·桑巴读的书和报纸都一模一样。他们夫唱妇随，阿居特经常陪着桑巴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聚会。1916年，马塞尔·桑巴当选为市政工程部部长后，她还是始终如一地跟随着他。马塞尔·桑巴召开部长会议时，她就在候见厅或办公室的门口等他。

他们融洽的夫妻关系连上帝都忌妒了。马塞尔·桑巴于1922年9月死于心脏病，当时，若尔热特·阿居特没有掉一滴眼泪：她把他的后事安排妥当，立下遗嘱，跟他的母亲道别。最后开枪自杀殉夫。若尔热特·阿居特这一伟大的举动深深震惊了刚刚结束一战的法国社会。

在自杀之前，若尔热特·阿居特把他们夫妇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但卢森堡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前身）拒绝接受。如果不是格勒诺布尔博物馆答应保管的话，众多珍贵的画作很可能就丢失了。同时，幸亏有桑巴的收藏，名不见经传的格勒诺布尔博物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以成为法国第一所现代艺术博物馆。

蒙马特的艺术爱好者里，还有昂热利老爹。他是个瞎子，原来做过诉讼代理人的书记员。昂热利老爹个子小小，喜欢小碎步奔跑。这个老家伙是蒙马特高地画室的常客。他住在加布里埃尔路，在马克斯·雅科布隔壁。他狭小无比的房间里堆满了破烂玩意。退休后，昂热利老爹的生活主要是买画，虽然眼睛看不见，但选起画来，他的洞察力不容轻视。一个小姑娘既是他的向导，还负责跟他描述油画的内容。他一手扶在那个小姑娘的肩上，按照她的口述，依照他眼睛没瞎时的经验进行挑选。同时，画家们也挑出好作品推荐给他：昂热利老爹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另外，莱昂老爹也是对绘画给予了极高的热情，当然，也不是毫无私心。他坚信，在蒙马特的画家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将在画界一举成名，他还是相当有远见的。总有一天，他的收藏会带给他一大笔财富。不过，他的美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成泡影。通货膨胀迫使他不得不忍痛把莫迪里亚尼和郁特里洛的作品卖掉。1921年莱昂老爹含恨去世，生前他已是一无所有：如果再等上几年，他将是百万富翁。

和众多的先锋派画家一样，毕加索的"荒年"，随着一些收藏家陆续来到蒙马特高地而结束；收藏家中，俄国人有伊万·莫罗索夫和斯妥基那；美国人有热特吕德·斯坦和莱奥·斯坦。

伊万·莫罗索夫是个富有的纱厂厂主，俄国纺织大王——拥有1.5万名工人——他对印象派艺术尤其感兴趣，如塞尚和高更。他也喜欢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如博那尔和莫里斯·德尼的装饰画。从1908年起，他开始从沃拉尔手里买毕加索的作品：《彩衣小丑》和《沃拉尔肖像》。沃拉尔很愿意把画卖给伊万·莫罗索夫。

莫罗索夫家族很奇怪。沃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起，伊万·莫罗索夫有个弟弟，一次聊天聊得好好的，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一把手枪，然后很平静地说："我自杀怎样？"接着，把枪管对准太阳穴开了一枪……

财富从冷漠中来

塞尔日·斯妥基那是一位成功的莫斯科商人，小麦大王。他对野兽派和毕加索尤为钟爱。他的府邸是原来特鲁贝特兹克娃诸位王子的宫殿。15年间，他收藏了很多作品，令夏加尔和众多俄国先锋派画家赞叹不已。在回忆录中，菲南蒂·奥丽维说他平淡无奇，个子小小，面色苍白，像患了脑积水，说话结结巴巴，还是个犹太人。

奥丽维对斯妥基那的描述无一正确。马蒂斯给斯妥基那画的肖像画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斯妥基那长的一点都不怪，他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古伊斯兰教正统派教徒。热特吕德·斯坦补充道，斯妥基那有点结巴，但不严重。

斯妥基那是个油画迷，他先是欣赏马蒂斯，1909年买了马蒂斯的《舞蹈》

和《音乐》画屏装饰他的府邸，斯妥基那出价2.5万法郎，这在当时，创下了先锋派艺术作品价格的最高记录。要知道，以往再有名的画家，也没有卖过这么高的价。

同时，对毕加索“粉红色时期”的作品和初期的立体派作品，斯妥基那也是毫不吝啬。他买了：《侍女》、《萨巴泰斯画像》、《持扇的女子》、《伊莎博皇后》。一天，收到卡恩维勒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手中有很多毕加索的新作，斯妥基那立即从床上跳下来，赶过去看。1917年，他收藏了50多幅毕加索的作品和40多幅马蒂斯的作品，还不算塞尚、高更和凡·高的作品。斯妥基那战争期间被驱逐出境后逃到巴黎。偶尔在画廊里见到他，已经是穷困潦倒，没有钱买他喜爱的油画。斯妥基那的收藏后来都被苏维埃政府没收充公，可他一点都不感到痛苦，还解释说：“不管怎样，我愿意把我的收藏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现在，斯妥基那的收藏分别存于列宁格勒博物馆和莫斯科博物馆，这两座博物馆是世界上拥有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作品最多的博物馆。

志同道合的姐弟俩

斯坦姐弟都是素食主义者，信奉雷蒙·迪康的自然主义理论。他们是“美好年代”的流浪知识分子，孩提时来到欧洲，随父母踏遍了著名的艺术之都和欧洲的主要博物馆。但一开始，胖胖高高的热特吕德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医学。但不知什么原因，她放弃了博士研究。之后，热特吕德和她弟弟莱奥一起回到欧洲。他们的哥哥很慷慨，也很热心——哥嫂夫妇都是收藏家，他们父母去世后，如果没有哥哥的资助，热特吕德和莱奥在伦敦和佛罗伦萨怎能过上自由自在四处观光的日子？在他们姐弟俩到处游玩的途中，莱奥还收集了很多日本版画。

1904年，毕加索刚刚在“洗衣船”安顿下来，斯坦姐弟也厌倦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决定在巴黎定居。他们住在弗洛吕斯路，房子不大，但画室很大。房子里摆满了他们四处买来的雷诺阿、塞尚、高更、土鲁兹－劳特累克、还有格列柯、杜米埃和德拉克洛瓦的作品。



热特吕德·斯坦肖像画 毕加索（1906年）

热特吕德和莱奥一到巴黎，便到处收集塞尚的作品。他们在佛罗伦萨时，就听贝尔纳·贝朗松提到过塞尚。斯坦姐弟从沃拉尔手里买了不少塞尚的作品，颇费了些气力。当时，沃拉尔不愿意把他收藏的作品卖给他们，他觉得这两个美国人疯疯癫癫的。后来，热特吕德在她的回忆录《艾丽斯·托克拉斯自传》中提起他们和沃拉尔打交道的情况，简直是枝节横生，滑稽可笑。

一天，斯坦姐弟在拉菲特路上闲逛时，不经意在克洛维斯·萨戈的画廊发现了毕加索的作品。于是，就花了150法郎把毕加索的《琳达肖像》买回家。琳达是个卖花女，经常到红磨房和蒙马特高地的画室里卖花。毕加索的创作生涯中，这幅画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创作于毕加索"蓝色时期"向"粉红色时期"的过渡时期。

萨戈跟热特吕德谈论了很多毕加索的故事，她被毕加索的才华深深吸引，很想和他认识。后来，热特吕德由亨利－皮埃尔·罗什陪着，直接去"洗衣船"拜访毕加索。

他们两个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热特吕德时而把毕加索比做擦皮鞋工，时而把他比做斗牛士。而年轻的毕加索成为弗洛吕斯路斯坦姐弟家聚会的焦点。每周六晚上，他们家里聚着形形色色的人：巴黎大学的美国留学生、德国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中，有马蒂斯。热特吕德买了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后来，在1905年的秋季沙龙的野兽派艺术展厅里，这幅画引起大家的反感。

热特吕德·斯坦很自负，不过又很荒谬，她曾宣称自己没看过一本法语书。她的文笔还算健康和刚劲。在《艾丽斯·托克拉斯自传》中，她竟胆敢说她自己慧眼识得20世纪的艺术大师。实际上，她的弟弟莱奥才真是有艺术



鉴赏力，他对艺术革新派很感兴趣，买了很多奇特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

有些同性恋倾向的热特吕德对毕加索情有独钟，对他的才华欣赏有加。他们经常在思想上沟通，谁也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热特吕德只提起他们很投机，让她终生难忘，却没有透露半句他们谈论的主题。



戴帽子的女人 马蒂斯（1905年）

在斯坦家里，毕加索感受着姐弟俩从世界各地尤其是英国和瑞士所带回的丰富文化艺术知识。毕加索讲起，1906年他为热特吕德画肖像画，作品中处处体现着他所受的影响。这幅画像是毕加索“粉红色时期”结束的标志，是他新艺术方向的开端。9个月后，他创作出《阿维农少女》这幅最具革命性的作品。

毕加索对热特吕德的个性和魅力极为欣赏，他想为她画一幅画像。热特吕德愉快地接受了毕加索的美意。她天天去“洗衣船”，画像画下来，她竟摆了八十几种姿势。她慢慢成了“洗衣船”的名人。热特吕德善于观察，从那时起，她就开始为她以后的回忆录收集素材。她的回忆录成为毕加索在蒙马特生活最后时光的有力见证。

毕加索和“洗衣船”其他的艺术家经常偷偷取笑热特吕德，但又不敢当面得罪她，毕竟当时艺术爱好者为数不多。尽管斯坦姐弟出的价不是很高——热特吕德曾夸口，说她买毕加索“粉红色时期”的全套水彩树脂画仅花了25法郎——但数量还是很可观。后来，莱奥回美国前，姐弟俩把收藏平分。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归莱奥所有；热特吕德留下了毕加索和其他立体派画家的作品。莱奥走后，热特吕德仿佛没了主心骨，只喜欢二流画家。毕加索不无酸意地说，

热特吕德堕落了。不管怎样，他们姐弟俩还是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力，毕加索总把新结识的女友介绍给他们认识。1946年，热特吕德去世前，毕加索还带了弗朗索瓦兹·吉洛去看望她。

毕生献身艺术的商人

1907年，一位年轻商人来到蒙马特高地，毕加索和小商小贩们的讨价还价，还有经济上的拮据，都宣告结束。他就是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他毕生献身于毕加索和其他立体派画家的艺术发展事业。

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曾被他的同乡威廉·于德带到"洗衣船"。威廉·于德在克洛维斯·萨戈画廊买下《浴缸》。克洛维斯·萨戈既是油画经纪，又是收藏家，主要对幼拙艺术派画家感兴趣，曾为杜阿尼埃·卢梭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后来慧眼识得塞拉费勒·德·桑利、维樊和邦布瓦。1907年4月，威廉·于德在毕加索的画室里第一次目睹了《阿维农少女》，起初，他很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威廉·于德为《阿维农少女》深深打动，他对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说到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大加赞赏，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出于好奇，请求威廉·于德带他去见毕加索。

初出茅庐的卡恩维勒最感兴趣的是野兽派艺术。他的画廊位于维尼翁路，里面摆满了布拉克野兽派时期、弗拉曼克、凡·唐吉、德兰的作品，色彩斑斓夺目。卡恩维勒祖籍德国，比毕加索小三岁，出身于曼海姆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是个天生的油画迷。他父母打算让他继承父业，卡恩维勒说服了他们，着手艺术买卖。他的叔叔们交给他2.5万法郎，要求他一年之内做出点成绩，并警告他说："一年后，如果成功，你可以继续干你喜欢的事，不过，要是一无所成，你就得去南非。"

《阿维农少女》让卡恩维勒目瞪口呆；画中全新的艺术思想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这幅作品将在绘画界开启革命性的新时代。商人的直觉告诉他，在野兽派领域，沃拉尔已独占鳌头；而毕加索，将震惊美术界。深思熟虑之后，卡恩维勒决定把赌注压在毕加索身上。万事开头难：毕加索早已对商人大失所望，况且还是个办事不牢靠的毛头小子。后来，毕加索还是被卡恩维勒的

执著打动了。

年轻的卡恩维勒，集艺术爱好者与精明商人于一身，在上个世纪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像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有经济利益才能促使人们为艺术卖命，而不是为艺术献身，跟沃拉尔截然相反，卡恩维勒不仅打心眼里喜爱绘画艺术，他对画家也是由衷地佩服和感兴趣。他不仅和他们有生意来往，还深谙如何同画家们打交道，跟他们交朋友。他有一颗孩童般纯洁的心灵。虽非情愿，他还是毫无怨言地陪毕加索去梅德拉诺杂技场，陪凡·唐吉频频出没于舞场。但生意上，他绝对不受个人感情支配。在回忆录中，菲南蒂·奥丽维专门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他，说他是“真正的犹太商人，懂得赚钱的艺术，敢于冒险”。卡恩维勒雄心勃勃，大有做出一番事业的激情。他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同画家谈价钱，把画家们讲得疲惫不堪，最后让步。后来，卡恩维勒辩解道，他也别无选择，想在这一行里混下去，除了强硬，没别的好办法。这倒不无道理，一战前的艺术市场，顾客最看重的是价格。

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为人正直，直到1972年，他和毕加索之间一直很友好融洽。1914年到1944年，他们暂时终止了合作：一战爆发，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去瑞士避难，他不愿意和法国为敌，与此同时，毕加索和另一位画商保罗·罗森贝尔格签订了合同。直到国土解放以后，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和毕加索才得以再续前缘。

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勒的出现，是毕加索的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从1907年起，毕加索不再为生计发愁，与蒙马特的旧货商一刀两断，再也不用忍受他们的白眼，经济上的独立和宽裕赋予他更广阔更自由的创作空间。



第十章　作为结束的宴会

对毕加索来说，在蒙马特的生活，那在恐慌、贫困、对未来的不确定中开始的日子，在宴会的轻松、愉快、成功的满足中结束。1908年12月底，大家为杜阿尼埃·卢梭设宴，而在这里，宴会的象征意义大大超过了它的本义。它标志着先锋派艺术为世人所承认，幼拙艺术和20世纪早期艺术的蓬勃发展，也是创新派艺术家、野兽派和立体派艺术的创始人在蒙马特高地的生活最风光的时刻。



我自己，肖像风景　卢梭（1890年）

如果把这次宴会单纯看做是杜阿尼埃·卢梭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的事件，就大错特错了。起初，毕加索在克洛维斯·萨戈手中买下《克莱芒丝的肖像》时，还想当然地认为是他第一个发现了杜阿尼埃·卢梭的艺术才华。其实，在他之前，雷米·德·古尔蒙、阿尔弗雷德·雅里、毕萨罗，还有保罗·西涅克就和杜阿尼埃·卢梭相识，并很赏识他。从1895年起，杜阿尼埃·卢梭就和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开始联

系。在独立派艺术画展上，又和阿波里奈尔相识，当时，身为独立派画家协会主席的保罗·西涅克，对杜阿尼埃·卢梭赞赏有加。然后，通过阿波里奈尔，毕加索和卢梭见了面。阿波里奈尔把卢梭称作“温顺的小傻瓜”和“无忧无虑的天真汉”，他看到毕加索对卢梭如此欣赏感到很有趣。11月的一个晚上，阿波里奈尔把毕加索和菲南蒂·奥丽维还有几个“洗衣船”的画家带到卢梭的画室。画室位于佩雷尔路2号的普莱桑斯，14区最靠里的地方。那天，卢梭在画室里开晚会招待他的邻居。

他主要是想借机嘲笑亨利·卢梭和他的朋友、街区的小商小贩，还有跟他本人一样普通的小雇员。在这个郊区小圈子的聚会中，还有杜阿尼埃认识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乔治·杜阿梅尔和他的夫人布朗歇·阿尔巴那，一位还有些名气的女演员；于勒·罗曼；卢克·迪尔坦、罗贝尔、索尼娅·德洛内夫妇，他们都是杜阿尼埃忠实和热情的崇拜者，其中还有几个德国人，还有阿波里奈尔和玛丽·洛朗森。

杜阿尼埃·卢梭的消遣晚会是他画作的写照：包含着奇特而宽容的天真。面包师、杂货商、铁路退休工、市政府雇员都会走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或仅仅自言自语几句。有一些就伴着杜阿尼埃的小提琴哼唱小调。晚会结束的时候，杜阿尼埃往往演奏一些优美的波卡舞曲或玛祖卡舞曲：《塞西利亚特》、《天使的梦幻》、《宝贝波卡舞》、《小铃铛》……

有一次，晚会快结束时，毕加索决定回请杜阿尼埃一次以表谢意。他和阿波里奈尔约好为杜阿尼埃搞一次宴会，当时，杜阿尼埃正在为阿波里奈尔画肖像画。在蒙马特的艺术家眼中，没有比善意地嘲笑杜阿尼埃和在他那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更让杜阿尼埃感到有面子的了。50年后，毕加索还饶有兴致地对热内维埃夫·拉波特讲道：“就像杜阿尼埃·卢梭的晚餐，你知道，真是个玩笑话。没有人相信他的才华。只是，他很认真，他能高兴地哭出来。大家不能让他失望。”

要指出的是，毕加索买下杜阿尼埃·卢梭的《克莱芒丝的肖像》，不仅因为他对这幅画情有独钟，还因为画中表现的美学观不落俗套，与他本人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假如有人真想嘲笑杜阿尼埃这个“温顺的小傻瓜”，那一定是阿波里奈尔。在杜阿尼埃还是个普通的入市税征收处雇员时，



阿波里奈尔就编造了很多他的故事，把他说成是海关官员，被巴赞派到墨西哥考察。阿波里奈尔瞎编乱造：杜阿尼埃一点都不觉得好玩。再说，杜阿尼埃对亨利·卢梭的作品无动于衷，以致把亨利·卢梭为他和玛丽·洛朗森画的肖像画束之高阁。马克斯·雅科布也是个故弄玄虚瞎编乱造的主儿。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笔墨来叙述宴会本身，事实却完全不同。尤其是安德烈·萨尔蒙在他的自传《无止境的回忆》中反驳了热特吕德·斯坦、菲南蒂·奥丽维以及莫里斯·雷那尔对当时情景的描述。热特吕德·斯坦毫无幽默感，也没有必要的常识，在她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疑点，或者说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对她的描述，应持保留态度。而菲南蒂·奥丽维和莫里斯·雷那尔的回忆有20年的间隔，内容上也不一致。不过，他们所记录的事件，能从毕加索和安冬尼亚·瓦朗坦二战后的通信中得到证实。

毕加索决心把宴会办得体面些：他把挂在画室墙上的画作和他四处收集来的“破烂货”取下来；凡·唐吉和雅克·瓦扬的画室则用做配膳室和衣帽间。毕加索画室的墙上只留下他刚刚买回来的黑非洲面具，还有帕高·迪西奥遗忘在那里的油画。人们用带叶树枝、标语横幅、还有小彩旗把房间装扮得像在欢度国庆节。一条大横幅从房子中间穿过，上面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为卢梭大声叫好”。在餐桌前面，搁凳上放着很多版画，阿宗早已把厚瓷器的碟子和酒杯准备妥当，画架上挂着那幅有名的《克莱芒丝的肖像》。

晚会在一片混乱和误会中开始。本来约好的是6点钟，被邀请的30多位客人，其中有雅克·瓦扬、布拉克、阿热罗、马克斯·雅科布、皮肖、勒内·达利兹、斯坦姐弟以及艾丽斯·托克拉斯（只有德兰怀疑杜阿尼埃的才华，拒绝参加。而且对此很反感，他对萨尔蒙说：“什么？让我去参加一个傻帽的庆祝会？！”），他们在福韦特酒吧边喝开胃酒边等晚会开始，都等得不耐烦了，菲南蒂·奥丽维才邀请他们到“洗衣船”用餐。差不多到了8点，菲南蒂好像觉得被费利克斯·波坦放了鸽子。天知道到底是这个做菜的大师傅贵人多忘事，还是菲南蒂迷迷糊糊搞错了时间。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第三天，菜馆才把订的饭菜送过来。

杜阿尼埃的荣耀时刻

好在人们还有的吃，口也不渴。菲南蒂做了一大盘巴伦西亚式米饭，毕加索又派人去小店买了些熟肉和糕点，大家就把晚饭打发了。餐桌上没多余的地方放糕点，就摆在“衣帽间”的长沙发上，就因为这个，可怜的玛丽·洛朗森差点被阿波里奈尔粗暴地赶回家。在福韦特酒吧时，玛丽·洛朗森就被人灌了不少酒，喝得烂醉如泥，她踉踉跄跄地走进衣帽间，把奶油水果馅饼和奶油果子饼打翻在地。玛丽·洛朗森乐疯了，她就往旁边经过的人脸上抹奶油和果酱。恰好在那时，阿波里奈尔和杜阿尼埃·卢梭走进来，看到这一幕，阿波里奈尔气得脸通红，把她赶了出去。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整个“毕加索集团”都不喜欢这个装腔作势的女人。后来，福韦特酒吧的侍应生过来说一位女士一直滚到马路的下部，后来干脆坐在酒吧前的人行道上，才有人出去看了一下。

把玛丽·洛朗森安顿好以后，人们入席开始吃油煎沙丁鱼。杜阿尼埃手持小提琴坐在一把路易-菲利普风格的扶手椅上。他坐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在一群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艺术家中间。高高在上，杜阿尼埃感到荣耀的光环围绕着他。他一直保持着庄重的举止，灯笼里的蜡烛油滴在头上，他都忍着，没吐半个字。蜡烛油在他头上形成了一个小圆锥，真像一顶小丑戴的帽子。

晚会还穿插了些节目。布拉克弹奏手风琴，阿热罗弹吉他，皮肖跳了一段西班牙舞，克雷姆尼兹为杜阿尼埃朗诵了一首赞美诗：

“这是
杜阿尼埃的画作
大自然
在他的画笔下，变得如此驯服！”

最后，阿波里奈尔朗诵了一首诗，装作是在宴会上即兴写的，实际上是精心准备好的：

"你记得吗，卢梭画笔下的阿兹台克风景
长满芒果和菠萝树的森林，
……

你画的画，在墨西哥你还见到了
火红的太阳照在香蕉树上，
骁勇的士兵，你换上了紧身的上衣，
靠在开关职员的蓝色石棚上。"

阿波里奈尔的胡编乱造都集中体现在诗的最后几句。杜阿尼埃从来没去过墨西哥，但他对阿波里奈尔的瞎编乱造表示默许，感觉增加的这部分奇遇能让他的新朋友们大开眼界。

宴会的最后，杜阿尼埃拿起他的小提琴，为大家演奏了他的保留曲目，还为克莱芒丝加了段华尔兹舞曲。宴会结束的时候，画室里简直是人山人海：蒙马特高地的画家们都从画室或小酒馆赶来凑热闹。菲南蒂还说看到其中有些人竟然无视她指责的目光，把小烘炉偷偷放到口袋里。

安德列·萨尔蒙那天的表现最差。为了吓唬吓唬热特吕德·斯坦还有他们的美国朋友，她哥哥米歇尔和她的嫂子萨拉，萨尔蒙和克雷姆尼兹都假装得了震颤性谵妄症。他们的表演惟妙惟肖，让曾经学过医学的热特吕德都信以为真。谎言尽管被揭穿，后来，热特吕德·斯坦在《艾丽斯·托克拉斯自传》一书中，还提到这件事，来报一箭之仇。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萨尔蒙脸上涂了肥皂，佯装得了震颤性谵妄症。尽管如此，所有的人也知道，晚会结束时，萨尔蒙是真的喝醉了，纠缠不休，当时应该把他关到地下室里去。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睡在艾丽斯·托克拉斯黏满羽毛的帽子旁边，嘴里还咬着帽子的花边。

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杜阿尼埃·卢梭被荣耀冲昏了头脑，而且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根本没注意到灯笼在他头上烧着了。当时，毕加索派雅克·瓦扬去了昂微广场找马车，他和斯坦姐弟一道把杜阿尼埃·卢梭送回去。总之，那天晚上，是杜阿尼埃·卢梭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晚会后，人们开始重视杜阿尼埃·卢梭。但宴会期间，人们对他还是有些不屑。因此，宴会并没遂了艺术家们嘲弄杜阿尼埃·卢梭的愿，而是使一位曾经被人忽略的画家得到承认。

离开“洗衣船”之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杜阿尼埃·卢梭对毕加索说：“你和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你属于埃及艺术，而我则是现代艺术。”

阿波里奈尔和萨尔蒙还是不厌其烦地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编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没有人愿意承认，当年的宴会是一个圈套，是为了嘲笑杜阿尼埃。所有的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毕加索，而杜阿尼埃最终真正为世人所承认，则是罗贝尔、威廉·于德和塞尔日·费拉的功劳。

“洗衣船”的晚会

给杜阿尼埃办宴会时，毕加索已经无须为生计忙碌。创作出《阿维农少女》后，他在“洗衣船”的生活日渐舒适，口袋里经常有一沓100法郎的大票子，怕把钱搞丢了，他还用一个安全别针别着。过了很久，多亏一个绘画爱好者马克斯·佩尔凯——国家工商银行行长的帮忙，毕加索才有了一个银行账户。

菲南蒂和毕加索夫妇十分好客。菲南蒂终于拨开乌云见太阳，熬到了这一天，可以尽情地挥霍。她妆束奇特，在蒙马特高地的小酒馆里招摇过市，身后飘散着一股让内特心灵[1]的香气。提到菲南蒂对香水的钟爱，热特吕德·斯坦说道，有一次，菲南蒂一下子把毕加索交给她几百法郎的饭费花光，买了一瓶“烟雾”香水，颜色倒是令人陶醉，味道却没有出奇的地方。

就在那时，热特吕德·斯坦和萨尔蒙、还有卡恩维勒经常谈论蒙马特高地的晚会。毕加索的画室成了蒙马特地区艺术家和诗人的据点，被马克斯·雅科布称作是“现代艺术实验室”。毕加索的朋友，他朋友的朋友，甚至很多不相识的人慕名而来，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丰富了毕加索的艺术创作，他们自己也深受毕加索的艺术感染。毕加索给热特吕德画肖像的时候，画室里总是

①让内特心灵：一种香水的名称。——译注

人来人往。经常是到了很晚，人们还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这时，马克斯·雅科布很得意地充当着公关、监督、演员等重要角色。大部分情况是，晚会变成一台文娱演出，马克斯·雅科布则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所有的人都记着马克斯·雅科布与生俱来的模仿天分。他能一个人独揽一出戏：舞台灯光、台词、演员；朗诵、唱歌、跳舞，模仿杂货商拒绝他赊账；模仿萨洛蒙·雷纳克为一件假王冠讨价还价；莫德拉诺的结结巴巴；边睡觉边卖画的安布鲁瓦兹·沃拉尔、跳《天鹅之死》的帕洛瓦……他从来不重复：主题来自于街头剧呀，玩塔罗纸牌游戏时的闲聊呀，在咖啡渣滓中看到的未来呀。

卡恩维勒讲起，马克斯·雅科布真是个特有趣的人。他可以一边和把椅子跳华尔兹，一边唱《卷发男孩》。

毕加索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难忘的夜晚：90岁高龄时，他还会偶尔唱起当年那些琅琅上口的歌。

演员热米埃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聚会，之后念念不忘，特别想让马克斯·雅科布表演一出短剧《布夏巴勒的土地》。马克斯·雅科布拿到剧本后，觉得角色太荒诞了，没有接受热米埃的好意。不过，后来，他把剧本改编成一部小说。

在回忆录里，菲南蒂提到曾带给她无限欢乐的晚会：

“我看他（马克斯·雅科布）的表演不下上百次。他光着脚模仿舞蹈演员跳舞，裤子挽到膝盖上面，露出毛茸茸的腿。不穿外衣，领子一直开到胸口，露出毛里子的黑卷边，光着头，几乎半秃了，戴着眼镜，以优美的舞姿跳舞，总是能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

有时，马克斯·雅科布就模仿咖啡馆的女歌手，扯着嗓子大叫：

“啊！我们真可怜

只有失望

我们喜爱高大的男人

但他们不喜欢我们……”

另一个节目，就是“模仿德加”。这是个集体节目，大家都参与进来：所有的人模仿舞蹈教师的语气，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而互相诋毁是他们默认的方式。人们互相讽刺挖苦，对最后一个来访者的欢迎方式是劈头盖脸的嘲笑。在巴塞罗那时，毕加索很讨厌这种指桑骂槐互相诋毁的方式，等他到了蒙马特，和那里的文人艺术家交往以后，也染上了这个毛病。在菲南蒂·奥丽维看来，他和马克斯·雅科布讽刺别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洗衣船”还好，玩笑开的还说得过去；到了后来，简直是愈演愈烈，让人无法忍受。

从1907年开始，“毕加索集团”经常从“洗衣船”出发，横渡塞纳河，去蒙巴那斯和拉丁区边上的百合苑咖啡馆。马克斯·雅科布和阿波里奈尔把毕加索带到这个咖啡馆的文社，总有很多人在那里聚会，社长是保罗·福尔，瑟弗里尼未来的岳父，1911年被誉为“诗歌王子”。

在百合苑咖啡馆，毕加索认识了诗人让·莫雷亚斯，他算得上是象征派的权威人物，他用他那可笑的希腊口音不无讽刺地问毕加索：“毕加索先生，请您告诉我，您对韦拉斯凯的看法。”

毕加索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个第二帝国时期的老纨绔子弟一边大笑，一边离开了：他一点都不喜欢毕加索，他比较欣赏马诺罗和他的诗歌。

没有答案的讽刺。

到了午夜，咖啡馆关门，毕加索他们就步行回到蒙马特。毕加索经常是到了“洗衣船”后，用阿尔弗雷德·雅里送给他的手枪放上几声冷枪，把邻居都吵醒了，惹来一阵乱骂。

毕加索决定离开“洗衣船”时，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甚至想单独拥有一个房间，以免工作时不受菲南蒂、狗和三只猫的干扰。同样，菲南蒂也希望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在贫民窟里住了五年，毕加索也受够了。1909年秋天，毕加索从西班牙的奥尔达－德－埃布罗度假回来后，就

毅然从“洗衣船”搬出来，离开了度过他一生中最艰苦却又最丰富的地方。之后，他在蒙马特又继续生活了三年，但伟大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时代还是结束了。

学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从“洗衣船”离开，毕加索搬到了克利尼大街11号的一套房子里，那里跟拉维尼昂广场的棚户区简直是天壤之别：克利尼大街属于“美好时代”资产阶级的住宅，什么先进的生活设施都有：水、煤气、电。它的主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泰奥菲尔·德尔卡塞。习惯了颠沛流离生活的毕加索夫妇，看到那么豪华的家具简直是目瞪口呆。他们开玩笑说：“泰奥菲尔·德尔卡塞肯定继承了很大一笔财产。”此后63年，直到毕加索去世，留下价值十亿二百万的财产，但他从没把那些白色木头的家具和破旧的椅子丢掉。在克利尼大街生活时，这些家具放在佣人房里。

毕加索夫妇在克利尼大街的房子很宽敞，北面是一间画室，朝向庭院和花园；还有三间起居室，在阳面，对面是弗罗韶大街。菲南蒂欣喜若狂，不厌其烦地向朋友们炫耀他们带有铜栏杆的英式睡床。还有一间小小的厅专门留给菲南蒂放她的三角钢琴，她还偶尔弹上那么一两下。毕加索经常去旧货市场和跳蚤市场淘货来布置房间。他买东西总凭一时冲动，经常把第一眼打动他的东西抱回家，一点也不考虑家里的物品是否风格一致。他对家居从不在意，无论是在“加里福尼亚”，还是在“生活圣母”，他的房间里都堆满了油画、画纸、雕刻、还有创作工具，家居摆设可免则免。

在克利尼大街安顿下来以后，毕加索从四处收集到很多的旧货，作为他生活的装饰：路易－菲利普风格的家具，填装垫料的长沙发，挂毯，油画，乐器，还有些黑人木质雕刻品。马蒂斯、德兰和弗拉曼克等人，在毕加索之前就发现了黑人艺术，受他们的影响，毕加索在创作《阿维农少女》时也开始收藏黑人艺术品。壁橱里、桌子上、凳子上堆满了玻璃器皿、糖浆瓶子、镶着贝壳的盒子、细木镶嵌的蹩脚彩色图片、古陶器……堆得像埃菲尔铁塔那样高。但这些东西不是假的，就是没有什么价值：毕加索不是一个有鉴赏力

的收藏家，不知道如何选择。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新奇和怪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毕加索去世以后，他的遗孀和儿子把他的个人收藏捐给卢浮宫，而卢浮宫的负责人那么失望。除了马蒂斯、卢梭、布拉克、格里斯、米罗、巴尔塔斯等人的作品以外，其他的收藏除了假的，就是三流作品。柯罗的画没有签名，库尔贝的画无法鉴定是真是假，勒·南的画不是路易·勒·南画的，而是他的弟弟马蒂厄·勒·南所作，还有，他收藏的高更油画也是不知真假。

刚刚搬到克利尼大街时，菲南蒂开心得要命。她内心深处的压抑多年的爱享受的本性终于得以爆发，而且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她像上层社会的贵妇一样，在家里办茶话会，招待朋友。由此，得到众多人的尊重。保罗·普瓦雷邀请她到他的游艇上去玩，还送给她一块镶着金边的玫瑰红丝巾，她感觉太时髦了。

为了炫耀她的成功，菲南蒂还请了个女佣做家务，其实什么都不做。毕加索不准别人进他的画室打扫卫生，害怕飞扬起来的尘土把他刚刚画完的画弄脏，只有他的狗弗里卡、猫和长尾猴能自由出入他那“神圣的领地”。毕加索夫妇总是起床很晚，他们睡觉时需要安静，所以他们的女佣，舒舒服服的坐在扶手椅上，边看报纸边喝着牛奶咖啡。对菲南蒂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佣人在那里给客人们开门，在朋友面前，她很有面子。

这时，毕加索也逐渐找到了自己在艺术上的定位。28岁的毕加索与九年前刚刚来到巴黎的那个瘦弱的艺术青年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他逐渐成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方向。从《阿维农少女》开始，他的发展道路已经很明确。朋友的欣赏，众人的崇拜——欧仁尼奥·多尔专程从马德里赶来，向毕加索致以西班牙先锋派艺术的问候，并预言，他的作品将进入普拉多史册。毕加索自己也意识到他是同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事实上也是这样，劳特累克时期，毕加索笔下的穷困的妓女，与他在奥尔达－德－埃布罗完成的风景画的风格迥异。

玫瑰色爱情的结束

克利尼大街，就像节日气氛里的蒙马特，它不属于艺术家。尽管蒙马特

高地离克利尼大街有些远，毕加索总是经常不辞劳苦地去“洗衣船”看看。他在那里还有一间画室，用来堆放画作。他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从那时起，毕加索开始跟大部分艺术家一样，下午和晚上才搞艺术创作。冬天时，华灯初上，他就去马蒂尔路的画廊转转，或是去咖啡馆找朋友聊天。他不再是“蹦蹦兔”咖啡馆的常客，也不再光顾蒙马特高地的弥漫着油烟味道的小酒馆。离他新家不远，有一家便餐馆叫“幽乡僻野”，毕加索成了那里的主顾。“幽乡僻野”的环境一点都不好，不是正派人去的地方，总有些皮条客在那里监视着为他们干活的妓女，还有些妓女在人行道上来来回回地招揽客人。菲南蒂说艺术家和皮条客之间常常发生争执。便餐馆里一点都不宁静，嘈杂不堪。但那里交通很方便，人们经常就近去用餐。就是在那里，在“幽乡僻野”便餐馆，毕加索见到了来自意大利的未来派艺术家，而阿波里奈尔则在那里创作出他的诗歌杰作《醇酒集》。

聚在“幽乡僻野”便餐馆的艺术家们越来越多，但不像原来那样有凝聚力；关系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单纯的伙伴关系。西班牙人占少数，大部分是其他地方来的艺术家和作家。以马克斯·雅科布和阿波里奈尔为核心的小圈子又加进来不少新人：吉诺·瑟弗里尼、梅特赞热、皮卡比亚；演员罗歇·卡尔、塞尔日·费拉和他的妹妹德坦让男爵夫人，她还曾把阿波里奈尔带到别处，一起过了销魂的一个星期、特别是波兰画家马尔库，阿波里奈尔还给他取了一个比较法国化的名字马尔库西，很像巴黎一所村庄的名字、以及马尔库西的女朋友马塞尔·于贝尔，绰号“布娃娃”，一位年轻优雅的女士。马尔库西和马塞尔·于贝尔表面上看起来很相爱，他们是造成毕加索和菲南蒂分手以及毕加索最终离开蒙马特的罪魁祸首。

马塞尔·于贝尔，原名埃娃·古埃尔，她和菲南蒂一见如故，后来就经常碰面。几乎每个晚上，这两对夫妇都会聚在“幽乡僻野”便餐馆。菲南蒂深信，毕加索只爱她一个，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开始对身边的埃娃发生了兴趣。和一个胖胖的女人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以后，毕加索慢慢想换换口味，开始欣赏举止优雅的女人。

吉诺·瑟弗里尼，作为“幽乡僻野”便餐馆聚会的见证人，对毕加索夫妇的分开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菲南蒂也不是个正派的女人。”这倒



埃娃，约摄于1911年。

不错：毕加索对菲南蒂和马里奥·默尼耶以及和罗歇·卡尔的几次婚外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菲南蒂和毕加索分手后，又和罗歇·卡尔相遇，一起生活了20年）。吉诺·瑟弗里尼讲道：“她（菲南蒂）爱上了巴尔多·奥皮，一个年轻的画家。巴尔多·奥皮很热情，也很聪明，曾来找我，让我把他引荐给毕加索。我把他带到‘幽乡僻野’，把这两对夫妇都介绍给他认识。”

和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帅气的巴尔多·奥皮很懂得讨好女人。菲南蒂很快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并开始怀疑毕加索对她是否忠诚。她甚至觉得毕加索在“洗衣船”有两间画室，却从不告诉她为什么。事实上，毕加索在“洗衣船”的另一间画室就是他和埃娃幽会的地方。

在瑟弗里尼看来，菲南蒂为重新得到毕加索的爱做了很多努力，并不是说她多么爱毕加索，而是她意识到，在蒙马特，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毕加索那样，让她过上如此优越的生活。菲南蒂和巴尔多·奥皮一时的激情纯粹是为了重新得到毕加索。她想当然地认为，一次小小的计谋不仅可以让她满足对巴尔多·奥皮的爱恋，也足以让毕加索吃醋。总之，她和那个帅气的意大利人私奔了。菲南蒂最终白费心机，毕加索非但没有后悔，也没有感到一丝忌妒，反而觉得解脱了。他觉得机会来了，一天之内，他就决定带埃娃离开蒙马特。他们一起去了塞雷。

对和菲南蒂的分开，毕加索的解释则完全不同。50年后，毕加索对热内维埃夫·拉波特说，他老早就厌倦了菲南蒂的肤浅和醋意，只是不知如何摆脱她。毕加索讲道：“在‘洗衣船’，还住着一位画家（巴尔多·奥皮），他很



爱菲南蒂，还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菲南蒂看完后，把信扔到厕所里。”信没有掉到马桶洞里，而是落在马桶边上。很偶然地，毕加索把信捡起来看，然后假装吃醋，借机和菲南蒂大吵了一架，然后把她赶走了。

这个解释还是有些牵强，因为1911年毕加索和菲南蒂分开之前，菲南蒂已有两年没住在“洗衣船”。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毕加索为能够摆脱菲南蒂而欣喜，他惟一不放心的是，和埃娃－马塞尔－于贝尔－古埃尔离开蒙马特高地之后，如何安顿他们的狗弗里卡。他在给布拉克的信上写道：“菲南蒂昨天和一个未来派画家跑了。我该怎样安顿我的狗呢？”

假如说菲南蒂，至少还能比较坦然地面对和毕加索分开，马尔库西相比之下就痛苦得多：他深深地爱着埃娃。马尔库西在蒙马特的小酒馆里尽情地发泄他的失望和愤怒，还画了一张漫画以示报复。画面上，毕加索走在一条满是陷阱的路上。不过，马尔库西失恋的痛苦也消失得不慢，一年后，他和艾丽斯·阿利卡，一位富有的波兰姑娘结婚了。

对毕加索和菲南蒂来说，1912年，他们后来又在塞雷相遇，当时菲南蒂由皮肖夫妇陪着。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来往过。菲南蒂还很郑重地给热特吕德·斯坦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信，诉说她的生活。菲南蒂在信中写到，她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尽管身边不缺少男人的爱，但让她最留恋的，还是和毕加索一起走过的艰苦岁月。

1958年，菲南蒂耳朵聋了，还患有关节炎，祸不单行，又得了严重的肺炎。布拉克的夫人马塞尔一直去探望她。马塞尔还给毕加索写信，告诉他菲南蒂的困境。毕加索给她寄来一万法郎，给他的前妻治病。菲南蒂于1966年2月1日去世——孤独地死在纳里路的一套房子里。生前仅靠养老金维持生活，她什么都没留下。在她的首饰盒里，人们发现了一面心形的镜子，那是毕加索在他们热恋时送给她的：最后成为菲南蒂惟一的财富。

毕加索的离开

为了和菲南蒂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一刀两断，1912年夏天，毕加索和埃娃离开蒙马特，动身前往塞雷。后来菲南蒂和皮肖夫妇也去了塞雷，毕加索－



毕加索在舍勒谢尔路5号的画室，摄于1914年。



毕加索在新画室中做拳击师造型，约摄于1914年。

埃娃夫妇又去了索罗格。毕加索－埃娃夫妇重又回到巴黎时，已经是秋天了。他们在索罗格时，卡恩维勒就在帮他们把家搬出克利尼大街。一回到蒙马特，毕加索和埃娃就直接住到拉斯帕尹大街242号。这只是暂时的：几个月后，他们又搬到舍勒谢尔路5号一套更加舒适更豪华的套房里，在蒙巴那斯公墓对面。后来，年轻而美丽的埃娃得了肺结核，于1916年初去世，毕加索伤心得不知所措。埃娃也许是毕加索一生中最让他为之动情的女人。

毕加索离开蒙马特，不仅结束了他创作最高峰的10年，结束了他成为20世纪最著名艺术家的10年，也标志着先锋派艺术家在蒙马特高地的生活的结束。毕加索不是当时惟一一个已经在艺术上获得成功或是即将取得成功的艺术家。凡·唐吉、德兰、布拉克也正走在通向成功和财富的道路上。凡·唐吉第一个离开“洗衣船”，之后，他先是搬到索尼耶胡同，后来又搬到当费尔－罗什罗路，他在那里办了几次化装舞会，是蒙巴那斯地区最初的辉煌时刻。紧接下来的是雅克·维庸，他移民到皮托。还有布拉克，结婚后，他搬到盖尔马胡同。德兰离



开图拉克路后，住进波拿巴路的一座古老的房子里，对面就是美术学校。

1914年，在蒙马特高地只剩下格里斯和马克斯·雅科布，他们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还有“被诅咒的三一体”，继续生活在科尔托路。所有的艺术家都经历了长时间缺衣少食的生活，当时，他们也别无选择。可口袋里一旦有了钱，他们就选择离开，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艺术家们非常留恋在蒙马特度过的艰苦而美好的岁月。他对热内维埃夫·拉波特说：“在拉维尼昂路，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我相信，我和我的朋友们生活得很快乐。但一有钱，大家都离开了。”

艺术家大批离开后，蒙马特的美好年代也行将结束。那里还生活着很多优秀的画家——卡米翁·勒普兰、让·保罗、德帕尔贝斯、洛尔茹、菲利普、尼古拉·舍费尔，等等。但那里，再也没有如此多的革新者聚在一起的热烈场面。在蒙马特度过的10年间，毕加索亲眼目睹了诸多现代艺术流派的诞生，这些艺术流派，直到上个世纪末，依然发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蒙马特高地，仍生活着为数众多的画家，但没有形成气候。那里和巴黎16区没什么区别。而且，泰尔特广场的表面风光，也让艺术家们不敢尝试真正的艺术生活。

1970年5月12日，“洗衣船”的一场大火，把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在蒙马特为艺术而奋斗的痕迹，烧成一片灰烬。那里，只剩下对青春和自由的回忆。



译 后 记

毫无疑问，20世纪最享盛名、创作数量最多的艺术家，非毕加索莫属，他的名字俨然成了“现代艺术”的代名词。他的出现，改写了20世纪的美术史。

毕加索独具魅力的风格贯穿20世纪，时至今日仍令人惊异。

当年，如同每个有思想的艺术家一样，年轻的毕加索萌生了拜访艺术之都巴黎的念头。1900年，一个幸运的机会让他如愿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巴黎。之后，他数度往返于巴黎和巴塞罗那之间，直到1904年在巴黎定居下来。一到巴黎，毕加索就结交了一群前卫艺术家及作家朋友。他一生中，诗人好友特别多：阿波里奈尔，他最早发现毕加索的才华；马克斯·雅科布，为了毕加索，他甘愿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毕加索身陷困境，他义不容辞伸出援手；安德列·萨尔蒙，后来，他的回忆录生动再现了“洗衣船”那段波西米亚生活。毕加索的友人，还有电影导演、作曲家、杂技演员和小丑……

毕加索，在蒙马特高地，在“洗衣船”，度过了他生命中最艰难也最美好的时光。第一次赊账，第一次偷别人门前的食物，第一次坠人爱河，第一次得到世人赏识，第一次……

艺术家、作家、诗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贯通。布拉克和毕加索携手，开创了立体派艺术，打破过去以单一视点捕捉景象的传统绘画手法，掀起当代艺术革命。作家和诗人们引导毕加索跨进法国文学的宝库，而毕加索，他丰沛的热情、开阔的心胸、横溢的才华，也深深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在蒙马特高地、在“洗衣船”，艺术家们和他们的朋友，为了生存，还要跟画商、报纸杂志编辑，甚至小商小贩们打交道，虽然日子不那么轻松，却也乐在其中。他们在蒙马特高地创作、生活、娱乐。许多年以后，回首往事，

他们满怀留恋与深情。

本书，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写，为了唤起人们对蒙马特高地的回忆。

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比较确凿。”在此，译者认为，在艺术评论方面，叙述艺术家的日常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依托和起点。“艺术高于生活”，但，毕竟，“艺术源于生活”。

感谢许钧老师对我的信任，感谢法国朋友 Claude Payen 先生为本书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王树先先生为本书前三章所做的仔细校改、润饰，给译文的总体风格做了正确的定位。虽然本人诚惶诚恐，尽心尽力，但毕竟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漏疏失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业内同仁不吝赐教。

刘　娟

2002年12月于上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１９００－１９１０）
作者＝
页数＝１８４
ＳＳ号＝１１３５４００２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